



目 录

专 论

- 3 冯绍雷 / 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路径依赖——从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相关性视角的一项考察

专题文稿：俄罗斯与西方

- 19 理查德·萨克瓦 / 冷和平：解读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
- 37 瑞加娜·海勒 / 主观性很重要——重新思考俄罗斯与西方关系
- 55 波·彼得松、埃米尔·佩尔松 / 觊觎、憎恶和望尘莫及？——1984至2009年俄罗斯平面媒体文本中的美国霸权形象和俄罗斯自我形象

俄罗斯经济与外交

- 71 斯蒂芬·赫德兰 / 金融危机后的俄罗斯
- 89 孙 超 / 前行中的困顿：京都时代与后京都时代的俄罗斯气候环境外交

历史·文化

- 103 赵永华 / 19世纪末 20世纪初沙俄官方和民间在华出版报刊的历史考察与简要评析
- 117 夏纪媛 / 1958年苏联从罗马尼亚撤军始末

书 评

- 128 陈建华 / 一项泽被后人的学术工程——写在《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出版之际
- 134 龙 腾 辑 / 俄罗斯大事记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李敏焘

杨 成

刘 军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2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23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0 年第 6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Фэн Шаолэй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х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й в России от предшествующей траек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взаимосвязи между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м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ми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ой (3)

Ричард Саква

Холодный мир: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Западом (19)

Регина Хеллер

Субъективность очень важна — Пересмотр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Западом (37)

Бо Петерссон, Эмиль Перссон

Желаемое, ненавистное и недостижимое? —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о гегемонии США и самоидентификация Росс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печатных СМИ в 1984–2009 гг. (55)

Стефан Хедлунг

Россия после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ризиса (71)

Сунь Чао

Трудности на пути вперёд: климатиче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Киотского протокола и после него (89)

Чжао Юнху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и оценк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и частных периодических изданий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е в конце 19-го — начале 20-го века (103)

Ся Цзиюань

История процесса вывода советских войск из Румынии в 1958 г. (117)

Чэнь Цзяньхуа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й научный проект — Значение издания «Пол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сочинений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для потомков (128)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0 年第 6 期 (双月刊)

Contents

Feng Shaolei

Path Dependence of Russian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A Perspective
of Relations between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External Relations (3)

Richard Sakwa

The Cold Peace: Making Sense of Russi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est (19)

Regina Heller

Subjectivity matters: Reconsidering Russi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37)

Bo Petersson, Emil Persson

Coveted, Detested and Unattainable? Images of the US Superpower Role
and Self-Images of Russia in Russian Print Media Discourse 1984-2009 (55)

Stefan Hedlund

Russia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71)

Sun Chao

Hard Condition while Marching Forward: Russia's Environment Diplomacy
in both Kyoto and Post-Kyoto Era (89)

Zhao Yonghua

A Historic Review and Brief Analysis regarding Tsarist Russia's Official
and Unofficial Journals in China in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103)

Xia Jiyuan

The Whole Event of the Soviet Union's Withdrawal from Romania in 1958 (117)

Chen Jianhua

An Academic Project Benefiting Descendants
—— On the Occasion of the Publishing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Fyodor Dostoevsky" (128)

专 论

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路径依赖

——从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相关性视角的一项考察*

冯绍雷**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型国家，近二十年来，俄罗斯的转型和发展过程展现出极其丰富的内涵。这一问题对于整个转型研究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但迄今仍然处于有待发掘和研究的状态。本文试图通过对俄国转型的路径依赖的分析，探讨体制转型与对外政策之间的相关问题。

一、为什么要将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首先，我们需要对本题的几个核心概念进行分析。在一般意义上，体制转型指的是从传统集中的计划经济与政治高度集中的体制，向法制化的、有更高程度民主的、同时是市场经济导向的现代管理体制转变。这一过程就是转型。

转型至少涉及到两个英文词汇，即transition和transformation。其中，前者较为常用，强调从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的过程。类似于在机场换乘飞机，需要有签票、改道、换机等一系列的过程。在转型过程中，指的则是对于另一种发展模式的选择。而后者则更具有整体性、革命性的涵义，也包含有强调突变的可能性。^①就体制转型这一概念来说，尽管我们在中文的理解上是指从传统体制向一个更高层次的

* 本文系笔者以本人2010年6月4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俄罗斯研究高研班(The Third All-Chinese Advanced Training Course for Young scholars — “Methodology of Russian and Eurasian Studies”)上的学术讲演为基础修订整理而成，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外俄苏研究”(项目批准号:2009JJD810005)的阶段性成果。

** 冯绍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① 2009年冬天，美国前总统俄罗斯事务顾问托比·盖蒂(Toby Gati)和她丈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俄罗斯与欧亚问题资深副教授查尔斯·盖蒂(Charles Gati)来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访问座谈时，后者曾谈及关于“转型”的这两个词(transition和transformation)的不同含义。

市场化、民主化和法制化体制变换的过程，但是从英文和俄文表达上会找到不同程度的、不同色彩的表达，这说明体制转型的理解还可以有多种表达。显然，不同形式的转型过程有着不一样的外部环境相伴随，也有着不同的对外政策与战略取向。

与转型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制度范式”(system paradigm)。这一概念是由雅·科尔奈(Janos Kornai)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并认为“制度范式”强调的是不分学科地把整个转型过程看成为一个整体；强调整体研究眼光之下的社会运行的基本体制特征；强调与静态的研究不同，注重的是动态的体制转换过程；强调比较的方式是转型研究的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科尔奈特别强调转型发生的历史条件、阶段性变化、外部环境、以及各个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科尔奈甚至认为，近三十年来所发生的转型，是15—16世纪整个世界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社会以来所没有过的宏大的社会变迁过程。这样一种转型研究的观念则进一步关联到制度变迁与对外政策的相关性这个问题。因为，外部环境和外向拓展问题直接成了内生于“制度范式”的一个部分。^①

对于制度变迁与对外政策的相关性研究，在学术界已经有了较长时间的讨论，但是也存在着很多盲区和空白点。

关于国内制度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在国际政治学科形成伊始，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但其发展经历了复杂的过程。比如，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等早期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的作品都非常强调国内意识形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反而到了新现实主义时期，特别是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eal Waltz)将国际关系理论结构化，把国际关系主体的思想内容抽象化以后，每一个在国际结构中活动的主体被视为单一的、同质的存在，然后强调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结构关系的变化。这样就将内部的制度变迁与对外政策的相关性这个重要问题抽象掉了。^②

从学术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二战以后的政治理论研究(包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多年来主要局限于国内政治的研究，并不把国际政治问题纳入视野；而国际关系理论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抽象化了”国内问题。这样一种状况使得国际关系理论和国内政治经济问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处于相互游离的状态。戴维·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在“五十年的分离：思想史与国际关系”一文中对此也作

① [匈]雅诺什·科尔奈：“制度范式”，《比较》，2002年第1期，第1-24页。

② 参见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0年版)中有关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相互关系的论述，以及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有关国际系统中活动主体的抽象化的论述。

了很好的梳理。^①

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在全球化趋势有所发展的背景之下，新自由主义理论兴起，对于制度变迁与对外政策的关系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国际政治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都提出了很多类似的问题。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首先提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 70 年代末，基欧汉提出外交政策的实质就是为了塑造一个能够跟国际环境匹配的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基欧汉所编撰的专著《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中，苏珊·秀克（Susan Shirk）的文章就是从这样的视角提出，当年中国加入 WTO 就包含着进一步推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这样的战略目的。^②

到了 1988 年，普特南（Robert Putnam）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双层博弈》（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普特南在文中提出，外交政策的决策者不光是开展对外活动，他同时还要回过头来面向国内，对国内的整个利益集团以及各个层次的政治、经济关系作梳理和整合。“双层博弈理论”提出以后，这个话题就开始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话题。^③

在这样一个语境下讨论俄罗斯问题，我们会发现，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转型国家的俄国，还曾经是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她在 20 世纪前期和 20 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两次变革都引发了巨大的世界性反响。为什么这些撼动全局的现象都发生在俄国身上？而且，无论是当年的十月革命还是今天的转型过程，都表现出了内部制度变化与对外政策的密切关联。因此，至少可以认为，将内部过程和外部取向相互脱离的研究方式，在面对俄罗斯问题这样一个宏大进程的时候，是不甚适宜的。

在当代这样一个世界环境下谈论这个问题，还有着更为特别的意义。当前，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新兴国家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结构。G20 等国际新形态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整个世界经济、包括政治体系未来的前景，即新兴国家参与世界治理已经是不可改变、也不可阻挡的趋势。那么，正在发生重大影响的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内部进程将会如何作用于整个世界进程，而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又将如何作用于上述国家内部的进一步

① David Armitage, “The fifty years’ rift: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2004, Vol.1, NO.1, pp. 97-109. 本文是经由本机构周保巍博士推荐后读到，特此感谢。

②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Edited by Robert O. Keohane and Helen. M. Miln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86-208.

③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8, Vol. 42, No. 3, pp. 427-460.

转型？这些国家究竟是将会以内部制度转变的惯性更多地延展于这个世界，还是更多地领受外部影响而认同于现行的国际体制。这一问题不仅涉及俄罗斯，而且事关中国。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国内制度与对外政策的关系问题，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世界格局发展的方向和趋势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制度变迁与对外政策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关于制度变迁和对外政策相关的理论要素和相互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国际环境如何影响国内的制度变革

第一，开放性的国际环境对体制变迁产生引导作用。

回顾近三、四十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开放的国际环境，或者在一个区域合作的环境，甚至全球层面上的合作环境，能够使得不同体制的国家相互借鉴各自的优点和长处，而不一定是产生互相之间的恶性竞争。所以，即使在今天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并没有出现上个世纪 30 年代大危机时期那种程度的各国恶性竞争、多米诺骨牌式地竞相推动保护主义政策的状况。在今天的国际市场上，虽然有一些针对新兴国家的举动，但并没有出现全局意义上的保护主义态势。这种情况的出现证明，即使碰到了严重的波折，世界各国仍然认可开放的国际环境。这对于各国国内体制的发展和进步是有很多益处的。

第二，开放环境对当地传统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带来新的挑战。

这一点对新兴国家的影响尤为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个问题是研究制度变迁和对外政策相关性的核心问题。面对开放的国际环境，传统文化应该如何适应，思想意识形态又应该如何调整和构建，这是一个必须正视和认真加以研究的问题。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与苏联 80 年代的改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盖达尔（Yegor Gaidar）在讲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曾提及，戈尔巴乔夫认识到苏联体制必须加以改革，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比较清楚。但当戈尔巴乔夫 1985 年上台以后，他至少需要三年时间来学习怎样制定改革政策。非常可惜的是，他没有运用好这个机会，尽管 80 年代中期的情况其实还没有那么恶劣。^①当时指导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理论基础，就是他唯一的著作《改革与新思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终导致了

① [俄]E·T·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王尊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151-152 页。

苏联的解体。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开放的国际环境，过于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任何超级大国都是无出路的。但同样，任何放弃对于本土价值的思考和坚守，同样会带来灾难。而戈尔巴乔夫的上述这本书中几乎没有一个词提到苏联的本土传统、本土价值。他讲全人类，讲改革，讲开放。^①这些都没有错。但正是对于本土文化和自身思想意识形态构建的忽视，最终带来了整个意识形态的偏颇。也就是说，在改革的起步阶段，他的整个认知水平和制度安排为以后的改革设下了前提，而这种前置性的偏颇是很难调整的。

第三，外部环境的压力导致了内部利益主体的多样化，也带来了体制变迁的巨大压力。

根据基欧汉的研究，开放条件下世界经济中的价格、汇率、关税等机制与杠杆，是能够对于国内制度变迁起到引导作用的。^②一般来说，几乎所有转型国家，特别是在经济开放后，都出现了国内产业二元化的趋势。一部分企业面向国际市场，另一部分企业面向国内市场。面向国际市场的企业往往成为盈利和高收入企业，具有比较好的福利条件。而面向国内市场的部分企业在经营情况和待遇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反差。不仅如此，在开放条件下，我们可以看到参与国际活动的主体大量出现，不再局限于国家、公司，甚至个人、旅游者都成了国际交往活动的主体。这样一种情况的出现，使得原有的体制管理和体制适应均面临很大的压力。因此，是倾向于精英式的利益分配格局，还是倾向于平民主义式的利益分配格局，这样一类事关体制安排的选择，马上就会成为国内政治博弈的焦点。

（二）内部制度变迁对于对外政策的影响

从体制变迁造成的影响来看，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将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和产品在很大程度依赖国际市场，那么它的对外政策的开放性几乎很难逆转。这个问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既有制度安排，也有地理原因。例如，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讲到帝国的时候就说过，如果我不得不生活在帝国，我最好生活在帝国的沿海地区。^③特别是对于大国来说，如果她的整个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它需要海外市场，它的内部资源需要输出，随之整个文化也需要更多的交流，而与其匹配的对外政策就理应是更加开放、而不是封闭的。特别是其沿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第三章“我们怎样看待世界”，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69-204页。

② [美]罗伯特·基欧汉等：《国际化与国内政治》，姜鹏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2页。

③ [美]阿·塞尔·马汉：《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问题的影响》，见“学报版引言”，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1-64页。

海地区的开放程度往往比较高。而且，对外依存也并不局限于沿海地区。例如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尽管身处内陆，但对于海外市场仍然有很大的需求，特别是这些能源型产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迄今为止，当其产业结构表现出对于外部市场的依赖的时候，其对外关系的开放和多样化取向，从长时期来看乃是一个趋势。

今年四月初，俄罗斯财政部长库德林（Alexei Kudrin）在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的学术年会上直截了当地提出，今年俄罗斯不再有新的贷款发放，其基本原因是目前俄罗斯的资金依然短缺，而更加深层次的原因是没有能够改变以能源依赖为主的经济模式；除此之外，除了外资企业还能维持，几乎所有的国内企业都运转不良。这说明，长期的能源依赖型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深远。因此，库德林甚至强调，俄罗斯不仅需要经济体制改革，甚至政治也需要改革。^①由此可见，俄罗斯虽然大部分地区地处内陆，但是它的资源依赖型经济模式使得它的对外依存度太高。而既然对外部世界存在着高度的依存性，那么，指望它与西方保持长期抗衡状态，是不能持久的。

第二，制度变迁效应的“外溢”。

制度变迁具有发散性，会迅速超越一国的界限，向外扩展。有两个很明显的例子：一个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后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然后随着拿破仑战争的扩展，整个 19 世纪的前期，中欧、东欧的民族国家纷纷出现。实质上，这是利用武力推进制度变迁的扩展。这一做法为以后制度变迁采取强烈手段的外推开了一个头。另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第三波浪潮”。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其著作中曾谈到，在到新自由主义思想扩张的背景下，在世界各地所出现的制度变迁过程呈现出一个接一个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形成了像雪崩一样的政治变化。^②我们所说的从 80 年代初开始的整个制度转型和改革过程，并不局限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范围。我一直认为，所谓制度转型最早出现在 70 年代中期的南部欧洲，在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出现，然后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拉美直接受其影响，同时东亚在 80 年代也出现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③

第三，传统价值对于对外政策的塑造。

体制的核心部分是它的价值，而它的价值当中的传统因素始终有着重大的影响。

①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Заместител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Министра финанс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Л. Кудрина на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экономики: рынки, фирмы и структурные сдвиги», 6 апреля 2010 г. 10.00 –13.30, ул. Воронцово Поле, 5 А, Культурный центр ГУ-ВШЭ.

② [美]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年，第 21 页。

③ 参见冯绍雷、相兰欣主编：《转型时代丛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总序。

犹如美国的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相混合的价值观对于外交始终保持着巨大的影响，也如中国传统当中天人合一式的和谐中庸的世界观也强烈地塑造着当今中国外交，像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也是文明古老的国度，它的传统价值对于它的对外政策的影响是很深刻的。不仅是它内部政治经济体制变迁过程的激进性，而且还包括整个对外政策的趋向，我们都可以看到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其中既有传统弥赛亚精神作用下与生俱来的救世情怀，还有作为欧亚大国的多方位外交在长期积累之下形成的灵活多变、善于适应形势、并且很会交替运用软硬两手的外交经验与风格。这也是我们在分析时需要注意的内容。

（三）制度变迁和对外政策相关性籍以发生的载体

通过哪些载体可以在制度变迁与对外政策之间建立有效联系，也是转型研究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否则研究无法深入推进。

关于制度从外部输入的问题。就整个国际关系史而言，制度的外部输入曾经有过三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从 16 世纪中期到 17 世纪中期，从宗教改革到民族国家系统建立之初，人们看到，随着文艺复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一过程几乎席卷所有欧洲国家。第二个高潮，是前文提到过的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现的那样一个民族国家纷纷诞生的过程。第三个高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主导的民主制度的输出，一直延续到今天。另外一方面是以前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思想的输出。制度输出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不仅牵涉到国际法、政治理论，而且牵涉到现代伦理学研究的非常复杂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到现在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这里面包括着：是否需要从外部输入体制因素，以及用怎样的方式从外部输入体制因素等问题。多年以来对于苏联晚期扩张性外交的批评，新世纪以来人们耳熟能详的对新保守主义鼓吹的“民主推广理论”的批判，都是这一范畴的问题。制度输入的问题至少涉及到一系列的载体，诸如武装力量的使用、意识形态的扩张、包括一直被称为是公正的国际法程序被“片面”运用等等。人们发现，看似“价值中立”的这些规范与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运用”的。

除此之外，在载体方面还有很多因素值得介绍，比如货币因素。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就曾经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说，金融、货币不仅是国家主权和文明的象征，而且货币本身就是沟通国际社会的重要渠道。因为货币至少表现出两个功能：一个是储蓄，一个是交换。货币体系中的利率，原来在一国条件下它主要起作用于内部的金融管理和储蓄。而在开放条件下，利率也成了影响资金流动的重要手段。至于货币的交换功能，特别是通过汇率跟外部世界进行

能量的交换，在当今世界的国际纷争中特别显眼。^①所以像货币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比较强调的是国家的主权体现，而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对外交换的重要工具。转型时代俄罗斯的利率政策曾经起到过戏剧性的作用，当年硬是靠超高的利率把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给压了下来；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多年相对稳定的汇率不仅表明俄罗斯宏观经济的趋稳，而且卢布的坚挺也预示着在今后的国际金融秩序构建中，俄罗斯将是不可忽视的一方。

在制度变迁和对外政策的相关性问题的讨论中，还有一个社会载体问题也值得讨论。比如，“中产阶级”这一范畴。一般情况下，我们把中产阶级看成是推动国家开放、进步和稳定的重要力量。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欧洲经济复苏和60、70年代欧洲缓和局面的出现，显然跟欧洲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作用有关。因为从本质上说，当年欧洲中产阶级需要的是稳定和相对平和的国际环境。但是，对于转型国家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比如说大学教授、法律工作者、医生等等人群，一般来说，他们都比较趋向于开放和追求和平外交政策。但是我们也经常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出于维护本土价值和利益以及维护传统文化的需要，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也会表现出对于外来影响和外来因素的激进情绪，比如，对于移民的态度。所以，我认为，中产阶级在整个制度变迁和对外开放当中，它的角色与功能还是一个动态的现象，因时因地而异。

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在具体的转型研究中进一步把握，并且结合具体国家的转型过程出现的实际情况，加以研究和把握。

三、俄罗斯体制变迁与对外政策相关性问题上的路径依赖

下面我们将视角转向俄罗斯这一案例。从俄罗斯转型的经历来具体分析制度变迁与对外政策的相互关系是如何影响国家的发展的。

转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这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旦人们作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程序化的、惯性的力量会使起始的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现在，这已经是制度经济学中的惯用概念。这一概念不但标明改革的路径，而且也指一种状态。即当你选定了最初的方向，改革的最初安排就会使

^① [英]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杨宇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13-121页。

你以后的改革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产生递进的效果。就像电脑程序一样，可以按照某种路径进入，也必须按照特定的程序退出。当然，社会改革无法像电脑程序一样，在启动以后，是很难有退出的机会的。

路径依赖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它隐含着另一个概念——“选择”。路径依赖与选择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般来说，我们比较强调其初始安排将规定今后总体的发展，但并不是说在每一个环节的发展和转折的过程中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正如科斯（Ronald H. Coase）等制度经济学家所说，选择是始终存在的。路径依赖不等于说转型主体在转型的过程中毫无主动能力或者主动运作的空间。路径依赖的存在，不等于说开头出现了错误，就会一直将死路走到底，其中也可能存在着进行调整的空间。

那么，在确认内部转型和对外政策之间存在相关性的前提之下，俄罗斯转型进程中的路径依赖表现出怎样的特征呢？

研究俄罗斯转型过程的路径依赖问题，可以围绕以下四个问题展开：

（一）自由主义—平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演进路线

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俄国进入改革阶段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反复出现的逻辑，即俄国的改革从传统体制走向改革开放，走向自由主义；但是它走向自由主义以后，并没有出现民主制度稳固化的阶段，也没有出现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甚至也没有出现国家管理的稳定状态。我们看到的是政治权力在各个集团的精英之间不断地转换，或者在政治跟商业集团之间转换，看到的是动荡和不稳定。到了 90 年代后半期，我们进一步看到了由自由主义起步的改革，它导致的结果却是平民主义的上升。平民主义在俄语当中还有另外一个词叫作“民众主义”，整个决策听从民众的意见。

这样的逻辑并不只是在俄国出现。实际上这个过程，即从传统主义走向自由主义，然后走向的并不是自由主义的稳固，而是相反出现了平民主义。这在拉丁美洲也出现过，甚至在其他地方也能发现这样的逻辑。

平民主义不等于保守，但是平民主义的确与对对外政策有很重要影响的民族主义在很多方面是贯通的。平民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民族主义，表达出来的是民族主义的思考方式。从这个角度讲，俄国改革路径的发展过程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也不仅仅是在俄国出现，也是今天许多国家社会转型过程当中的发展路径。弗拉基米尔·马乌（Vladimir Mau）就在自己的论著中将俄国改革同法国大革命作过比较。他发现了一个相同的逻辑：当年法国革命从“雅各宾党”到“吉伦特党”，最后一直到具有保守倾向的拿破仑执政，是通过政治形式的保守化来实现对改革成果的保护的。所以马克思说：“革命死了，革命万岁。”革命的成果是通过

保守化的资产阶级宪法——拿破仑的资产阶级宪法才得以保存下来的。^①

我们看到俄罗斯的改革过程，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Boris Yeltsin），最后再到普京（Vladimir Putin），也展现出了非常类似的过程。改革大幅度地突进，但是大幅度推进之后并没有得到自由主义的稳固、民主体制的稳固，相反在形式上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保守化。这样一个过程不断地被重复，要经过一个很长阶段的过渡，才能够使自由主义的诉求逐渐地转化为民主政体的构建。这一现象是不是体制变迁的一般逻辑呢？如是，这样的逻辑会产生怎样的国际影响？显然这又与以下重复出现的逻辑相互联系。

（二）与西方关系的周期性逻辑

非常值得人们关注的是，最近二十多年，亦即冷战结束前后的这二十多年来，为什么每一次俄罗斯与西方调整关系的结果总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在这里，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独立以来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政治发展逻辑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即几乎每一任政治领导人在其执政开始阶段总是以倾向于西方的政治选择作为开端，但是，在其执政之末，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与西方关系的崩坏或疏离。

戈尔巴乔夫改革显然是一个 20 年来俄罗斯接近西方的开端。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戈尔巴乔夫对于西方的求助不成，反被抛弃，以及苏联的最终解体。这是第一个轮回。叶利钦开始执政时以内政与外交向西方“一边倒”为起点，但是激进政策所引起的是政局不稳、民怨沸腾，乃至最终发生俄罗斯与西方交恶的科索沃战争。这是第二个轮回。普京 2000 年当选总统时，明显地以回归欧洲为起点，包括在 2001 年“9·11”事件中给了美国以前所未有的帮助。但是到了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处于相当低落的状态，卸任总统后不久，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便发生了“五日战争”^②。这是第三个轮回。梅德维杰夫（Dmitri Medvedev）接任以来，显然是又一次以“重启”与美国的关系为起点，但是，待他刚刚访问美国归来，却又传来美国抓捕俄罗斯间谍的消息。

与上述历史现象有关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二十多年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这一逻辑与国家内部结构有何关系呢？

与上述逻辑相伴始终的是俄罗斯内部政治的演变进程：也即几乎每一任俄罗斯政治领袖在其执政之初，都是以相对宽松的施政风格登上政治舞台，而到末了，总归是多多少少地走向了权力的相对集中。戈尔巴乔夫以民主化改革为开端，但是几

^① Ирина Стародубровская, Владимир Мау. Великие революции. От Кромвеля до Путина. М.: Вгриус, 2004.

^② 我认为“五日战争”时，在俄罗斯起实际决策作用的还是普京。

年以后，便走向了由一人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总统职务的局面。叶利钦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但是到他执政的晚年，却出现了“家族政治”的局面。普京总统执政初年表现的宽容和励精图治，使得俄罗斯得以重归大国的行列。但是八年执政的后期，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对于其国内政治“集权化”的尖锐批评。梅德维杰夫总统就任以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背离这种惯性，尚难断定。

换言之，上述连续四个轮回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由好转坏，往往是与俄罗斯内部政治结构“先民主、后集权”的反复重现相对应的。再进一步说，只要俄罗斯内部政治中这一现象重复出现，尽管实际情况并不像西方媒体渲染的那么可怕，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改善就始终是一个难以稳定实现的目标。

虽然，本轮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改善，出现了不少新的背景，比如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这使得双方都无力再回到“新冷战”这样一种对抗态势；又比如，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又使得作为半个西方国家的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有了一层新的接近。俄罗斯与美国《削减战略核武器协定》的确立，就是这种改善的一个鲜明例证。但是，由于上述历史逻辑的存在，俄罗斯与西方的接近，多少将受到限制。

（三）纵向的“第二次转型”与横向的“第四波改革”

俄罗斯转型研究中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范畴——“Second transition”（第二次转型）。这也是受到一位美国同行启发后提出的问题。在他看来，所谓第二次转型，在俄罗斯，大体上是在新世纪之后出现的。按照他的说法，这个过程不仅在俄罗斯出现，甚至在中国也有某种迹象。第二次转型的出现，是为了对80年代以来第一次转型过程当中出现的制度陷阱进行弥补，进行修缮，进行调整。这是一个对于转型进程的大体中性的评价。这个概念可以用来作为观察某些现象的出发点。^①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一定要用保守、改革这些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而是可以使用功能性的说法，来描述转型的过程。整个90年代，俄罗斯遇到了太多的困难：社会秩序的紊乱、经济发展的滞后、外交的消沉。如果不是普京上台以后进行的调整，现在的情况可能会更糟。尽管西方对于普京有很多的批评，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这一过程。有人认为，俄国第二次转型的起点是在2003年，标志性的事件是霍多尔科夫斯基锒铛入狱；同时，俄国和法国、德国一起，反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也是在这一年，中国也出现了一场有关“国进民退”的大辩论，来自香港的学者郎咸平对于国有企业中严重的资产流失现象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当然，2003年作

^① 关于“第二次转型”的概念，笔者第一次听到是从与卡耐基基金会学者裴敏新的谈话中，时间大约在2004年。

为一个时间概念的出现，有一定的偶然性。而且，中国的过程同俄国不一样，表现得比较谨慎，注意各方面的平衡。总之，不管是中国的还是俄国的“第二次转型”，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意义上的退却。相反，这是对于前一次转型进程的合乎理性的休整和修正，这样的—个看似停顿和进行调整的阶段，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有可能孕育着未来更大规模和更加深刻改革的到来。

在对转型进程的阶段性进行纵向比较的同时，学界还对各个转型国家进行横向比较。英国著名学者阿齐·布朗（Archie Brown）并不认同亨廷顿在其《第三波》中提出的俄罗斯转型不过是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国际进程的一部分的观点。在他看来，俄罗斯的转型自有其独具的特点，是独具特色的所谓“第四波”的一部分。阿齐·布朗认为：“第三波”民主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是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威权主义国家，比如南欧、拉美、东亚等等。而有着社会主义制度历史经历的前苏联地区表现不一样，至少在接受西方影响这一点上，俄罗斯几乎是一个独立的过程，而没有受到多少外部的影响。^①

（四）未来国际制度构建中的制度因素

俄罗斯内部制度变迁产生了怎样的国际影响呢？至少在西方，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判断，迄今依然是受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影响。这是俄罗斯转型的路径依赖中的第四个不可忽略的外部制约。

关于未来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向，学术界并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认识。目前总的来说，有三种观点：第一是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观点。在他看来，现在出现了一场新的冷战。特别是中国与俄罗斯这样推行“威权体制”的国家，重新走到了一起。虽然还是在搞市场经济，但是政治上的立场则依旧如故，这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挑战。他认为，问题不在于它们是否搞市场经济，因为，目前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已经一分为二：一部分就像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威权主义国家”，另外一部份是欧、美为主导的西方自由主义国家。^②到了“五日战争”爆发，在奥运会开幕式之后没几天，罗伯特·卡根发表文章认为，奥运会的开幕式与格鲁吉亚战争的爆发，就证明了中国跟俄罗斯这两个威权国家重新走到了一起，成为整个未来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思路。

第二个观点的美国自由主义阵营的代表人物是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他在谈到未来体制的时候认为，中国和俄国这些新兴国家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改

^① Archie Brown, *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World: Perestroika in Perspective*, Oxford Press, 2007, p.218. 转引自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候选人封帅的一篇文章：“观念、体制与领袖——阿奇·布朗眼中的俄罗斯转型”（未刊稿）。

^② Robert Kagan, “The Return of History and the End of Dreams”, *Policy Review* (a publication of the Hoover Institution), July/August, 2007.

变美国一国独大的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接受或者用暴力推翻西方的制度。关键原因是国际体制和新兴国家所处的国际地位有了根本的改观。现有的国际体制不仅具有包容性，而且善于吸收新兴国家融入自己的体制。因此在他看来，未来国际秩序的构建是非常乐观的。^①

一个是悲观的，一个是乐观的，存在两种判断。这两种观点其实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认为，目前以西方为主导的体制是非常完备的，俄罗斯和中国加入其中也可以获益，完全可以好好地进来享用，因此，也大可不必进行对抗与挑战。

但我想提的第三点，是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互动来共同构建新的体制。美国新闻周刊的主编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是印度裔的美国人，他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转型也时有尖锐批评，但是他承认民主具有多样性。^②关于民主是否是一个具有普世性的概念，普京表达的民主观点与西方不一样，与中国也不一样。中国坚持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普京则强调俄罗斯不会去搞具有俄国特色的民主，但民主原则在俄国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时间和地点加以执行。在目前的国际事务中，体制转型与国际秩序的构建显然已经发生了密切的关联。西方舆论中不可避免地已经将体制变迁因素作为国际体制构建的一个部分加以考虑。作为新兴国家，一方面完全不应按照简单化了的西方逻辑，不合情理地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但是另一方面，尽一切可能发扬民主精神，新兴国家发展和改革的合法性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证。在多样性前提下推进民主建设，这种理念将直接影响到未来国际秩序的建构。

从这一点上说，中俄之所以接近，中俄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合作的水平，我觉得除了战略利益的互补，以及历史背景的相似和地理上的接近之外，两国之所以可以比较方便地沟通，体制因素其实很重要。我认为，体制因素还是对中俄接近起了推动作用。因为当我们同样是转型国家，当我们同样背负着传统体制的包袱，当我们同时处在走向市场经济和民主的过程当中，我们碰到的是同样的困难，我们有同样的关切，我们同样受到了外部的批评。^③这种政治文化，这种感受，我觉得使得我们两个国家的接近有了一种可能性。

①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1, Jan-Feb, 2008.

② 2009年9月14日扎卡利亚在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倡导的雅罗斯拉夫“现代国家与全球安全”国际研讨会上的大会发言。

③ 冯绍雷：“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与三个‘十年’的俄国问题研究——基于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比较的一项观察”，《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4期，第9-11页。另可参见 Shaolei Feng, “China-US-Russia Trilateral Relations under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Configuration in Transitio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Challenges Ahead*, Edited by Yufan Yao, Ashgate, 2010.

四、结论与启示

对于体制变迁与对外政策的相关性研究来说，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俄国转型过程中呈现的经验和教训都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启示。

首先，俄国无论是推进改革还是推进对外政策的调整，从表面上看，一般都是危机反应。似乎只有危机才是推动俄国转型的基本动力，似乎不处于重大的危机之下，传统体制好像找不到动力让它发生变化。但是，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具有一定内在逻辑依据的转型进程，即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俄罗斯转型实际上是依傍着一定的路径而依次发生变化的。从大的过程来看，首先以民主政治为转型的切入口；难以突破之后，转向自由主义的激进经济改革。而实际上，每一轮政治领导人物的上台，总是伴随着新一轮内部政治经济改革的启动。同时，每一轮改革启动总是辅之以与西方关系的调整。但是，从自由主义的路径切入之后，我们发现的是：经济自由主义向着平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翻转，民主政治重新回归权力集中，包括与西方关系由密渐疏的离异。而且，这每一种趋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如果先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那种从自由主义—平民主义—民族主义的路径依赖转向，也就不会发生 80 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到普京，到梅德韦杰夫（与普京）几个时期一次又一次的从民主到权力相对集中（这是一个中性概念）的变化。相应地，也难以发生几乎每一个领导人执政时期外交上都反复出现的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先是相互接近、到末了又重新交恶的循环形态。至于“第二次转型”与“第四波改革”这样一些范畴的出现，则清晰地描述了俄罗斯转型的独特与艰难。而未来国际秩序构建中、特别是来自西方的“体制担忧”，也表明存在着一个俄罗斯未来发展对外关系、特别是与西方关系的有限空间。这一空间的限制，与上述来自俄罗斯社会基层与上层政治现象的重合、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惯性，一起构成了其转型的路径依赖的标尺。简言之，俄罗斯转型未必没有光明的前途，但是其演进的路径则远为曲折和偏离出发点，其转型的目标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有可能部分达致。

其次，即使俄罗斯转型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艰难空间中运行，但是，其对外政策基本上仍然呈现出积极进取的姿态。这一点和中国的外交传统正好相反。中国一般比较强调邓小平所说的“守拙”，而俄国基本上是以攻为守。即使在当代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俄国仍然奋发有为，而且显然颇有所得。这一点无论在与西方的交手

中，还是在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态势中，都有显示。这说明，即使经济危机使俄罗斯经济遭逢挑战，但是，其外交方面好像非但没有受到很大影响，反而愈加不屈不挠。问题的实质是，除了俄国人的对外事务基本倾向一向就是以攻为守之外，还在于俄国政治精英对于转型进程中非常有限的机遇与政治资源的充分运用，以及对于转型的路径依赖的深刻洞察。这使得俄罗斯无论从内部还是从外部都在渐渐地摆脱苏联解体以来的困境。比如，梅普政治的出现。就像《围城》这部寓意小说中所言的“究竟是谁领着谁走？”这样的问题，无论是对于梅普两位，还是对于西方与俄罗斯这两方面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值得推敲、而且是大有深意的问题。

再次，俄国无论内部转型还是对外政策都具有东西方兼顾的广阔视野，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曾经说过：俄国与一般帝国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其他帝国垮台了，但它存活了下来。可以说，它是20世纪最后一个被终结的帝国。它特别善于利用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空间的优势。它经历过很多失败，但它仍然能够不断恢复，重新成长起来。马克思说过，俄国是一个具有非常长远的目光、善于确定目标、并且孜孜不倦地加以追求的大国。^①因此，俄罗斯现象远没有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讲，对于体制转型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也许，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已经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

其中最困难的，是无论在思考内部体制转型、还是思考对外政策的时候，我们总需要有一个取舍的标准。这个取舍有时从体制的角度权衡，有时从外交利害关系的角度进行考虑。比如，我们多年来一直囿于对于“先进性”和“多样性”这两者之间孰轻孰重的考量。前者要求我们追随先进的发展与规范标准，而后者则遵从多样性文明共存这样的价值取向。我认为，在目前还难以确定是将“先进性”标准置于首位、还是将“多样性”置于首位的情况下，要紧的还是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沟通”，以取得平衡。不能只顾追求“多样性”目标，忘记了若干普适标准需要顾及，也不能够只顾追求“先进性”而忘却自身发展的特性。

第二个问题是选择性与规律性。我们的确发现，有一些现象即使还谈不上规律性，却也是重复出现的。比如，类似于从自由主义出发，但却走向平民主义，然后又转向民族主义的路径转换；比如，不断循环出现的放权与集权，以及与之相应的先扬后抑的与西方关系的几个周期，包括在参与国际秩序构建的过程中被强烈要求接受既存体制，等等。总之，在这些路径演进的过程中，我们有没有自己的选择性？

^① 卡尔·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内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卷，第320页。

选择性又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得以实现？选择性与历史发展的逻辑和规律之间是怎样的状态？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我们并不是轻易能够解决的。但是，俄国转型的丰富实践给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参照。

最后一个是继承性与断裂性。这是我们在思考俄国这个国家的时候需要考虑的。我们在研究俄国问题的时候常常会这样思考：因为历史上的俄国曾经如此，所以今后的俄国也会遵循旧辙。这种思路本身也许没有错。但是，正如卡尔·波普所说，历史是不会重复的。^①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对于俄国来说，它过去制度变迁的历史是不是能够证明将来，还是一个相当不确定的问题。对于俄国这个国家来说，经常可以发现它对于传统的接受态度，在很多情况下既是具有断裂性，又是充满创新性的。正如当年大家虽然看到了苏联经济正在走下坡路，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苏联的解体。同样，当人们都在预言俄罗斯依然困顿之时，不能忽视，一个未来的欧亚大国正在重新迅速兴起。

总之，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用历史来证明未来，这仍然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本文探讨的俄罗斯转型的路径问题，只是希望提供一种分析的视角，为进一步的思考给出参照。

（责任编辑 常喆）

^① 转引自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Thompson, “The Long and the Short of Global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999 summer, pp.109-140.

专题文稿：俄罗斯与西方

冷和平：解读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

理查德·萨克瓦**

【内容提要】冷战虽然结束，但大国竞争（或冲突）的现实却依旧。在1994年12月于布达佩斯举行的欧安组织首脑会议上，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曾发出警告：如果西方企图通过不断地威胁重新发动冷战的方式来打压俄罗斯，不让其追求自身“正常”的大国利益，那么这将有直接导致“冷和平”出现的危险。他的警告表现出惊人的先见之明。冷战不对称地结束了（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赢家和输家必然的逻辑，而非共同的努力），但冷战冲突的模式却以新的形式继续着。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叶利钦总统统治时期还是21世纪普京总统统治下，均未出现一个稳定、包容的冷战后国际体系。叶利钦和普京都试图将俄罗斯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以及扩大的安全体系中，但冷战被超越的方式却为未来的冲突种下了祸根。时至今日，这种冲突仍在挑战着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的领导。

【关键词】冷和平 俄罗斯 西方

【中图分类号】D83/87.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0)06-0019-(18)

俄罗斯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可以而且必须成为大欧洲一个平等的、成熟的部分，成为欧亚空间中沟通欧洲政治和人文主义价值观的桥梁，成为牢固而又可靠的、连接东亚与西欧的纽带（不仅通过运输走廊，而且通过知识和文化互动的方式）。我的祖国未来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就是成长为现代世界的知识和技术中心之一。

米·霍多尔科夫斯基^①

*本文系为2010年7月26—31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八届国际中东欧研究理事会(ICCEES)世界大会准备的会议论文，由《俄罗斯研究》独家中文发表。

** 理查德·萨克瓦(Richard Sakwa)，英国肯特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① Mikhail B. Khodorkovsky, "A Time and a Place for Russia", *New York Times*, 29 January 2010.

关于这个自称大国的国家在开始民主化进程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比较文献并没有给出多少答案。尽管没有两个国家是完全相同的，但俄罗斯的情况却与任何一个后苏联地区不尽相同。俄罗斯是一个大国，而且事实上曾一度是一个超级大国。它曾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捍卫国家认同及地缘政治利益并进入民主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大家庭^①。俄罗斯的情况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一个大国在保留其大国野心的同时，自愿放弃其以前治国的原则以及支撑他们的意识形态，并采用昔日对手的执政准则。罗马历史上也曾有惊人的相似：康斯坦丁采用基督教作为其官方宗教，罗马帝国在新的格局下又延续了三百年。就俄罗斯而言，它采用一些与自身本质上不同的对手的意识形态，这最终破坏了俄罗斯融入新秩序的全部努力，事实上也从整体上威胁着整个后冷战世界秩序。^②不足为奇地，俄罗斯以前的反对派很难接受它作为一个平等国家的地位，尤其是当这个转型国家仍保持其骄傲的独立性、并声称其在国际事务中依旧发挥作用时，更是如此。尽管俄罗斯谦虚地声称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是可替代的，但它坚决维护其自治权利。不像德国和日本，尽管二战已结束 60 年，它们在世界事务中的能动范围却依然有限，俄罗斯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被击败的国家，因而必须采取谦卑和服从的立场。^③ 地缘政治和民主混合在一起，激发着人们对于当代俄罗斯政治以及价值观的分析，这些都不由得让人想起对冷战时期苏联的讨论。

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

虽然关于民主化国际向度的研究颇丰^④，但其内部重组和外部重聚的关联性尚未成为许多学者分析的主题。对于大多数“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而言，最根本的问题一直是如何融入已有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以及如何将国际规范纳入国内政治进程中。对于俄罗斯而言，这种双重融合本质上是模糊的，这一点对于中国亦是如此，尽管方式不尽相同。在俄罗斯方面，双重融合和部分整改的模式正在发挥作

① Fo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covering China, Brazil and India as well as Russia, see Andrew Hurrell, “Hegemony, 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What Space for Would-be Great Powers?” *International Affairs*, 82:1,2006, pp.1-19; see also Andrew Hurrell, *On Global Order: Power, Value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Richard Sakwa, “‘New Cold War’ or Twenty Years’ Crisis?: Russia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4, No. 2, March 2008, pp. 241-67.

③ Dimitri K. Simes, “Losing Russia”,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7, pp. 36-52.

④ For example, G. Pridham, E. Herring and G. Sanford (eds), *Building Democracy: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Democratisation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4); Bertrand Badie, *The Imported State: The Westernisation of Political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Jan Zielonka and Alex Pravda (ed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Eastern Europe*, Vol. 2, *Inter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Facto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用。俄罗斯求助于现代先进国家中普遍存在的规范和标准，同时，它也力图将这一适应过程扎根于本土的论述和实践之中。这种本土化并非只是抽象的或普通的民粹主义，而是反映了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总统高度敏感的一些社会和政治现实。普京总统一直居高不下的民意支持率可能有些水份，但却也反映出其表达大众“民主”偏好的能力。普京治下，力图寻求新的平衡（如果说不是第三条道路），一方面要适应现有的国际准则，另一方面要确保民族认同的基本元素（samobytnost’）。^①一个“部分适应”的体制出现了，它明确地诉诸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及当代国家建设战略，同时也受到早先适应期尝试的塑造和限制。因此，双重及部分适应战略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受相互冲突的需求的破坏。为了避免国家的分裂，普京力保这些固有的矛盾不会演变为不可调和的二律背反。

自由国际主义和大国主义

从一开始，这些紧张关系就非常明显，并且贯穿于独立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四个阶段之中。第一个时期的特点是矛盾的愿望：即持续致力于将国际一体化与寻求俄罗斯的大国地位结合起来。因此，这个时期可以被称为带有大国主义的自由国际主义。时至今日，俄罗斯第一任外长（1990年11月—1996年1月在任）安德烈·科济列夫（Andrei Kozyrev）仍因为其不加批判的大西洋主义而倍受批评（通常是不公平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本人也改变了立场。他的政敌指责他以变色龙般的机会主义来保持他的职位，包括对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总统不加批评的支持。科济列夫设法将这两个明显矛盾的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他试图“保障公民权利及社会的社会—经济动态发展”；另一方面，他坚持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正常的大国，不是通过对抗、而是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其自身利益”。^②

因此，双重适应过程的第一部分相对来说没有问题，但其第二个方面，即：将当代西方国际社会的规范引入俄罗斯，比在绝大多数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远具挑战性。在这些后共产主义国家中，这被称为“条件限制”并作为加入主要西方组织的一个小小的代价而备受欢迎。截至1993年年底，科济列夫采取了一项界定更为明确的帝国拯救战略，并坚持认为，俄罗斯有权进行干预，以防其“失去通过几个世纪

^① For more discussion of this, see Richard Sakwa, “Partial Adaptation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Stephen Whitefield (ed.),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st-Communis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Chapter 3, pp. 42-53.

^② A. V. Kozyrev, “Vneshnyaya politika preobrazhayushchiesya Rossii”, *Voprosy istorii*, No. 1, 1994, p. 3.

才取得的地缘政治地位”。^①1993年12月，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在议会选举中呼吁民族主义的言论触动了许多俄罗斯政治精英，他们将他的一些思想纳入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中来。

使俄罗斯成为一个民主大国的企图从1993年初开始成为俄罗斯政策的核心原则，但这些目标（当代俄罗斯外交政策典型的、具有模糊性的特征）却不易整合。现在，科济列夫认为俄罗斯可以成为一个民主的后冷战大国，它奉行非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利益，并认为这有可能会继续使之与西方国家竞争。这种强硬的态度鲜明地体现在1994年11月科济列夫拒绝在布鲁塞尔签署与北约业已达成一致的关于“和平伙伴关系（PfP）计划”文件的行动上。根据叶利钦一个月后在布达佩斯首脑会议（1994年12月刚成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上的发言，如果西方企图通过不断地威胁重新发动冷战的方式来打压俄罗斯，不让其追求自身“正常”的大国利益，那么这将有直接导致“冷和平”出现的危险。^②当俄罗斯国家杜马的“俄罗斯选择”议员团（Russia's Choice faction）谴责车臣战争时，科济列夫背弃了他们。科济列夫成为重构意识形态权力的支持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先前所有的看法，他依旧致力于有望实现的与西方的关系。尽管科济列夫部分地认同大国的意识形态，但他的批评者们仍认为他的外交政策混乱且不够专业。^③

竞争实用主义

从1996年1月起，对外情报局（SVR）前负责人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y Primakov）开始担任外长。作为一名中东事务专家，普里马科夫曾在学术界长期享有崇高声誉，并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曾担任戈尔巴乔夫的海湾特使，肩负着力阻因伊拉克1990年8月入侵科威特而引发战争的使命。普里马科夫对西方的批判颇多，因此他的任命受到议会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欢迎。在力求保持与西方良好关系的同时，普里马科夫重申俄罗斯在中国、远东以及中东的传统盟友地位。事实上，他曾提及与中国和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缔造全球事务中的一支平衡力量。普里马科夫宣称，俄罗斯不仅是一个大国，而且也是多极化国际社会的一个基石。^④他奉行的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四个优先任务是：创造外部条件以加强俄罗斯的领土完整；支持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内的一体化倾向；稳

^① *Izvestiya*, 8 October 1993.

^② See Andrei Kozyrev, “Partnership or Cold Peace?”, *Foreign Policy*, No. 99, Summer 1995, pp. 3-14.

^③ E.g., Andranik Migranyan, *Nezavisimaya gazeta*, 10 December 1994.

^④ *Izvestiya*, 10 February 1996, p. 3.

定区域冲突（首先是在前苏联地区和南斯拉夫）以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①

理解普里马科夫外交政策的关键概念是“务实”，但这也是我们称之为有“竞争”特点的一种特殊类型。竞争实用主义让人想起赫鲁晓夫（Nikita Krushchev）的“和平共处”，该原则的假设是与西方的斗争会继续，但在核武器时代，这场斗争并不必然采取军事的形式。相似地，普里马科夫的政策基于在与西方的关系中保持竞争活力的想法，但这并不妨碍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合作。其外交政策不仅延续了苏联时期的外交思想，而且也预示着 21 世纪国际政治的逻辑。

1998 年 9 月至 1999 年 5 月普里马科夫担任俄罗斯总理期间，他在外交政策上依然具有指导性的影响力，尽管新的外交部长伊万诺夫（Igor Ivanov）有自己的看法。在 1999 年科索沃危机中，伊万诺夫采用了一些严厉的反西方言论，但很小心地不让俄罗斯陷入困境。虽然笼统表达了他们对塞尔维亚人特别是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的支持，俄罗斯领导人还是保留了自由的策略，对于塞族领导人帮助并不多。北约的轰炸于 3 月 24 日开始，经过 74 天，于 1999 年 6 月，俄罗斯帮助北约盟国和米洛舍维奇达成和平协议。在普里马科夫于 1999 年 5 月被迫从政府退休后，俄罗斯外交政策依旧保持了这种实用主义传统。

新现实主义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第三个阶段试图超越普里马科夫的实用主义传统中固有的竞争逻辑，同时力图克服在科济列夫外交事务管理中体现出的各种矛盾。2000 年普京上台后奉行的是笔者在其他场合曾提及的“新现实主义”政策。该政策基于国际政治经典现实主义的观念，即：各国不偏不倚地遵循他们的国家利益观念，但俄罗斯也试图建立一种真正等边互利的机制，以有利于俄罗斯融入欧洲以及全球建构之中。其底线是，俄罗斯试图实现其外交政策的自主权，但这不会建立在俄罗斯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集团核心的所谓“新苏联”概念的基础之上。^②然而，在后苏联空间持续的冲突，无法与欧洲联盟（欧盟）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及俄罗斯尝试与美国重启“9·11”后关系而采取积极方针的失败，所有这些都使得新现实主义政策举步维艰。

普京的不满终于在 2007 年 2 月 10 日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的讲话中得到了宣

^① *Independent*, 13 January 1996, p. 9.

^② For details, see Richard Sakwa, *Putin: Russia's Choice*, 2nd ed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Chapter 10.

泄，该讲话暴露出他对新现实主义政策瓦解的深切失望。他强调了“安全的普遍性和不可分割性”，并且警告建立一个“单极世界的危险，在这个单极世界中，只有一个主人、一个主权”，同时他也指出“那些教我们（民主）的人自己却不想了解民主”。普京列举了一系列战略问题，包括联合国的边缘化、未能批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CFE）、欧洲通过发展导弹防御的黠武主义、北约东扩的“严重挑衅从而降低了相互的信任度”、不扩散制度的弱化以及企图“将欧安组织转变为一个促进一个或一群国家外交政策利益的庸俗工具”。^① 该讲话反映出俄罗斯领导人的觉醒：西方似乎对鲁莽行为有罪不罚（如 2003 年 3 月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行径），并且无视俄罗斯的关注，这些都使得俄罗斯政策有所反弹。

新修正主义

2007 年后俄罗斯外交政策进入第四阶段，其特征尚不明确。第一阶段的融入冲动尚未消失，也没有简单的回归竞争实用主义的趋势，然而随着新现实主义计划的破产，俄罗斯的政策进入到一个十分混乱和盲目的阶段。从普京执政晚期来看，俄罗斯的行为无疑更为自信。但这是否只是因为经济复苏、政治稳定和长期的商品繁荣而使大量资源进入克里姆林宫，抑或它标志着俄罗斯要采取更为激进甚至好战的方式来获取其利益，这仍然充满争议。

从理想主义到新修正主义

俄罗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出现，与其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其潜在的修正主义机制都在发挥着作用。一个民主国家与一个独裁国家的修正主义机制显然很不相同，但在某些方面它们却同样地威胁着现有世界秩序的主导模式。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没有挑战美国的霸权，其任期内（除了最后时期）的外交政策具有“搭便车”和“加入”的特点。^② 然而，在现有世界秩序中出现一个新的、具有影响力的一极，而且是一个自称民主的（无论这种说法在事实上有多么不靠谱）的一极，最

① Vladimir Putin, “Vystuplenie i diskussiya na Myunkhenskoi konferentsii po voprosam politiki bezopasnosti”, February 10 2007, available at <http://president.kremlin.ru/text/appears/2007/02/118109.shtml>.

② James M. Goldgeier and Michael McFaul, “Russians as Joiners: Realist and Liberal Conceptions of Postcommunist Europe”, in Michael McFaul and Kathryn Stoner-Weiss (eds),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Comparative Lessons of Trans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Chapter 7, pp. 232-56.

终却构成了对现有秩序的挑战。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对于俄罗斯后共产主义的发展、它的缺陷以及它的成就的辩论呈现出一定的难度。^①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者认为，应该关注当前的俄罗斯而非未来理想化的俄罗斯。^②

俄罗斯固有的修正主义受其重新成为国际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方的驱动，是其他国家基于地缘政治历史的基础想将其“他者化”的一种尝试。大卫·莱恩（David Lane）把 2004 年秋季的乌克兰选举（其原先的选举结果被推翻）定性为“革命政变”。在这次选举中，群众动员采用了“观众参与”的方式来支持或反对实现人事变动的企图，而非对制度进行实质性的改变。^③莱恩认为，“橙色革命不仅试图改变被指有诈的选举进程，而且力图将俄罗斯界定为政治上的“他者”，笼统地将西方特别是欧盟视为“朋友”。^④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动态研究及其与政治重建的话语和实践的互动研究之间一直少有交集。^⑤民主化地缘政治的矛盾同时伴随着地缘经济困境。能源政治比习惯的“诅咒”或文学中讨论的暴利模式广泛得多，但却提出了俄罗斯参与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国际议程的问题。一个官僚、垄断的“石油国家”发现自己处在与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并列于一个新的挑战西方霸权的第三世界排行榜上的危险之中。

这些问题催生了大量研究，但最终由维持现状的心态主导着。这种心态在有志于加入欧盟的“条件性”进程的讨论中发挥到了极致，^⑥并且条件性的因素存在于更广泛的、关于竞争民主的讨论之中。然而，这种尝试正是造成东西方关系曾经紧张的主要来源之一。民主化和国际一体化相互关系的缺失，使得俄欧之间长期互不信任，但也使得双方在 21 世纪还在努力寻求某种一体化。

① For a good overview of the issues, see Andrei P. Tsygankov, for example his *Whose World Order? Russia's Perception of American Ideas after the Cold War*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his *Russia's Foreign Policy: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National Identit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and his *Russophobia: Anti-Russian Lobb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②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issue, see Anatol Lieven and John Hulsman, *Ethical Realism: A Vision for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 (New York, Pantheon, 2006).

③ David Lane, “The Orange Revolution: ‘People’s Revolution’ or ‘Revolutionary Coup’”,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0, No. 4, November 2008, p. 545.

④ Lane, “The Orange Revolution”, p. 540.

⑤ Dmitry Trenin, *Integratsiya i identichnost': Rossiya kak 'novyi zapad'* (Moscow, Evropa, 2006), goes some way along this path.

⑥ For a general analysis and a case study of “democratic conditionality”, see Geoffrey Pridham, “Complying with the European Union’s Democratic Conditionality: Transnational Party Linkages and Regime Change in Slovakia, 1993-1998”,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1, No. 7, 1999, pp. 1221-1244. See also M. A. Vachudova, *Europe Undivided: Democracy, Leverage & Integration After Commu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Heather Grabbe, *The EU’s Transformative Power: Europeanisation Through Conditionalit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冷和平

后冷战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就是原来预计会成为西方甚至是北约天然盟友的俄罗斯，竟然成了它们潜在的对手。它们双方的利益并不一致，且逐步分离。这很可能是局部因素的结果，特别是在北约东扩、伊拉克战争、以及第三阶段在中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计划等问题上的决策准备明显拙劣的结果。也有可能是结构性因素使然，特别是无法将俄罗斯纳入扩大的“西方”系统，以及俄罗拒绝成为该系统一个次要部分。同样地，毫无疑问，系统因素也在发挥着作用，特别是俄罗斯的所谓“民主倒退”，和按美国的形象重塑世界秩序的新保守主义议程所造成的西方的混乱。

冷和平的暗示

作为苏联的最后一位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克服集团对抗方面比任何前任领导人的贡献都大，他就这些问题提供了生动的评论。在他看来，苏联的“新思维”结束了冷战，而“冷战是与人类利益相悖的”。然而，他清楚地认识到，“废除意识形态冲突”并不能必然指向全面的、最终的和平。尽管核灾难的威胁已经减少（这甚至尚不确定），新的威胁却又出现。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言，“冷战结束了众多地缘政治的、民族的和种族的冲突，但这些并非皆与冷战本身相关……冷战的准稳定性形成了一种使人放心的印象，即后冲突世界秩序是可以预见的”。^① 他还遗憾地指出，“冷战结束并未使我们的世界更为安全。如今，很多人都开始警惕完全西化，正如他们之前对待全方位的、强有力的共产主义威胁一样（参见原文）。显然，西方无法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处理新思维的结果，新思维曾将整个世界从集团政治和全面对抗中解放出来”。他感到惋惜的是，新思维成果“在我们眼前凋谢”，尽管俄罗斯“张开双臂、满心欢喜地奔向西方的怀抱”，西方却未作任何回应。它既不能“制定一套新的集体安全规范也不能创造出一套新的和平发展观念。如今，冷战时期形成的机构掌握着整个世界的命运”。在他看来，欧洲进程让位于北约东扩，而“解决欧洲和全球安全问题的机械方法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却被忽视”^②。戈尔巴乔夫的观点反映了当代俄罗斯的大多数民意，他提出的问题直指主张俄罗斯利益的后共产主义的要害。

进入 21 世纪，俄罗斯和一些西方主要国家的关系急剧恶化，俄罗斯认为美国狡猾虚伪，但反过来又赞美美国将俄罗斯归入半独裁国家集团（如果不是完全独

^① Mikhail Gorbachev and Daisaku Ikeda, *Moral Lesso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Gorbachev and Ikeda on Buddhism and Communism* (London, I. B. Tauris, 2005), p. 57.

^② Gorbachev and Ikeda, *Moral Lesso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147.

裁），在致力于恢复自己威信的同时也恢复其在后苏联邻国的新帝国主义关系。不像之前的冷战时期，既没有规则来管理新的关系，也没有任何限制野心的框架。苏联时期虽然有公认的势力范围，但后冷战时期这些限制已不复存在。前苏联领土成为新的论争舞台，这一点在 2008 年 8 月俄格冲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何谓冷和平？

从广义上讲，冷和平可以界定如下：

1) 首先是一种不稳定的地缘政治休战状态，通常发生在两次战争期间，一方的“失败”不被认为是合法的，而“胜利”的另一方不能得到巩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E. H. 卡尔（E. H. Carr）在其同名作品中描述的两次大战之间的 20 年危机即是冷和平的一个例子。当时欧洲和全球安全所面临的根本结构性问题很少能得到解决，这最终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冲突，日本于 1931 年侵略满洲（指中国东北——译者注）时即已见端倪。

2) 冷和平类似于冷战。换言之，冷战接受国际体系中、尤其是某些主要大国之间冲突的逻辑，而冷和平则一方面再现冷战时期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却抑制对这种行为逻辑的接受。

3) 因此，伴随着冷和平的，一方面是受害者承担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则是令人痛苦的胜利。受害者的地位为新的冲突提供了温床，而“胜利国”却不能在某种相对不受挑战的后冲突秩序中得到巩固。这奠定了长期历史僵局的基础。

4) 因此，冷和平根植于对特定历史时期特殊性的不同的理解。对于某些人，它作为一种胜利被欣赏，这种胜利伴随着关于建设一块“适合于英雄”的国土、或者当胜利者的信仰体系普遍适用于所有人时关于描绘“历史的终结”的讨论。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迷失与困惑的时期，人们对于宣称自己为胜利者的不满情绪不断滋生，而使这种所谓的胜利得以巩固的机构则遭到诅咒。

5) 冷和平恰似冷战的孪生兄弟，均基于无情的价值论逻辑之上。这并不仅是意识形态二元性和国家制度两极论的再现，而且是一套根深蒂固却又相互对立的价值体系，这两种价值体系根植于自身的地缘政治见解，并诋毁对方是无效的、不合法的。一方的整体普适性受到另一方关于多极化和世界多元体系的批驳，后者认为世界体系应该能够容纳众多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上述特征适用于跨战争年代的“二十年危机”，也适用于后冷战时期的冷和平。然而，每一次冷和平都具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和关注点。当代冷和平有以下特点：

1) 意识形态“多极化”的说法，含蓄地反对现存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单极霸权，并强烈要求大国间的“平等”。

2) 俄罗斯日益孤立，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对抗日益严重。

3) 寻求新的合作伙伴，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并向乌戈·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抛出橄榄枝。此外，尝试重建与昔日的伙伴，特别是古巴和叙利亚的关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重建与越南的联系。这与发展同世界排名中游的国家如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4) 尝试将后苏联空间整合到俄罗斯主导的一体化项目中。尽管很少强调独联体国家，甚至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联盟也已不是关注的重点，但像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这样的机构还是颇受重视的。随之而来的是反对前苏联国家（不包括波罗的海诸国）加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安全机构，尤其是北约。

5) 在 1945 年之后的几年里，俄罗斯（以苏联为幌子）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是在国内解冻以融入国际社会，还是继续在国内进行镇压、在国际上持敌对态度？俄罗斯选择了后一条道路。1991 年后，俄罗斯面临着相似的选择：要自由民主和融入国际社会还是恢复传统的专制政权，社会再次被国家窒息而亡。依托自上而下的国家干预的现代化事业，无法通过自下而上或自中而上的方式来释放现代化的全部潜力。所谓自中而上，即指从官僚桎梏、猖獗腐败及不安全的财产权利中将企业的能量释放出来。事实上，国内的自由发展与树立大国利益之间的张力始终贯穿当代的冷和平。这种紧张局势持续存在的事实表明了这个问题的结构性根源。

6) 冷和平体制的本质，部分地在于地位和尊严。只有俄罗斯（可能还有塞尔维亚）在冷战结束后经历了重大的地缘政治迷失，随之而来的还有国家尊严的被践踏。在此背景下，大国的小小挑逗都可能激发该国强烈的反应，而像在波兰和捷克共和国部署第三级导弹防御系统（ABM）、计划将北约扩展到乌克兰这一历史上俄罗斯国家的核心地带以及在格鲁吉亚的挑衅，均被看作是对俄罗斯大国抱负的挑战，而且也是对俄罗斯生存的一种现实威胁。^①

7) 就西方大国而言，冷和平出现在俄罗斯的民主倒退之际。从这个角度看，俄罗斯国内环境的变化使人们对其作为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合格成员的信誉产生了怀疑。对俄罗斯民主体制的稳定性和民主行为的持续性的迫切关注，迅速延伸到了关于民主政治文化的可用性问题，以及关于俄罗斯是否有资格成为西方文明社会的一员的问题。当然，当俄罗斯试图重申其在全球合法权益时，这些问题备受关注。俄罗斯作出了回应——民主是一国的内部事务，俄罗斯转型的步伐不容外人评判——但这却无法增强西方伙伴的信心。因此，冷和平具有消极的动态特点：对内加强

^① This is the way Medvedev described it to the members of the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in September 2008.

控制丧失了对外主张的合法性；而对部的独断专行只能证明国内民主紧缩的程度。

8) 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差异一般不会发展为对抗，而在有冷和平特点的国家之间，对抗则是一种常态。

解释

缘何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中持续存在着危机？关于这一现象原因的解释包括三个主要思想流派。第一个流派注重俄罗斯的国内因素，第二个流派注重文化因素，而第三流派采取的是结构性方法。

1、国内动态

虽然对于所有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而言，共产主义的倒台被看作是解放的时刻，而在俄罗斯，人们的情绪则更为矛盾。在大多数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民主对应着国家的自我肯定、国际经济政治一体化以及民主转型，但在俄罗斯却并没有这样的内外相互加强的过程。相反，民主与其他转型之间的关系永远充满了相互抵消。更糟的是，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混乱地过渡到市场经济的经历将政治民主化与社会秩序全然割裂开来。20世纪90年代之于俄罗斯，就像70年代之于英国的神话制造者那样。^①“混乱的90年代”的神话的确成为普京时代的大事，2008年起又成为梅德韦杰夫治下的主题。^②十年的成就被诋毁。^③

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描述美国面临称霸世界和领导世界的选择，其中两个主要特点，即“国际霸权和民主”，可能会相互冲突。在他看来，这种“独特的组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大众民主的向外扩张与准帝国责任是否相容？”^④ 尽管规模不同，但俄罗斯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因为对于该国领导人来说，成为大国的愿望和自尊被认为与其民主发展完全兼容；但布热津斯基等人则不那么认为。正是这种观念的根本不对称性激发了人们对“新冷战”发展问题的广泛关注。

2、文化因素：俄罗斯作为欧洲的“他者”

欧洲历来是通过纳入和排除的方式来对自身做出界定。相对于众多“他者”，欧洲的身份得以构建，尽管这个“他者”会随着时间而发生改变。这个“他者”在

① As Elliott and Atkinson note, “For both Labour and the Conservatives, the 1970s have become the equivalent of the Dark Ages”, Larry Elliott and Dan Atkinson, *The Gods that Failed: How Blind Faith in Markets Has Cost us our Future* (London, The Bodley Head, 2008), p. 149.

② Nikolai and Marina Svanidze, *Medvedev* (St Petersburg, Amfora, 2008), pp. 120, 121, 287, and *passim*.

③ For a defence of the 1990s, see Leon Aron, “Was Liberty Really Bad for Russia? (Part I)”, *Demokratisatsiya*, Vol. 16, No. 1, 2008, pp. 27-36; “Was Liberty Really Bad for Russia? (Part II)”, *Demokratisatsiya*, Vol. 16, No. 2, 2008, pp. 131-142.

④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Choice: Global 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4), p. 179.

不同程度上涵盖着亚洲、非洲、甚至美国，特别是这些大陆上的民族。^①像德国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都没有幸免被“他者化”，法国谚语“非洲始于比利牛斯山脉”反映出对欧洲空间范围的看法。^②在欧洲国家体系中，传统的“他者”一直是处于欧洲边缘的“土耳其人”，他们长期处于衰败的状态，被称为“欧洲病夫”。但俄罗斯不仅构成了“他者”，而且它进入欧洲国家体系和政治也被视为是对欧洲自身的威胁。^③

由于其不规律性及初期的混乱，再加上声称自身与众不同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要求，俄罗斯一直被视为非欧洲。^④正如纽曼（Iver B. Neumann）所言，俄罗斯被认为是欧洲的穿山甲，一个在过去五百年中威胁着欧洲原则和欧洲认同的怪物。^⑤二十世纪晚期，对于俄罗斯扯苏联大旗做虎皮，人们感到恐惧，但这种恐惧却有助于推动西欧一体化进程，这一计划最初是建立在要将俄罗斯排除在欧洲之外的基础之上的，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共同的欧洲认同。在后冷战时期，这又导致了“冷和平”的出现，似乎这块大陆统一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均未得到解决。

3、结构性因素

当代民主化理论的大多数内容是关于转型国家适应当代世界秩序的规范，即我们所定义的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遍原则的霸权。^⑥这引发了人们对下列话题的讨论：成功的民主化所必需的先决条件（社会的和经济的）的相对比重；文化因素的作用；内源性因素的影响（过渡过程本身）；民主的精细化（包括体制设计问题）；外源（国际）因素的作用；以及试验性元素——即对这个主题进行学术讨论时常常被忽视的“边干边学”的因素。^⑦不过，关于适应及条件性的文献几乎没有谈及诸如俄罗斯作为后苏联时期一个欧亚大国的合法利益的程度的问题，包括残酷的竞争以期获得经济和战略优势、攫取该地区的能源资源并得以控制能源运输。俄

① Luisa Passerini, “From the Ironies of Identity to the Identities of Irony”, in Anthony Pagden (ed.), *The Idea of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01.

② Iver B. Neumann, *Uses of the Other: “The East” in European Identity Form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11.

③ Neumann, *Uses of the Other*, p. 60.

④ Gerard Delanty, *Inventing Europe: Idea, Identity, Reality*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5), p. 11.

⑤ Neumann, *Uses of the Other*, p. 109.

⑥ Laurence Whitehead (ed.),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satio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⑦ For classic presentations of “transitological” concerns, see Larry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s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John D. Nagle and Alison Mahr, *Democracy and Democratisation: Post-Communist Europ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ndon, Sage, 1999).

罗斯的后帝国宣言与新帝国关注及来自该区域外的扩张霸权主义发生冲突。^①外部因素是影响俄罗斯民主危机的关键。

几乎从最开始，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就充满了大国意识，但对其作为一个大国的解读则迥然不同。^②同时，战后一边倒的美国霸权时代只是历史的偶然，不可能长期存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共产主义为方向的“第二世界”在1989—1991年的崩溃，为众多潜在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第三世界”挑战者的涌现扫清了道路，而这已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关键主题。新兴强国的崛起，并向成熟强国霸权和多边机构的现有结构进行挑战，这些都预示着一个全球冲突新时代的来临，而且也有可能具备超越俄罗斯与旧有列强关系恶化的结构性因素。

新修正主义

从历史上看，外来者的入侵常伴随着混乱和战争，包括对自身内部的破坏。最近有很多关于“大国崛起”的讨论，特别是关于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的崛起，并将其与十九世纪后期德国和日本的崛起进行历史比较。德国、日本这两个国家从根本上变成了修正主义强国：不满现状、各种思想涌现，要求对大国体系重新排序（如有必要，诉诸武力），这一特殊的挑战揭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世界战争的序幕。今天的局面却并非如此。俄罗斯和土耳其都无意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而只要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因此，他们不是修正主义强国，而是新修正主义国家。

介于冷战和热和平之间

然而，这不足以构成一场新的冷战。俄罗斯和西方强国十分清楚，他们都无力再开辟一条无缘无故的新战线，尤其是面临许多现有的挑战时（经济上的，而且对美国来说还有中东和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严重威胁）。最重要的是，持续冷战已丧失其所必需的基本的结构性先决条件。俄罗斯当然不处于对美国霸权构成系统性挑战的中心，它不仅缺乏进行这种挑战的资源，而且也不具备思想基础和公众基础。另一方面，俄罗斯远不是美国所要优先考虑的对象，超级大国两极化的时代已不复存在。显然，他们关系中关键的要素依旧至关重要，首先在于管理好自己的核武库并确保相互毁灭的威胁仍然受到条约和冲突制约程序的约束。他们平等地承担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解决在世界各地冲突的义务。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

^① For a powerful expression of this, see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Premature Partnership”,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2, March-April 1994, pp. 67-82; and his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② For a good overview, see Thomas Gomart, *Russia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Putin's Legacy*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8).

年年初推出的美俄关系“重启”的基础。

俄罗斯并非新苏联，但它作为一个自信的、我行我素且有自己计划的国家重返世界舞台，极力维护其主权，并渴望拓宽其视野。在这一背景下，其与西方以及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是指一个已然过去的时代，不能充分展示俄罗斯不仅认识到其利益所在而且正开始制订策略去实现这些目标。现在的政体与国家目标的改革意识结合起来了。俄罗斯仍继续沿着西方路线致力于其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但它这样做时却越来越反西方，认为自己是“第三西方”。^①“文明辩论”假定俄罗斯为西方文化的替身，^②并含蓄地将俄罗斯视为基于帕夫洛夫斯基（Gleb Pavlovskii）所称的“欧—东”新安全体系的中心。^③

当代俄罗斯新修正主义的特点

当代俄罗斯新修正主义没有挑战建立在制度性或思想性批判基础上的国际制度的基本准则。它没有提议全面修订当代的实践及准则，这其中有许多是俄罗斯（以苏联或俄罗斯的名义）参与制定的。因此，俄罗斯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一种特权，它既不放弃也不淡化。同样，俄罗斯也是目前日益分化的赫尔辛基进程的创始成员，尽管它必将对现已改名为欧安组织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因此，新修正主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修正主义，因为俄国不要求修改现有的国际秩序，但又与原来的赫尔辛基进程背道而驰，要求主要大国遵守共同制定的国际体系的规则，并要求在这一体系中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俄罗斯远非一个持续的修正主义大国，因此关于“搭便车”和“制衡”的文献众多，尽管也完全相关，但却需要在一定的语境中来领会。俄罗斯是一个新的修正主义大国，乐意（至少目前如此）支持美国的霸权，只要俄认为其切身利益和威望得到承认。因此，俄罗斯在安全和规范领域的各项举措并非旨在推翻现有的秩序，而在于使其更具包容性和普遍性。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各种举措与其国内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一点可与土耳其的发展进行比较。土耳其也是一支新修正主义的力量，作为一个独立的外交政策实践者和区域性国际政治的枢纽重新出现。伴随冷战的结束，土耳其不再像过去那样锁定在美国的联盟中。^④一个新的、保守的安纳托利亚中产阶级正在挑战伊斯坦布尔的世俗精英。而与此同时，土耳其伊斯兰教（土耳其国家认同的基础之一）正在迅速

① Cf. Dmitrii Trenin, *Thinking Strategically About Russia*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December 2008).

② Andrei P. Tsygankov, “Self and Oth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Learning from Russian Civilisational Debat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Issue 4, December 2008, pp. 762-75.

③ Gleb Pavlovskii, “Rossiya vse eshche ishchet svoi rol’ v mire”, *Nezavisimaya gazeta*, 31 May 2004.

④ Graham E. Fuller, *The New Turkish Republic: Turkey as a Pivotal State in the Muslim World*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2007).

地世俗化。^①“零问题”外交政策可以追溯到伊斯梅尔·杰姆（Ismail Cem）1997年6月至2002年7月担任土耳其外长期间，但该政策的制度化则是在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2009年5月2日就任土耳其外长时才得以实现。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曾是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2002年以来担任正义与发展党主席兼土耳其总理）的外交政策首席顾问，其主要学术著作作为2001年著的《战略纵深》（Stratejik Derinlik），该书主张这样一种外交政策，即重新评价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认为该历史是其关于历史中“流动性”重要思想的一部分。这些因素（包括试图与亚美尼亚关系正常化）整合在一起，为更加灵活的土耳其外交政策提供了思想和社会基础。外交政策中军事的作用（虽然曾经促进其与以色列联盟的政策）日渐减弱并逐步让位于其他区域的优先事务。^②同样，欧盟作为土耳其外交和国内政策驱动器的作用也正在失去吸引力，这从民众对加入欧盟不断下降的支持率中得到了反映，但在官方言论中，加入欧盟仍然是土耳其的一个核心目标。

欧盟和其他欧洲机构可以作为杠杆调节俄罗斯的作用一直相对薄弱（虽然不至于微不足道），而正是由于这个因素，再加上缺少联系，使得李维斯基（Levitsky）和卫（Way）之争帮助把俄罗斯推到向独裁发展的方向。^③在土耳其，这一杠杆仍然强劲，只要欧盟成员国的资格依然有望。但在俄罗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国内因素。作为一个大国的自身形象确定了其国内和外交政策互动的模式，在当今世界上只有美国和中国能与其平起平坐。^④

俄罗斯有效政策基金会（Effective Politics Foundation）主席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指出，俄罗斯“希望成为一个拥有帝国文化、帝国胸怀和帝国风范的民族国家”。但他又赶紧补充说，他无法断定哪个集团“想建立一个真正的帝国并将准备为此付出代价或为此去冒任何风险”。^⑤俄罗斯最多是想建立一个代理帝国，即俄罗斯的“特殊利益”能得到承认的区域。

人们可以进一步认为：俄罗斯自信的外交立场并不预示着任何实质意义上新帝国野心的死灰复燃，却反映出一种“仿帝国主义”，在这里，对外野心的形式得以

① A point stressed by a reviewer of Fuller's book: Fadi Hakur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5, No. 6, 2009, pp. 1276-77, at p. 1277. For a detailed analysis, see M. Hakan Yavuz, *Secularism and Muslim Democracy in Turk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 For a detailed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omestic changes and foreign policy, see Ali Carkoglu and Ersin Kalaycioglu, *The Rising Tide of Conservatism in Turkey*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9).

③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apter 5.

④ For a sophisticated analysis of these interactions, see Paradorn Rangsimaporn, *Russia as an Aspiring Great Power in East Asia: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 from Yeltsin to Puti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⑤ Gleb Pavlovsky interviewed by Jay Tolson and Danila Galperovich, "Kremlin Political Consultant Sees Medvedev as Best Choice for 2012", RFE/RL, *Russia Report*, 21 January 2010.

保留，首先是作为塑造制度的权利，伴随着对地位和尊重认可的需求，但这些雄心也是由希望效仿最成功的现有大国派生而来的，而不是要在其整个体制内实现系统的重新排序。在这种背景下，根据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描述^①，帝国的概念不是建立在发挥直接权力的殖民地模式基础之上，而是基于广义的国际行动主义形式，这种形式由于声称比小国拥有文化优越性而得到加强。^②这并不等同于企图修改现有的权力均衡，或重新安排国际体系，但它的确在我们称之为新修正主义的规范化逻辑中运作。

新修正主义的立场在行动中得以反映。俄罗斯谈判代表们因为拼命讨价还价而臭名昭著。不过那些参与这一进程的人，尤其是欧盟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官员，强调说，莫斯科很少试图破坏整个工作，因此他们建设性的做法自然冲淡了这种夸张的言论。这同样适用于概念层面。俄罗斯对人权和民主标准普遍性议程的主要批评不是说它们不合适，而是在于它们已被霸权国同化并被有选择地应用。毕竟俄罗斯于1991年经历了一场民主革命，其根本目的是将这些规范纳入新的政治秩序，基础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新思维”和“欧洲共同家园”。而之后，1993年宪法则赋予了这些愿望以体制的形式。自1993年以来，应用顶多限于局部，民主的形式主义破坏了政治的多元化、多样性和竞争的精神；然而，俄罗斯并没有提出一套可替代的规范。

90年代初俄罗斯还是热情的规范接受者，而到2000年后期，则成为规范的监督者。它寻求修订赫尔辛基进程并且不再将普世性局限于西化的过程，以便与更趋多元化的欧洲国家体制相符合。这是俄罗斯前外交部长伊万诺夫着重强调的一点。他争辩说，俄罗斯是维也纳大会最忠实的执行者，力求规范现行的国际法律并稳定威斯特伐利亚和平。而现在，这一点又从俄罗斯极力宣传联合国的行动中反映出来。^③俄罗斯没有推翻现有的规范性框架，而是在新修正主义框架内极力确保其普遍应用。^④新修正主义的一些主题被美国的奥巴马政府解读为自相矛盾，因为它力求远离布什的单边主义，因此奥巴马特别强调联合国的作用、对国际法的尊重、相互尊重、以及承认世界多极化。不过，就俄罗斯而言，新修正主义意味着一种微妙的平衡策略，一方面需要融入霸权秩序，另一方面又公然转向修正主义。

①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② On this, see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5).

③ Igor S. Ivanov, *The New Russian Diploma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2).

④ Cf. Hiski Haukkala, “A Norm-Maker or a Norm-Taker? The Changing Normative Parameters of Russia’s Place in Europe”, in Ted Hopf (ed.), *Russia’s European Choic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35-58.

当然，俄罗斯不愿成为一个被动的规范接受者，它坚持认为它是后冷战秩序的共同制订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成为一个全面的规范创新者。在制订规范时，俄罗斯根本的关切在于，确保有能力把文明多样性和文化差异纳入规范性领域。因此，俄罗斯就普世性提出了一个多元的方法，这正是其新修正主义的本质。作为规范制订者，俄罗斯的野心是有限的，尽管它确实强调国家主权和多极国际秩序。这些很难说是革命性的立场，更谈不上是完全的修正主义，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与英国和其他地方的欧洲怀疑论者观点相同。

结 论

冷战不对称地结束了（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赢家和输家必然的逻辑，而非共同的努力），但冷战冲突的模式却以新的形式继续着。我们将普京的外交政策定性为“新现实主义”，批判了普里马科夫 90 年代末在外长任期内的勃勃野心，普里马科夫在“实用主义”这一模糊概念框架内声称俄罗斯在世界政治中的独特地位。俄罗斯不愿充当一个被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称之为对某一国家的霸权作出反应的“制衡”大国，而是倾向于“锦上添花”，并成为有力的“参与者”。普京坚持俄罗斯保留其在国际政治中的“自治”，同时摒弃早期的关于俄罗斯可以替代大国集团核心的想法。然而事实证明他的坚持是不能长久的。俄罗斯错失了融入霸权国际秩序的机会，我们正进入一个充满对抗和混乱的新时代。

俄罗斯正从一个墨守成规的大国转变为一个特殊类型的修正主义大国（我们称之为新修正主义），自称是规范制订者，而非仅仅是规范接受者。2008 年历时五天的俄格冲突显示了后冷战秩序的系统性退化和地缘政治论争的重新抬头。我们正面临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危险，即：大国竞争、国际政治军事化和伴随着后意识形态冷战元素而来的对后共产主义和平的结构性侵蚀。与此同时，冷和平有可能被转化为对后冷战国际秩序更持久的调整，部分原因在于 2008 年俄罗斯和美国的大选。新冷战很可能出现，然而现有的冷和平包含了结构性的不稳定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再次威胁世界和平。

（张红 译）

【Abstrac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as been announced many times, yet the reality of great power rivalry, if not conflict, refuses to die. At the Budapest summit of the OSCE in December 1994 president Boris Yeltsin warned that attempts by the West to discredit the pursuit of Russia's 'normal' great power interests by forever raising the

spectre of a revival of the Cold War threatened precisely to lead to the emergence of a 'cold peace'. His warning proved strikingly prescient. The asymmetric end to the cold war (briefly defined as restoring the logic of winners and losers rather than a common endeavour) sustained systemic patterns of Cold War conflict, although in new forms. Neither under Yeltsin in the 1990s nor under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in the 2000s has a stable and inclusive post-cold 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emerged. Both Yeltsin and Putin sought to integrate Russia into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as well as into an enlarged security system, but the way that the original Cold War was transcended laid the seeds for future conflict that challenge the Barack Obama and Dmitry Medvedev leaderships to this day.

【Key Words】 Cold Peace, Russia, the West

【Аннотация】 Хотя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закончилась, но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или конфликты)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до сих пор остаются реальностью. На проведённом ОБСЕ в декабре 1994 г. Будапештском саммите президент Борис Ельцин издал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 Если Запад будет пытаться путём постоянных угроз повторно развязать «холодную войну» с тем, чтобы помешать России в достижении своих «нормаль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крупной державы, то это напрямую приведёт к риску «холодного мира». Его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 оказалось предвидением.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асимметрично завершилась (ч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интерпретировано, как неизбежная логика победителей и проигравших, а не совместные усилия), но структура конфликтов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продолжает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в новых формах. Будь-то во время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а Бориса Ельцина в 90-е годы прошлого века или во времена правлен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Путина в начале 21 века, всё же не была сформирована стабильная и всеобъемлюща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система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Ельцин и Путин пытались вовлечь Россию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систему и расширенную систем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днако оставшиеся модели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посеяли семена для будущих конфликтов, и по сей день эти конфликты все ещё бросают вызов руководству Барака Обамы и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холодный мир, Россия, Запад

(责任编辑 黄翔)

主观性很重要 ——重新思考俄罗斯与西方关系*

瑞加娜·海勒**

【内容提要】在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典型特征是情境性前后矛盾的重复出现，即立场的不对称变化以及与参与政策形成巨大反差的行为。这种不合逻辑的外交政策行为突出表现在2008年俄格冲突、北约东扩和美国计划在西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过程中。传统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以行为体为中心，都假设行为体的政策偏好不是易变的，所以对俄罗斯这种让人困惑的外交政策行为时缺乏解释力。外交政策受到行为体对世界的主观解读和情绪的影响。俄罗斯不被西方尊重的感觉导致了两者的冲突，俄罗斯的“愤怒”是不被尊重的感觉导致的情绪化判断，是为了显示自身的重要性而非起破坏作用。分析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主观性因素，为更好地理解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和分析的角度。

【关键词】俄罗斯与西方关系 前后矛盾 理性 政策偏好 主观性 情绪 尊重 愤怒

【中图分类号】D83/87.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0)06-0037-(18)

导 言

俄罗斯仍然是西方^①的重要伙伴：她是欧洲政治安全大厦不可或缺的支柱，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和愈加重要的经济伙伴。所以，与俄罗斯建立建设性关系仍然会

* 本文曾于2010年7月26日至3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中东欧研究理事会(ICCEES)世界大会会议上宣读。经作者授权《俄罗斯研究》独家中文发表。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 瑞加娜·海勒(Regina Heller)，德国汉堡大学和平研究与安全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博士。

① “西方”这个概念传统上指的是地处欧洲和北美的国家和政治组织。

是西方的政治决策者们的一个重要目标，反之亦然。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十分复杂，其特点表现在两者之间多种不同形式和在多个不同领域的互动。各方的种种利益和动机，以及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都影响着俄罗斯与西方之间互动的质量和动态，这么说是合乎逻辑的。而且，有关的各方都拥有维护或者损害自己利益的潜在性和权力。

所以，对西方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把俄罗斯的利益和动机理解成对俄关系的一个因素，把俄罗斯的行为理解成对西方的要求、利益和行动的回应。但通常这样的理解是很少见的。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典型特征是情境性前后矛盾的（重复）出现——立场的不对称变化^①——或者与参与政策的当前趋势和动态（通常是积极和建设性的）形成巨大反差的“摇摆”^②——“有时甚至以严重冲突为代价”^③。在后苏联时代，西方的政治决策者们面对的是有时让人感到困惑的俄罗斯外交政策行为。

例如，与北约东扩有关时^④，或者处理巴尔干地区的冲突时^⑤，亦或 2007 到 2008 年期间反对科索沃独立时，这些行为在俄罗斯对西方行动的口头抗议和在其处理普遍性问题时采取的“封锁战术”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俄罗斯 2008 年对格鲁吉亚分离主义地区阿布哈兹和南奥赛梯的承认，和其采取的明显与西方对抗的姿态都同样让国际社会感到困惑。俄在 2008 年 8 月俄格冲突中的反应都出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意料。^⑥在这场冲突中，从俄罗斯严厉的措辞，到其领导人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干预南奥赛梯的地区冲突并把军事行动扩大到格鲁吉亚的核心领土，到最后承认南奥赛梯和阿布哈兹的独立，无不让人不解甚至震撼。从西方的角度看，俄罗斯的态度似乎是前后矛盾和不合逻辑的：俄罗斯新当选的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不是准备更多地致力于国际合作和与西方以及西方组织建立良好关系吗？相比于与建立西方积极的、建设性的和互利互惠的关系以及与欧洲进行安全合作，在后苏联时代，俄罗斯领导人更渴望俄罗斯重新崛起为大国，恢复以前的势力

① Deborah Welch Larson, “Trust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8, No. 3 (Sep., 1997), pp. 701-734.

② Anne L Cluna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ussia's Resurgence: Aspirations, Identity, and Security Interests*, JHU Press, Baltimore, 2009.

③ Alexander Lukin, “From a Post-Soviet to a Russian Foreign Policy”,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08, Vol. 6, NO. 4, pp.52-65.

④ Vincent Poulio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Practice: The politics of NATO-Russia Diplom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0.

⑤ David Mendeloff, “‘Pernicious History’ as a Cause of National Misperceptions: Russia and the 1999 Kosovo Wa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March 2008, Vol. 43, NO. 1, pp. 31-56.

⑥ Richard Sakwa, “‘New Cold War’ or twenty years’ crisis? Russia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rch 2008, Vol. 84, NO. 2, pp.241-267.

范围，并且认为这么做是值得的？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俄罗斯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很快又“恢复常态”了呢？

许多观察家在俄罗斯对美国计划扩大北约或者在欧洲大陆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立场中也发现了相同的让人困惑的逻辑。俄罗斯的“反对”似乎完全不能用“理性”的论证来修饰（“北约扩大或导弹防御系统都不是对俄安全的威胁”）。莫斯科的立场似乎有其他的解释。很明显，这些立场都来源于俄感觉受到了西方代表们的不公正待遇。但除了这些“封锁”和对抗，人们也能观察到俄罗斯有时不对称地转向其西方伙伴时所体现出来的动态。比如，俄罗斯过于乐观地“拥抱”西方并施以恩惠，虽然这不一定会带来政治或者经济上的“收益”。这些行动，比如“9·11”之后俄罗斯对于建立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全球联盟的帮助，毫无成果并且又一次以沮丧和对与西方关系前景与本质的“失望”^①告终。所有这一切不由得让人猜想这些问题的象征意义比出于战略利益考虑的权力权衡更加重要。

这些前后矛盾使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有时难以捉摸，并且不断地激怒俄的西方伙伴。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俄罗斯的立场和行动又可以用理性的战略考虑来解释，除此之外则几乎和经过仔细权衡的战略的外交政策利益不相符。仔细观察的话，特别是因为与西方维持良好而稳定的关系似乎预示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所以，在这篇论文里笔者将试图阐述一些思想，以便我们从理论和分析的角度来更好地理解俄罗斯在处理与西方关系中前后矛盾和代价高昂的行为。笔者认为这种前后矛盾源于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明显超出了传统“理性”范式的范围。关于理论，我们将研究以主观性这个概念为核心的方法和学科。笔者认为，主观性是指不可客观化的驱动力以及其对一个政治行为体在社会互动中的判断与行为的影响。来自神经科学、个体及社会心理学的新思路对于解读国际关系，特别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中的心理的、主观性的逻辑很有帮助。

笔者将以以下方式展开论文：第一部分将讨论传统的以行为体为中心的、“理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前后矛盾（外交）政策行为中的局限。第二部分将阐述另一种超越理性范式局限，并且结合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学术著作的观点，分析国际关系中的主观因素并将其理论化、概念化。由于这些著作都是围绕主观性和情绪性这个概念展开的，所以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心理因素相关。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行为，所以在第三部分，笔者将阐述一部分著作，解释俄罗斯，特别是它与西方的关系是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主观性的一个明显案例。在论文结尾，笔

^① Alexander Aksenyonok, “Paradigm Change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08, Vol 6, NO. 4, pp.66-77.

者将总结论述并且论证，一旦使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主观性行为模式可视化，我们就能更好的地理解并积极影响俄罗斯与西方整体关系中的互动动态。

一、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前后矛盾和以行为体为中心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

关于外交政策行为的传统理论都是以国际关系为指导，以行为体为中心的。这些理论假设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行为的推动力是利益（zweckrational）或者价值（wertrational）动机。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的角度看，选择和行为都服从于“推论逻辑”（效用最大化、利益动机），而自由建构主义则假设外交政策遵循“适当性逻辑”（规范、价值动机）。在不同的解读中，对于利益和动机来源的假设差别很大。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认为外交政策行为的动机是权力的积累和安全，自由主义认为是政治与经济利益和国内集团的偏好，自由建构主义则认为社会规范指导外交政策。

然而，这些理论流派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假设行为体的政策偏好不会轻易改变。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的角度看，偏好是不变的。只有自由建构主义假定偏好可以变化，但是变化得很慢，所以也是相对稳定的。尽管如此，关于俄罗斯的经验性证据显示，她对西方的政策偏好可以变化得很快，并且在本质上是非常不稳定的，而非不变或者稳定。这与传统的以行为体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假设是不同的。因此，以行为体为中心的传统理论难以解释俄罗斯外交政策中持续的前后矛盾。然而，这些理论会认为俄罗斯的“摇摆”是效用计算彻底改变（客观的/实体化的）的结果（比如，一个国家环境转变之后，或者政权更迭之后），亦或是新的社会规范和身份形成出现的结果。就算在这样的假设下，外交政策也仅仅是逐步的转变和变化。以摇摆、决裂、转变、相冲突的立场，以及随着时间发展而不断被复制的不一致的特征和行为模式为形式的前后矛盾也极不可能。

什么能解释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呢？笔者认为基本上是因为所有以行为体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都采取“理性”范式，例如，政治选择和行为都经过理性加工，然后得出理性的判断^①。这种构思适用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除此之外，还适用于建构主义的思路：行为是社会规范的“结果”，所以行为具有客观价值。按照传统理论的观点，政策偏好受客观偏好的指导。比如说，对于一个问题的偏好

^① Jonatha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5, Vol. 59, NO. 1, pp.77-106.

具有内在（物质的或观念的）客观的价值，独立于行为体具体的、情境性的利益。尽管如此，从理性范式出发，也特别难以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对西方的外交政策行为和态度变化会如此之快，以及为什么俄外交政策决策者在不断地对西方国家（或西方组织）示之以消极态度的同时或随后又高喊与（其他的或者同样的）西方国家或组织建立良好的合作和建设性关系。传统的以行为体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本身不能解释不稳定的决策结果，理性范式也不能解释（表面上的）自损效应——与利己概念或者对行为体的社会性制约的内化理解相反^①。

表 1 国际关系理论中以行为体为中心的方法对外交政策行为的解释

解释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制度主义	自由建构主义
偏好的本质	不变的	相对稳定
动力	自身利益（权力，福利，安全）	社会建构的规范，身份
行为差异的原因	固定偏好的差异	（缓慢的）不断变化的对规范的背景的评估
人类决策的路径	反思过程	
选择和行为逻辑	“推论逻辑”	“适当性逻辑”
理论空白	对人类形成偏好/超越宏观层面的快速变化和“摇摆”的原因性动态没有解释力	

所有这些都让人不禁要超越传统理性范式去寻找对俄罗斯外交政策行为中的前后矛盾的解释。这些前后矛盾似乎不是纯理性加工的结果或者作用。

二、主观性很重要——超越“理性”范式去理解外交政策模式

在这些案例中，当人们的行为方式不是传统的、“理性的”理论预想的那样时，我们需要重视外交政策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和依附在一个特定政治目标上的非实体化（比如，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的价值。那时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外在的、实体化的现实，而是一个或者一群行为体的主观的“内在现实”。研究者们越来越意识到以上论述的理论空白，他们试图找到补充的途径或者更合适的模型来解释更复杂的外交政策图景，笔者研究俄罗斯外交政策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超越“理性”范式和从其他学科学习在宏观层面下研究人类决策与行为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关于理论，有一整套以主观性这个概念为核心的方法与学科。主观性是指一个

^① 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2004.

或者一群人的建立在个人印象、感受、看法和情绪而非外部事实基础上的观点、信念和欲望。更客观地说，主观性是指不可客观化的驱动力——比如（历史）经验、意图、知觉、情绪、欲望与愿望——以及其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对判断与行为的影响。考虑到这种主观性因素，由此国际关系不仅受到战略（物质的、受政治驱动的）互动或者社会规范的指导作用的影响，而且受到对作用、重要性和对一个特定政策和主题的权衡的主观解读的影响。

特别是，心理学为填补这些空白和更好地解释外交政策模式和国际关系的主观因素提供了最大可能。^①在解释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时，心理学方法本身就关注行为体的主观知觉和对世界的解释。心理学本身也研究人类决策的限制性结构，但强调情绪、愿望、情感和其他与认知相关的过程是影响因素。从心理学角度看，在特定情况下对动机的评估受制于知觉偏差、判断的偏差和由此导致的不同的成本—收益计算。从心理学角度，我们可能可以说，“主观性利益”解释了前后矛盾和看似代价高昂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代价高昂的行为实际上具有“战略”功能和相关性，即有助于满足主观需要或者期望。

说到这里，这与建构主义的区别就很明显了：建构主义假设行为体关于现实的知觉，和心理学一样，也是内生构建的，社会行为（互动）建立在主体间对现实的主观构建的基础之上，有时不同。非物质因素是结构，例如观念、被社会接受的规范、集体身份和历史记忆，结构决定行为体的偏好。按照建构主义的逻辑，行为体的行为始终以内化的主体间规范和符合这些规范的要求的利益为指导。^②然而，主观性需要的满足不一定要遵循建构主义的主体间逻辑。单个行为一开始不是以对象为导向的，而且行为体一开始也不是在对象对于他们的意义的基础上行动的。^③

所以心理学能帮助我们以有关行为体自己的视角观察并理解特定情境。然而，主流政治学理论通常认为心理学因素，例如情绪和情感等是次要的，因为这些因素中长期蕴含着刻板印象，所以在本质上是非理性和不可预测的^④。只有在冷战背景下，相互敌对的军备竞赛被认为是国际政治中的一种“非理性”动态，心理学解释才在

① Robert Jervis, “Bridges, Barriers, and Gaps: Research and Policy”, *Political Psychology*, August 2008, Vol. 29, NO. 4, pp. 571-592.

②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9.

③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2, Vol. 46, NO. 2, pp. 391-426.

④ 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2004. 另可参见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1976; Robert Mandel, *Irr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Confrontation*,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1987.

学术上被关注。这导致了建立国际关系^①和战争与和平^②的政治心理学的尝试。在东西方敌对对抗结束之后，政治心理学的概念一般被用来解释冲突的动力和寻找和平解决冲突的途径。^③随着国际关系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建构主义转向，对于知觉、主观性解释和决策的影响力的研究又变得合理了。然而在建构主义影响下，“理性”范式仍然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占统治地位。情绪、愿望、情感和其他的心理学因素被认为是“非理性”行为偏差的决定因素。^④

由于神经科学最近的新进展，又引起了国际关系中对心理因素的研究兴趣。^⑤神经科学对于“大脑是怎样工作的”提供了新的认识，由此规定认知和情绪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⑥它还强调了情绪、对个人自身作用和重要性的社会评价等心理因素对理性加工和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互动有着强烈影响。^⑦情绪是人类在各个领域的体验和各种形式的社会互动的重点，因此对于国际关系也是这样。^⑧情绪必须被理解为前意识的^⑨，所以是不受考虑的和对特定情境的固有的判断与评价^⑩。根据默瑟

① Herbert C.Kelman, *International Behaviour. A Socio-Psychological Analysis*, New York, 1965.

② Frank, Jerome D. , *Muß Krieg sein? Psychologische Aspekte von Krieg und Frieden*, Darmstadt, 1971.

③ Birckenbach, Hanne-Margret, “Zur Politischen Psychologie des Friedens. Eine Einführung”, *Steinweg*, 1990, Reiner/Wellmann, Christian (Hrsg.), *Die vergessene Dimension internationaler Konflikte: Subjektivität*, Frankfurt/Main, 7-28.

④ Mercer, “Jonathan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5, Vol.59, NO.1, pp.77-106.

⑤ 神经科学强调“大多数情况下，情绪提供快速而准确决策的基础，因而起着有益的作用”。参见 McDermott /Goldgeier, J. M./Tetlock, P. E. “Psych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1, NO.4, pp.67-92; McDermott, Rose,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4, Ann Arbour/Mercer Jonathan,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5, Vol.59, NO.1, pp.77-106; Mercer, Jonathan, “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2004, NO.9, pp.288-303; Mercer, Jonathan “Emotional Belief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nter 2010, NO.64, pp.1-31; Giersch, Carsten, *Risikoeinstellungen in internationalen Konflikten*, Wiesbaden, 2009.

⑥ Rose McDermott, “The Feeling of Rationality: The Meaning of Neuroscientific Advanc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04, Vol. 2, NO. 4, pp. 691-706.

⑦ Fritz Strack / Roland Deutsch, “Reflective and Impulsive Determinants of Social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04, Vol.8, NO. 3, pp. 220-247.

⑧ Jonathan Mercer, “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2006, NO.9, pp. 288-303.

⑨ Fritz Strack / Roland Deutsch, “Reflective and Impulsive Determinants of Social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04, Vol. 8, NO. 3, pp. 220-247.

⑩ Florian Weber, “Von den klassischen Affektenlehren zur Neurowissenschaft und zurück”. *Wege der Emotionsforschung in den Geistes-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 2008, 53: 21-42.

(Jonathan Mercer) 的论述, 在国际关系中, 情绪加强如信任、民族主义、正义和信誉之类的信念。^①所以情绪在情境性(个人或群体)决策中扮演着一种功能性角色。这与传统心理学方法有本质的不同: 纯理性行为的偏差不再被视为“非正常”和“非理性”的。特定情境下的对动机和风险的评估都受到认知和情感的制约, 这种制约导致了知觉偏差和不一样的成本—利益计算。^②

所有这些认识使心理学方法在容入其他研究时更有吸引力也更加合理。^③假设受到情绪、知觉和其他感情的影响, 对于相关情境的主观性解读也能对国际行为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对此默瑟是这样论述的:

“相比于关注美国的军事实力, 美国的石油利益或者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决心的信仰, 关注特定行为体对美国的看法会告诉分析家们更多相对于这些行为体的美国的信誉。”^④

国际关系领域最近出版了大量研究或者间接与外交政策的“非理性”的主观性因素相关的学术著作。这其中的许多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社会心理学的方法, 因为社会心理学能帮助我们理解决策中的主观因素在社会互动和国际关系中如何发挥作用——在国际关系领域如何描述主观需要以及心理因素如何影响国际动态。^⑤

① Jonathan Mercer, “Emotional Belief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nter 2010, NO. 64, pp. 1-31.

② 这种观点与经济学上的“有限理性”紧密联系, 有限理性假设行为体的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 行为体无法达到最优决定, 试图优化或者满足他们的利益。参见 Simon, 1957/Norbert Schwarz, “Emotion, Cogni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Cognition and Emotion*, 2000, Vol. 14, NO. 4, pp. 433-440; McDermott Rose,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2004; Giersch, Carsten 2009: Risikoeinstellungen in internationalen Konflikten, Wiesbaden.

③ Goldgeier, J. M./Tetlock, P. E, “Psych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1, Vol. 4, pp. 67-92; Rose McDermott/ Jacek Kugler, 2001: Comparing Rational Choice and Prospect Theory Analyses: The US Decision to Launch Operation 'Desert Storm',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January 1991, Vol. 24, NO. 3, pp. 49-85; Gould, Roger, *Collision of Wills: How Ambiguity about Social Rank Breeds Conflict*, 2003; Gross Stein, Janice: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Rational, Psychological and Neurobiological Models*, 2007, Steve Smith / Amelia Hadfield / Tim Dunne, (Hrsg.) (Hrsg.): *Foreign Policy. Theories, Actors, Cases*, Oxford, 101-116; Giersch, Carsten, *Risikoeinstellungen in internationalen Konflikten*, Wiesbaden, 2009.

④ Jonathan Mercer, “Emotional Belief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nter 2010, Vol. 64, pp. 1-31.

⑤ Roger Gould, *Collision of Wills: How Ambiguity about Social Rank Breeds Conflict*, 2003; Rosen, Stephen Peter, *War and Human Nature*, 200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有些著作^①研究情绪和情感在社会互动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特别是，以信任^②、移情作用、尊敬^③、声望、认同和身份地位问题^④作为影响国际关系的社会评价因素来研究后者与理性加工和推论性证明^⑤的相互影响。肯珀（Kemper）强调情绪表现出按照权力与地位对单个社会互动的判断。^⑥这些著作也重点研究了（自我）形象、（自我）知觉和知觉偏差如何影响行为。^⑦由于社会认同在单个互动中的重要性源于这些形象和知觉，这些形象和知觉因而受到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影响。^⑧

也许对国际关系中主观性研究最具挑战性的反对理由是经常被提起的“国家不等同于个人”^⑨和把个人或者社会心理学（后者研究小群体的动态和行为）的认识转移到整个国家层面是不恰当的或者是还需要进一步论证的。对这些批评一般的反驳是当我们提及“国家”，我们通常指一（小）群政治决策精英，所以源自社会心理学的假设完全适用。此外，我们需要把这些群体或者行为体群体看成是呈现一定社会

① Roland Bleiker/ Emma Hutchison, “Fear no more: Emo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8, Vol.34, pp.115-135; Lebow, Richard Ned, “Reason, Emotion 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05, Vol.42, pp.283-313; Jonatha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5, Vol.59, NO. 1, pp.77-106; Jonathan Mercer, “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 2006, NO.9, pp.288-303; Jonathan Mercer, “Emotional Belief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nter 2010, Vol.64, NO.1, pp.1-31; Tiedens, Larissa, “Anger and Advancement versus Sadness and Subjugation: The Effect of Negative Emotion Expressions on Social Status Conferra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1, Vol.80, NO. 1, pp.86-94; Welch David, *Painful Choices, A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Change*, Princeton, NJ, 2005.

② Welch Larson, Deborah, “Trust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1997, Vol. 18, NO.3, pp.701-734.

③ Wolf Reinhard/Respekt, “Ein unterschätzter Faktor in den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Zeitschrift für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2008: 15: 1, 5-37; Wolf Reinhard, “Prickly States? Recognition and disrespect between persons and peopl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09.

④ Neta Crawford, “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 Propositions on Emotion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00, Vol. 24, NO.4, 116-156; Stephen Peter Rosen, *War and Human Nature*, Princeton, Oxford, 2005.

⑤ Norbert Schwarz, “Emotion, Cogni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Cognition and Emotion*, 2000, Vol.14, NO. 4, pp. 433-440.

⑥ Theodore Kemper, D. *Power and Status and the Power-Status Theory of Emotions*, in: Stets, 2006, Jan E./Turner, Jonathan H. (Hrsg.):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New York, 87-113.

⑦ Carsten Giersch, *Risikoeinstellungen in internationalen Konflikten*, Wiesbaden, 2009; Jervis, Robert 1976: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Lindemann, *Die Macht der Perzeptionen und Perzeptionen von Mächten*, Berlin, 2000.

⑧ James F Voss/ Ellen Dorsey, *Percep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Overview*, in: Hudson, Valerie M. (Hrsg.):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1992, Westview.

⑨ Reinhard Wolf, “Prickly States? Recognition and disrespect between persons and peopl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09.

配置、共享很多社会设施的制度化的“领域”，所以这些行为体的统一的性格^①、一种特定的“习惯”变得可见，他们以“被授权的发言人”行事——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形象^②。

三、解释俄罗斯外交中的“非理性”模式： 俄罗斯如何“看待”西方和为什么了解这种“看待”是重要的

根据以上论述的传统的以行为体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性和“非理性”研究方法的可能性，笔者建议应用加入了心理学思路的方法来观察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前后矛盾。笔者的假设是，如果这种前后矛盾不是理性加工的结果或者作用，那么就一定有一个“非理性的”基础。

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研究专家与笔者有相同的看法。这些学者们不满意对这种前后矛盾的传统解释：俄外交政策受到“现实政治”^③的驱动。他们看到了“重新思考俄罗斯外交政策及其主要驱动力”^④和找到超越传统“理性”或者建构主义方法之外的解释的必要。以上提及的对于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学的研究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研究俄罗斯外交，特别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的。本质上说，这些研究试图系统性地探究俄罗斯决策者们对于西方的“看法”和这些“看法”导致了何种行为。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现有的知识以便更好地揭示俄罗斯与西方伙伴关系中决定俄罗斯的立场和要求的潜在因素。

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条理清晰或者统一的理论和分析框架。然而，这些著作找

① Bourdieu, “Rethinking the Sta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Bureaucratic Field”, *Sociological Theory*, 1994, Vol. 12, NO. 1, pp. 1-18.

② Pouliot Vinc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Practice: The politics of NATO-Russia Diplomacy*, New York, 2010.

③ Harley Balzer, “Introduction: Non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Russian Politics and Security”, *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2008, Vol.16,NO.3,pp.212-228; Bordachev Timofei, “The Limits of Rational Choice”,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08,Vol.6, NO.4, pp.90-105; Clunan, Anne L.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ussia's Resurgence: Aspirations, Identity, and Security Interests*, Baltimore 2009; Pouliot Vinc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Practice: The politics of NATO-Russia Diplomacy*, New York2010; Muzykantsky, Alexander, “A Yardstick for Russia, in: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1: 3”, 2005, <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s/12/936.html>.

④ Andrew Monaghan, “‘An enemy at the gates’ or ‘from victory to victo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8, Vol. 84, NO. 4, pp.717-733.

到了许多分析性的和方法论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一些作者在名誉、认同、地位^①、愤怒、情绪^②等因素/概念中找到了其他的解释。其他人则强调观念、形象、历史经验^③或者习惯和习俗^④影响俄罗斯的现行政策。还有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的。^⑤

下文中我将阐述并更加具体地讨论俄罗斯主观性的两个方面，特别是这种主观性解释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动态和质量的变化：俄罗斯渴望西方尊重自己的形象和地位，表达情绪化判断的愤怒的作用，而这种判断植根于对社会尊重的诉求中。

（一）主观性为什么重要：俄罗斯被西方尊重的需要

在科索沃问题上或者关于北约东扩和美国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在欧洲安全问题上采取的单边主义行动，俄罗斯政治家的主流论调是西方在伙伴关系中忽视了俄罗斯的利益。这些利益是什么呢？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主要是指俄成为西方集团一员的目标，但西方拒绝俄融入西方精英俱乐部。对此俄罗斯的反应是变成蓄意阻挠者和破坏者。^⑥比如在巴尔干问题上，俄罗斯利用自己在西方组织（联合国安理

① Matthew Tarver-Wahlquist / Andrei P Tsygankov, “Duelling Honors: Realism, Constructivism and the Russia-Georgia Divide”, 2008.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an annual meeting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March 26-30, 2008; Neumann, Iver B, “When did Russia become a Great Power? Realist, Constructivist and Post-Structuralist Answ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48th Annual Convention, Hilton Chicago, CHICAGO, IL,2009; Clunan, Anne L.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ussia's Resurgence: Aspirations, Identity, and Security Interests*, Baltimore,2009; Welch Larson, Deborah/Shevchenko, Alexei,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0, Vol. 34, NO. 4, pp.63-95.

② Tuomas Forsberg, “Emotions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nger”,2008. 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13th Annual World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Nationalities, New York 10-12 April 2008.

③ Valentina Feklyunina, “Battle for Perceptions: Projecting Russia in the West”, *Europe-Asia Studies*, 2008, Vol.60, NO.4, pp.605-629. Ted (Hrsg.) Hopf, *Understandings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Pennsylvania, 1999; Robert Legvol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During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Legvold, Robert (Hrsg.):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Shadow of the Past*, New York, 2007; David Mendeloff, “‘Pernicious History’ as a Cause of National Misperceptions: Russia and the 1999 Kosovo Wa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2008, Vol. 43, NO.1, pp. 31-56; Iver B Neumann, “The Mongol Connection: Russia's Asian Entry into European Politics”, NUPI Working Paper, Oslo, in 2008; Stewart, Susan, *Die Konstruktion des Feindbilds Westen im heutigen Russland. Seine Geschichte und seine Funktionen*, SWP-Studie, Berlin, Oktober 2008.

④ Vincent Poulio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Practice: The politics of NATO-Russia Diplom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New York; Hopf, “The Logic of Habi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thcoming, Ted 2010.

⑤ Fredo Arias-King /King de Arias, Arlene/Arias de la Canal, Fredo, “Russia's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2008, Vol. 16, NO. 2, pp. 117-130.

⑥ Deborah Welch Larson / Alexe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0, Vol. 34, NO. 4, pp. 63-95.

会)和论坛(巴尔干联络小组)中的所有影响力来向西方集团展示自己的重要性。北约介入科索沃(没有联合国授权,也就是得不到俄罗斯的同意)后,俄罗斯的反应也是同样的道理。俄军抢占普里什蒂纳机场,被普遍认为是象征性地表达了叶利钦(Boris Yeltsin)政府参与战后科索沃国际管理的要求,虽然俄罗斯的军事力量还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能力。^①

进入新千年后,普京(Vladimir Putin)当选为俄罗斯新总统。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好转,俄罗斯形成了新的外交政策倾向,其目标是追求并恢复大国地位。^②对于西方来说,这意味着:尊重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接受俄罗斯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平等而不受约束的行为体。^③但是,这种自我形象又一次被西方,特别是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新政府忽视了。美国进一步坚持计划把北约扩大到后苏联地区以及在波兰和捷克安装导弹防御系统,于是俄罗斯又开始破坏伙伴关系。俄格冲突中俄罗斯与西方分歧的迅速升级反映了其对感受到的“非法跨越红线”^④的最不对称的反应。这场战争可以看成是俄对西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漠视自己利益的以牙还牙的回应,所以也可以看成是一场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核心进行的“代理”战争。

专家们倾向于把这些互动模式解释为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在与西方的关系中希望得到足够的尊重或认同以及这种希望受到打击的结果。^⑤根据沃尔夫(Wolf)的论述,社会尊重是“一种我们期望他人以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所展现的态度,尊重必须在对待我们的行为中得到体现”。^⑥以上这些例子充分体现了虽然俄罗斯对西方的利益随时间而变化(融入、解脱),但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期望却是不变的:希望西方尊重自己的(外交政策)身份观念和定义。引人注意的是,俄罗斯官员在过去几年

① Regina Heller, Kaprizen, Kapriolen, “Kompromisse. Russlands Rolle im Kosovo”, 1999: in: Das Parlament 32-33, 8.

② Ingmar Oldberg,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under Putin: a tour d'horizone*, in: Hedenskog, Jakob, 2005 /Konnander, Vilhelm/Nygren, Bertil/Oldberg, Ingmar/Pursiainen, Christer (Hrsg.): *Russia as a Great Power*, New York, 29-57; Andrei P Tsygankov, “Vladimir Putin's vision of Russia as a normal great power”, *Post-Soviet Affairs*, 2005, Vol. 21, NO. 2, pp. 132-158.

③ Iver B Neumann, “When did Russia become a Great Power? Realist, Constructivist and Post-Structuralist Answ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48th Annual Convention, Hilton Chicago, 2009: CHICAGO, IL.

④ Alexander Aksenyonok, “Paradigm Change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08, Vol. 6, NO. 4, pp. 66-77; Derek Averre, “From Pristina to Tskhinvali: the legacy of Operation Allied Force in Russi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9, Vol. 85, NO. 3, pp. 575-591.

⑤ Clunan, Anne L.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ussia's Resurgence: Aspirations, Identity, and Security Interests*, 2009, Baltimore; Welch Larson, Deborah/Shevchenko, Alexei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 Primacy”, 2010,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4, NO.4, pp.63-95.

⑥ Wolf, Reinhard undated: “Respect and Disrespec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中明确强调西方必须对俄罗斯“更加尊重”。^①2008年俄格战争后，俄罗斯驻北约大使罗戈津（Dmitri Rogozin）强调，俄在与西方关系中外交上的最大成就是西欧（“布鲁塞尔”）开始对俄罗斯另眼相看——即带着尊敬。^②

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在过去20年中对俄罗斯的苛待基本上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俄罗斯的期望（主观感觉到的）一直被忽视而遭受挫折，西方在伙伴关系中对俄罗斯身份和地位的需要都缺乏尊重。从这个简短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假设：西方（特别是美国和欧盟国家）对俄罗斯自我感觉的身份的肯定和对俄（国际）地位的尊重有利于两者间务实的互动和稳定俄罗斯与西方的合作；相反，俄罗斯政治决策者关于俄不被尊重的感觉会导致两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和冲突。^③

有几个指标能说明为什么俄罗斯是研究其与西方关系中社会认同/尊重的影响的“最佳案例”^④：第一，在与西方的关系中，俄罗斯的精英和俄罗斯社会似乎把他们的“自尊”和西方对俄罗斯在历史和国际上的作用与其主观社会价值的肯定或支持的程度紧密联系起来。目前看来，积极的自我形象的获得，高度取决于外界的肯定。第二，作为“西方世界”的两极，美国和欧盟代表了两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行为体，他们对俄罗斯的“尊重”以及尊重的程度，似乎影响着世界上的第三方行为体如何看待俄罗斯，而且也随之影响俄的自我知觉。^⑤

这些见解中隐含的政策含义是明显的：表示尊重促进合作；另一方面来说，不被尊重的感觉导致紧张和冲突。^⑥拉尔森（Welch Larson）和舍甫琴科（Alexei Shevchenko）也认为，“国家对于自身的相对地位的关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的新现

① E.g.: Kosovo-Konflikt, Russen drohen mit "roher militärischer Gewalt", die Welt, 22.02.2008.

② “今天我感受到了俄罗斯的强大，甚至我对自己的感觉都非常好，在这里，在布鲁塞尔，我感受到了对我们俄罗斯代表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以尊敬的目光看待我们，我认为这是俄罗斯外交的最大成就。” Дмитрий Рогозин. Я представляю сильную Россию!, 22.07.2008. <http://natomission.ru/society/article/society/artpublication/25/>.

③ Reinhard Wolf, undated: “Respect and Disrespec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④ Reinhard Wolf, Respekt, “Ein unterschätzter Faktor in den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Zeitschrift für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2008: 15: 1, 5-37.

⑤ Valentina Feklyunina, “Battle for Perceptions: Projecting Russia in the West”, *Europe-Asia Studies*, 2008, Vol. 60, NO. 4, pp. 605-629; David Mendeloff, “‘Pernicious History’ as a Cause of National Misperceptions: Russia and the 1999 Kosovo Wa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2008, Vol. 43, NO. 1, pp. 31-56; Stewart Susan, “Die Konstruktion des Feindbilds Westen im heutigen Russland. Seine Geschichte und seine Funktionen”, *SWP-Studie*, Berlin, Oktober 2008.

⑥ Reinhard Wolf, undated: “Respect and Disrespec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论方法忽略了”。^①他们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应该更加重视“提高地位的行为”^②。从这个角度看，社会认同或者尊重，成为研究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寻求尊重本身就可以代表一个国家行为的目的而独立于任何权力考虑或者物质收益之外。所以，特别是在行为体把自己的社会价值与自尊和互动对象对自己身份的肯定联系起来的情况下^③，寻求尊重有着影响国际关系和互动的质量和动态的巨大潜力^④。

（二）主观性如何重要：一个“愤怒的”俄罗斯的语法

如果观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中被尊重的需要和不被尊重的感觉所导致的情绪化的，主要是愤怒的反应之间的联系，这个假设会得到加强。在以上的例子中，俄罗斯政治家对西方的立场和行为公开表达不满并严厉批评，对西方伙伴表现出一种愤怒的态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特别是在普京总统任期内，当这种公开表达分歧的行为非常彻底的时候，我们分别看到了一个“愤怒的”俄罗斯和愤怒的俄外交官与高级别政治家。许多观察家注意到俄罗斯感觉受到了“恶劣的对待”或甚至被西方欺骗。^⑤我们记得弗拉基米尔·普京在 2007 年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的演讲中表现出来的愤怒，他指责美国谋求获得世界主导地位和优势并谴责西方“激怒”俄罗斯^⑥的行为，所以观察家们从那时就已经看到了“冷战”的重演。^⑦

在加入了心理学分析方法的著作中，这些情绪化的、“愤怒的”口头抗议被认为是自身地位的关注和被西方蔑视与羞辱的结果和间接证据。愤怒表达了一种直接源于情绪化判断的感觉。在社会互动中，愤怒可以被解释为对感觉到的蓄意伤害或者不公正待遇的一种代表或者保卫自己的反应性态度^⑧及回应：“表现愤怒通常是为了恢复地位或尊严”，“国家可能从事蓄意阻挠的行为，扮演破坏者的角色来

① Deborah Welch Larson / Alexe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0, Vol. 34, NO. 4, pp. 63-95.

② Ibid.

③ Anne L Cluna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ussia's Resurgence: Aspirations, Identity, and Security Interests*, Baltimore, 2009.

④ Reinhard Wolf, “Respekt. Ein unterschätzter Faktor in den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Zeitschrift für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2008, 15: 1, pp.5-37.

⑤ Muzykantsky, Alexander 2005: “A Yardstick for Russia, in: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1: 3*”, <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s/12/936.html>; Alexander Aksenyonok, “Paradigm Change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08, Vol. 6, NO. 4, pp.66-77.

⑥ Valdimir Putin: Speech at the 43rd Munich Conference on Security Policy, February 10, 2007: <http://www.securityconference.de/konferenzen/rede.php?sprache=en&id=179>.

⑦ Sebastian Fischer: Cold War Revival and Holocaust Denial. Munich Conference Less Than Reassuring, in: *Spiegelonline*, 12 February 2007: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0,1518,465934,00.html>.

⑧ Stephen Peter Rosen, *War and Human N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7.

试图展现自身的重要性。”^①所以，口头表达的愤怒可以被解释为对西方正在怎样对待俄罗斯这个问题的潜意识的判断。

虽然愤怒可以导致侵略性行为，但社会心理学强调，“愤怒被普遍认为是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通常这种行为更多地只是威胁而非真正使用暴力”^②。虽然人们可以从俄罗斯的外交活动、言辞、威胁和警告中读出一场严重冲突将要爆发^③或者双方关系将要破裂的结论。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俄罗斯官员表达批评之后双方关系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如果我们把这些愤怒的反应看成是一种象征性的动作，即一种解决分歧的建设性机制，俄罗斯对待西方的行为中的前后矛盾性就更容易理解了。弗斯伯格（Tuomas Forsberg）是这样论述的：

“具体来说，源于主观感受到的不公正的愤怒可以解释为什么俄罗斯人在一些明显的象征性问题上投入如此多的外交资源和使用严厉的言辞，和为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他们已经做出决定，却还继续表示不满。因为愤怒意在通过纠正一个错误来修补而非破坏双方的关系，基于情绪的解释说明了为什么俄罗斯做出威胁和警告却不执行。有一种观点是：重复的警告和威胁，强烈的道德语言和谴责仅仅代表过分自信或者只是因为害怕西方反击而不落实到行动的‘语言攻击’。相比起来，从情绪和愤怒的特殊特征得出的解释不仅更简单而且更加精确。”^④

引人注意的是，在过去五年中，这样的公开口头抗议相比 20 世纪 90 年代和新千年刚开始时要来得更加频繁而且语气更加严厉。关于情绪、冲突和社会等级的著作认为，相比于在等级关系中，这样的公开冲突更可能发生在对称关系中。^⑤这种更加大胆的表达分歧的方式，可能是因为俄罗斯在过去五年中强化了其大国身份的认同感，而且对其作为大国的自身力量更加自信，虽然俄罗斯直到今天也无法把这种大国身份建立在政治，经济，或者更不用说军事实力基础之上了。

① Deborah Welch Larson / Alexe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0, Vol. 34, NO. 4, pp. 63-95.

② Tuomas Forsberg: “Emotions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nger”, 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13th Annual World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Nationalities, New York, April 2008, pp. 10-12.

③ 同上。

④ Tuomas Forsberg, “Emotions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nger”, 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13th Annual World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Nationalities, New York, April 2008, pp. 10-12.

⑤ Stephen Peter Rosen, *War and Human N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7.

四、结 论

现实主义者可能会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不是回到“单纯权力政治”了吗？当然不是！依照普利奥特（Vincent Pouliot）的理解，我认为我们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中见证了“象征性权力政治”^①的一种形式。在现实主义解释中被定义为权力政治的一种典型形式，从心理学的角度必须被理解为对自我肯定的追求。这并不意味着“象征性权力政治”与西方—俄罗斯关系不那么相关。相反，我们越来越看到权力政治和象征性的、受主观驱动的政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我们翻转“现实主义”的硬币，观察它主观的那一面并认真对待，就能更好地理解俄罗斯对西方外交政策中的前后矛盾，我们就能理解相关问题的象征意义为什么和如何比物质利益冲突更有可能对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构成挑战。此外，我们也能以俄罗斯为例来理解，在一些情况下，从象征性的行动和反应中得到的主观性收益可能大于客观收益。

我们基本上认识到物质世界不能被认为是想当然的。我们也需要考虑到我们的互动对象对世界的主观理解：“从知识界分析外国的外交政策行为的失败中得到的经验，倾向于低估而非夸大从他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人的必要”^②，并把这种考虑应用到科学解释中。这种见解显然适用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因此关于理论，重要的是克服传统分析角度的局限并考虑理性范式之外的方法。

俄罗斯似乎是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主观性的一个明显案例。自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一直在世界上寻找自己的角色，这个国家似乎代表了一个证明主观因素对其与西方的关系的质量和动态的影响力的“最佳案例”。分析俄罗斯主观感觉到的被西方尊重的目的和在双方关系中分别以蓄意阻挠者和愤怒行为为表现形式的态度，似乎为证明外交政策中的主观因素是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提供了第一手证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析甚至规定了西方的“苛待”——比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拒绝“尊重”——可能直接导致了俄罗斯大国身份的自我政治形象和进入新千年后随之而来的外交政策倾向的转变。但是要证明这个规定中的因果关系，人们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同样必须强调的是，这种主观性逻辑也影响西方（欧盟及其成员国、美国、北约等）的决策和行为。

① Vincent Poulio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Practice: The politics of NATO-Russia Diplom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0.

② Tuomas Forsberg: “Emotions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nger”, 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13th Annual World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Nationalities, New York, April 2008, pp. 10-12.

这篇论文旨在通过提出一种新的关于这个重要双边关系的理论和分析角度，即一个受到心理学和主观性启发的角度，以促进对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构成要素的更好的理解。这种新的思路有助于从经验角度详细说明俄罗斯政治家的前后矛盾的出现和看起来代价高昂的行为，还有主观需要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受心理学启发的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把看似权力驱动的政治装扮为象征性政治。在实用性方面，我们可以评估何时、怎样和在何种情况下，回应主观需要和表示尊敬能够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愤怒，并有着增强和稳定俄罗斯和西方整体关系的有益功能。

(罗甘本 译)

【Abstract】 In the post-Soviet period, the characteristic pattern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s the reemergence of situational inconsistencies, namely disproportionate changes and shifts of positions and behavior substantially contrary to engagement. Such illogical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is typically embodied in Russia's reactions in the Russian-Georgian war in 2008, NATO enlargement and US plan to install missile defense system on the European continent.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raditional rational, actor-centered IR theories, which assume that an actor's policy preference does not easily change, lack explanatory force for the puzzling Russian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He believes that foreign policy is affected by actors'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ld and their emotions. Russia's feeling of disrespect breeds tensions and conflict and its "anger" expresses an emotional judgment resulting from the feeling that Russia is not respected by the West, which aims to reveal Russia's importance rather than to serve as a destructive role. Analysis of the subjectivity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helps to provide a new theoretical and analytical perspective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Key Words】 Russian-Western Relationship, Inconsistency, Rational, Policy Preference, Psychology, Subjectivity, Emotion, Respect, Anger

【Аннотация】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характерной форм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является возрождение ситуационного несоответствия, а именно, непропорциональ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и сдвиги позиций и поведения,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противоречащие участию. Такое нелогичное проведение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нашло типичное отражение в реакции России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грузинскую войну в 2008 году, расширение НАТО и планы США по установлению системы противоракетной обороны на европейском континенте. Автор считает, что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рациональные, актор-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е те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оторые предполагают, что политика предпочтения актора не легко изменяется, не обладают достаточной силой для разьяснения запутанност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Автор считает, что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зависит от субъективной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мира акторами и их эмоций. Чувство России о неуважении к себе порождает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и конфликты, и её «гнев» выражает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е суждение, являющееся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ощущения того, что Россию не уважают на Западе, целью которого является скорее выявление значимости России, нежели чем, проявление деструктивной роли. Анализ субъективности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и помогает обеспечить новые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и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омогающие лучше понять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Западо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Западом, несоответствие, р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редпочтение, психология, субъективность, эмоции, уважение, злость

(责任编辑 常喆)

觊觎、憎恶和望尘莫及？

——1984至2009年俄罗斯平面媒体文本中的美国霸权形象和俄罗斯自我形象

波·彼得松 埃米尔·佩尔松*

【内容提要】本文选取了1984年、1994年、2004年和2009年中的共计20周的时间段来研究俄罗斯两家主要日报《消息报》和《共青团真理报》中美国形象的演变。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一时间跨度是巨大的：从20世纪80年代表面的稳定霸权到90年代苏联解体后的混乱，再到21世纪初期初步回归大国地位。本文在讲述美国形象演变的同时也描绘了俄罗斯自我形象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80年代，呈现的美国形象是摩尼教的，而在90年代，阐述的美国形象是最为友善的。2004年和2009年的案例反映了一个自信的俄罗斯重返世界舞台的事实。美国再次屡受指责，但仍然和以前一样是俄罗斯衡量自身的标准。

【关键词】俄罗斯 苏联 美国 形象 自我形象 国家身份 报纸

【中图分类号】K512.56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0)06-0055-(16)

导 言

本文选取了1984年、1994年、2004年和2009年四年中共计20周的时间段来研究俄罗斯两家主要日报《消息报》和《共青团真理报》中美国形象的演变。从实证主义的角度看，这项研究建立在对美国在重大国际进程和事件上外交行为的评论和新闻报道的分析基础之上。本文比较了四个不同时段中美国的形象，这四个时段分别处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乔治·W·小

* 波·彼得松(Bo Petersson)，瑞典马尔默大学全球政治研究教授。埃米尔·佩尔松(Emil Persson)，瑞典隆德大学政治科学硕士，目前就职于瑞典移民局。

布什(George W. Bush)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四位总统的任期内。

而在这一相同时期，苏联及此后的俄罗斯领导人更迭更为频繁：有 1984 年即位的老人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1994 年夺得总统席位的果敢而不走常规的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2004 年的强调强权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总统、以及 2009 年被怀疑实权旁落于铁腕总理普京而事实上只是个代理总统的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

这样一些戏剧性事件的接连出现，在俄罗斯历史上是空前的。在这个时间段，苏联经历了从 20 世纪 80 年代停滞不前的“霸权”国家，90 年代解体后混乱无序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衰落，到 21 世纪前十年的初步恢复的大国地位的历程。本文的出发点是通过比较这些时段俄罗斯报纸上公开阐述的美国形象来反映俄罗斯的转型和创伤。

本文对这两份俄罗斯报纸运用了量化的内容分析。这种分析以瑞典研究项目“传媒和欧洲身份：国家或地区媒体中的美国印象”中制定和使用的准则表为基础。准则表同样应用于瑞典、芬兰、德国和法国的案例上。本文涉及到的时间段包括 1984 年的 1 月 2 日到 2 月 5 日，1994 年的 1 月 24 日到 3 月 3 日，2004 年的 1 月 19 日到 2 月 3 日，10 月 31 日到 11 月 21 日，2009 年的 6 月 5 日到 6 月 20 日。选择这些时段是为了包含一年一度的总统国情咨文报告和每年的一个重大国际事件（奥巴马总统在 2009 年没有发表国情咨文演说，因而选取对其开罗演讲的报道进行分析）。设定研究项目的最大限度为每个国家每年 50 篇文章。选择的主要指导原则是对美国的关注程度和国际化倾向。最后俄罗斯样本中 1984 年的文章总数为 34 篇，1994 年为 41 篇，2004 年为 37 篇，2009 年为 13 篇。其中《消息报》的文章分别占到了 18 篇、25 篇、22 篇和 7 篇，《共青团真理报》的文章占到了 16 篇、16 篇、15 篇和 6 篇。^①

至于文章的类型，大多数文章都是国际版中的新闻和评论，还有一些是来自经济版的讨论文章和新闻。分析的报纸中没有西方媒体的那种较为典型的传统社评。这两份报纸的特性随着俄罗斯传媒环境的转变而改变，因而文章的风格变化也比较大。在 1984 年的材料中，新闻、评论和争论没有区别，所有讨论和评价类文章都在反映苏联共产党的路线。后苏联时代的材料有了更为鲜明的风格上的不同，虽然这些不同并没有坚持到底。

当代俄罗斯的传媒环境

苏联时期影响深远的审查和自我审查机制是人们所熟知的。留给每个编辑和记

① 选取奥巴马任期初期相对较少的样本是为了核实小布什政府期间盛行的趋势是否有过间断。

者的余地极其有限。文章在框架设计上统一，留给记者的个人评论空间如果有的话，那也是极少的。^①在苏联解体期间和解体之后，媒体环境的变化巨大。从很多方面来看，1994年到1996年第一次车臣战争的这段时间恰好是新闻自由重新涌现的顶峰，而这场广泛不受欢迎的战争主要由于负面宣传而停战。^②然而，情况再次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事态主要是以“无奇不有”为特征。^③2004年至2009年期间的严格控制，使新闻媒体在诸如车臣战争、反恐政策和安全领域腐败等敏感话题上拥有较少自由。^④以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为代表的大量记者在过于尖锐地报道这些敏感话题后被暗杀。传媒环境的严寒充分反映了俄罗斯政治体制令人不安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的乐观主义和民主萌芽已被以纵向等级权力的再次控制为特征的“去民主”^⑤进程所代替，杜马的作用受到极大限制，可靠的反对派的数量和活动均锐减。

在研究选取的第一年，即1984年，《消息报》是毫无争议的权威的官方机构，名义上传达内阁会议（the Council of Ministers），即执政内阁（the formal cabinet）的意见。但是从苏联时期党政合一的角度来看，《消息报》实质上是苏联共产党的喉舌。在20世纪的90年代，《消息报》变成寡头产业，独立而且有时具有相当的批判性，但是从那时起就变成了较为边缘化的媒体声音。自2005年起，《消息报》由俄罗斯的国有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控股。《共青团真理报》的发展没有那么复杂：从不太活跃的苏联时期共产主义共青团官方报纸到今日俄罗斯最畅销的通俗性报纸。

在20世纪80年代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重建政策时期，平面媒体成了披露批判性信息和前所未闻真相的最重要的平台。然而，随着电视的盛行，平面媒体的重要性减弱。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俄罗斯主要的全国性报纸的总发行量减少了三分之一。在任意一天，看全国性电视节目的俄罗斯观众人数

① Greg Simons / Strovsky Dmitry, “Censorship in Contemporary Russian Journalism in the Age of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6, Vol. 21, NO.2, pp.189-211.

② Wagnsson Charlotte, *Russian Political Language and Public Opinion on the West, NATO and Chechnya*. Stockholm: Stockholm Studies in Politics, 2000.

③ Rosenkrans Ginger, “Since the end of the state-run press: Evolution of Russian newspapers from Perestroika to 1998”, *Journal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2001, pp.549-560.

④ Greg Simons / Strovsky Dmitry (2006), “Censorship in Contemporary Russian Journalism in the Age of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21, NO.2, pp. 189-211; Hedwig deSmaele, “Mass media and the information climate in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 2007, Vol.59, NO.8, pp.1299-1313; Joanna Kurosz, “Ryska medier: censur-frihet t/r”, Jonsson Anna /Carolina Vendil Pallin (eds): *Ryssland: politik, samhälle, ekonomi*. Stockholm: SNS, 2009, pp.154-181.

⑤ Charles Tilly,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都超过了全国性报纸读者人数的6倍。^①此外，如今网络的重要性也明显提升。然而，如果要对这30年中传媒的内容作个比较的话，考虑到研究中涉及到的较早年份不同媒体的易得性和绝对存在度，平面媒体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描绘他者美国 反映俄罗斯自身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认为美国在俄罗斯媒体中的公众形象对于理解当代俄罗斯自我身份至关重要。我们从普遍的建构主义者的角度得出这个观点，这也是当代身份理论的一个主流视角。我们也参考了持续了百年之久的俄罗斯传统论战，即争论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是否是其国家身份发展的关键所在。^②斯拉夫派秉持着西方堕落、文化劣等、俄罗斯需要掌握自己命运的观点，而西方派则认为俄罗斯的现代化亟需与西方合作。这场大讨论自彼得大帝时期便已开始，包含了贯穿整个20世纪的延续相关的元叙述。20世纪中叶，美国成为俄罗斯公众意识中的西方的缩影。

根据建构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镜我”的概念，自我观念久而久之会反映重要他者的行为。^③自我是行为体社会化的反映，或者就像依维·B·诺依曼（Iver B. Neumann）提出的，“他人的脸召唤出自我的存在”。^④通过追寻俄罗斯媒体中美国的镜像，我们期待收集到其中反映出的俄罗斯自我形象的有趣观点。

同很多人一样，我们认为集体自我的观念是只能通过社会交往形成的。^⑤事实上，是在我们理解的疆界中的持续互动形成了群体身份。^⑥身份构建假设集体自我与或多或少不同的他者定期接触，这些他者的范围从善良仁慈到邪恶阴险。^⑦通常后者与群

① Joanna Kurosz, “Ryska medier: censur-frihet t/r”, Anna Jonsson /Carolina Vendil Pallin (eds): *Ryssland: politik, samhälle, ekonomi*. Stockholm: SNS, pp.154-181,2009.

② Iver B. Neumann, “Self and Oth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6, Vol. 2, NO.2, pp.139-174; Prizel Ilya *National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Nationalism and leadership in Poland, Russia and Ukra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Rabow-Edling, Susanna,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Idea of the Nation in Slavophile Thought*. Stockholm: Stockholm Studies in Politics, 2001.

③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2, Vol. 46, NO.2, pp.391-425.

④ Iver B. Neumann, “Self and Oth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6, Vol.2, NO.2, pp.139-174.

⑤ Iver B. Neumann, *Uses of the Other: “The East” in European Identity Form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Shogo Suzuki, “The Importance of ‘Othering’ in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s a stage of identity conflicts”, *The Pacific Review*, 2007, Vol.20, No.1, pp.23-47; Brian Greenhill, “Recognition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8, Vol.14, NO.2, pp.343-368.

⑥ Fredrik Barth,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Oslo: 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 1969.

⑦ Vilh Harleo, *The Enemy with a Thousand Faces*,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2000.

体自我意识关联性更大，负面模型和敌人意象对定义群体身份至关重要。^①当他者被描述为无用和无法达到本群体标准时，自我意象就会上升为有道德的和善良的。因此，我们认为通过分析美国在俄罗斯的形象可以获得对于俄罗斯自我认知的深刻见解。

历史上的俄美关系

自我—他者关系必须通过它们的史实性来理解。这是历史上“偶发性的自我认识，而这一自我认识，又是由对时间和空间的历史偶然性的认识而产生的”。从历史上看，美国在俄罗斯国家身份构建上处于中心地位的时间不长，更确切地说，美国是俄罗斯相对近期的困扰。反而是以德国、法国和英国为主要代表的欧洲一直是传统的关注焦点。^②

1917年10月革命后，新的苏维埃领导人们最初对美国持有较为积极的态度。他们将美国视作挑战旧西方的同伴，美国 and 新的苏维埃国家在国际领域中有着某种亲密联系。^③然而，20世纪30年代，由于斯大林统治时期内部和外部敌人的困扰以及认为有一个资本主义的包围圈，苏联产生了一股反美情绪。^④

二战的结果是德国完败，英法虽是赢家但是付出了资源和实力的巨大代价。因此，美国成了西方集团无可争议的领导者，俄罗斯对美国的印象也就自动转变为消极的了。自那时起，美国就被描绘成俄罗斯的首要对手和敌人。作为西方的新领导者，美国得到了所有俄罗斯对西方的消极评价：文化劣等、道德败坏、理想浅薄。^⑤

另一方面，战后苏联政治家如何一边以美国为标准来衡量经济和军事力量一边又谴责和预测其衰亡的情况得到了详细描述。^⑥著名的例子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允诺在20年内赶超美国。在勃列日涅夫（Brezhnev）统治的全盛时期，即20世纪70年代早期，苏联与美国的核均势和因此而获得的政治认同，

① David Sibley, *Geographies of Exclusion*. London: Routledge, 1995; Elias, Norbert / John L. Scotson, *Etablerade och outsiders*. Lund: Arkiv, 1999.

② Iver B. Neumann, "Self and Oth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6, Vol.2, NO.2, pp.139-174; Neumann Iver B., *Uses of the Other, "The East" in European Identity Form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Marlène Laruelle, *Russian Eurasianism: An Ideology of Empire*. Washington DC/Baltimor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③ Vilho Harle, *The Enemy with a Thousand Faces*,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2000.

④ Vladimir Shlapentokh/ Woods Joshua, "The Threat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the Im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Abroad",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2003, X:2, pp.167-180.

⑤ Vilho Harle, *The Enemy with a Thousand Faces*,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2000.

⑥ Christer Jönsson, *Superpower: Comparing American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4.

被苏联领导人认定为一项主要成就。

1991年苏联超级大国的解体和垮台重创了俄罗斯国家身份。^①与苏联相比，俄罗斯联邦失去了1/3的领土和40%的人口。2500万曾经是苏联公民的俄罗斯人发现他们置身于俄罗斯联邦疆界之外。在那些仍在俄罗斯联邦疆界内的人们中间，出现了一条看起来深不可测的社会经济鸿沟，而这通常归咎于休克疗法和市场经济改革。曾经构成霸权的因素所剩无几。较为刻薄的说法称俄罗斯不过是“拥有导弹的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②”。

然而，即使在动乱的年代，与美国的比较对俄罗斯自我定位和身份的重要性也没有丝毫下降。在探寻新的国家身份构建的过程中，与其他主要他者的互动至关重要。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普遍将俄罗斯政治体系细分为不同派别，如自由派、中立派和欧亚派。^③与之前几个世纪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争论相似，自由派认为美国是国际合作的优先对象，是可以效仿的经济模式的象征。而中立派认为俄美关系是工具型的：俄罗斯应该维持这些关系以达到特定目标，以及在对抗潜在恶意对手的影响时保护自己。最后，欧亚派坚持美国的敌人意象，反对双边关系中的任何靠拢，因为认知中的敌人是不变的。

在动乱的20世纪90年代，人们面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时，充满了失落和自卑情绪以及对俄罗斯无力改变现状的痛苦认知。然而，对于俄罗斯曾经是、将继续是、而且今天也是个大国的矛盾性的坚持，使这种论述得以不断地平衡。颂歌被精英团体反复吟唱，这并不仅限于叶利钦时期。^④由于连年来石油和天然气的高价，普京总统任期内的俄罗斯再次腾飞，几乎重获大国地位，在国际上的自信心也大大增强。2008年夏末与格鲁吉亚的短暂战争就是一个证明。俄罗斯国内去民主化进程趋势显著，在对待外部世界的所有政策上坚决贯彻主权原则。^{⑤⑥}

这些发展形成了媒体研究所涉及到的1984年、1994年、2004年和2009年的一般政治环境。现在我们转向这些年对美国的新闻报道，来看看上述的模式是否通过《消息报》和《共青团真理报》的棱镜反映出来了。

① Petersson Bo, *National Self-Images and Regional Identities in Russia*. Ashgate: Aldershot, 2001.

② 布基纳法索，面积27.4万平方公里，是位于非洲西部沃尔特河上游的内陆国。——译者注

③ Ilya Prizel, *National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Nationalism and leadership in Poland, Russia and Ukra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Karen Dawisha / Parrott Bruce,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④ Petersson Bo, *National Self-Images and Regional Identities in Russia*. Ashgate: Aldershot, 2001.

⑤ Anderman Karin/Eva Hagström Frisell /Carolina Vendil Pallin, *Russia-EU External Security Relations: Russian policy and perceptions*. Stockholm: FOI, National Defence Research Agency, 2007.

⑥ 可能至今为止俄罗斯与西方民主国家最显著的冲突发生在2007年至2008年之间，俄罗斯颁布了禁令，阻止任何欧安组织的国际选举观察员计划的可能性，欧安组织被禁止向任何俄罗斯的议会和总统选举派遣观察员。

1984：摩尼教时期——善与恶的故事

1984年是对美国完全妄想的年代。毫不意外的是，《消息报》和《共青团真理报》的观点大部分一致。两份报纸使用的是相同的底稿。世界观只能被描述为摩尼教的。美国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源泉，世界上所有的阴谋都是由进攻性、帝国主义、狡猾、有强烈权力欲和道德观腐朽的美国策划的。

美国入侵格林达纳在很多方面是体现所有负面特质的典型性事例。苏联在报道这些事件时运用了大量生动有趣的隐喻。《消息报》通过用一幅带上手铐的人们被美国军队带走的照片做文章的插图，影射美国在建立“傀儡政权”后还意图桎梏格林达纳。而且，报纸还预言：“华盛顿企图桎梏所有加勒比海人民”。^①这次入侵被认为是一次无耻的进攻行为，是对主权国家内政的干涉以及对国际法的粗暴践踏。被侵占后的格林达纳到处都是“受雇的杀手和刽子手”，拷打是家常便饭，美国还宣称要将格林达纳变成政治犯的集中营。^②这种将美国与邪恶死敌纳粹德国进行比较的例子并不是独立事件，一位苏联法律专家要求按照纽伦堡审判模式举行关于格林达纳的国际审判。^③就宣传和事实的背离程度而言，里根（Reagan）政府的水平不亚于纳粹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设定的标准。^④当时苏共的领导人安德罗波夫这样谴责美国的行为：“难以想象会有比打着捍卫人权的旗号而用暴力摧毁人民力量更为无耻虚伪的行为了”。^⑤

集所有邪恶特征为一体的里根得到的待遇十分有趣。里根总统被描绘成一个意识形态上盲目憎恨苏联、虚伪、崇尚武力的牛仔。这使得里根陷入如同宗教狂热般的疯狂：他坚信美国的神圣使命，宣称使用惩罚措施诸如入侵格林达纳是合理的。^⑥在《消息报》一篇以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1984》为主题的文章中，里根被看作是一个坏人，一个大部分是丑陋的反面角色。里根总统擅长模棱两可的官方宣传语言，当他说到维护和平和国际安全时，他实际上表达的是迥然不同的意思：战争、军备竞赛升级、美国扩张和世界霸权。^⑦对里根总统1984年国会演讲的报道突出了其所有负面特征。^⑧

① Komorin A, “Ostrov v kandalakh”, *Izvestiya*, 1984, 3 January.

② Kornuoll, L., “Absolyutnoe bezzakonie”, *Izvestiya*, 1984, 12 January.

③ *Izvestiya*, “Polozhit’ konets beschinstvam Vashingtona”, 1984, 13 January.

④ Cherkasskaya, M., “TsRU: Shpionazh, diversii, terror”, *Komsomolskaya Pravda*, 1984, 3 January.

⑤ *Komsomolskaya Pravda*, “Otvety Yu. V. Andropov ana voprosy ‘gazety’ Pravdy”, 1984, 25 January.

⑥ Falin Valentin, “Vashington i istoriya”, *Izvestiya*, 1984, 4 January.

⑦ Sturua, Melor, “1984 i 1984”, *Izvestiya*, 1984, 16 January.

⑧ Sturua, Melor, “Ritorika i deistvitel’nost’”, *Izvestiya*, 1984, 28 January.

这一年，正如所预期的一样，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在西欧的部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一举动被认为是暴露和表现了里根政府的扩张政策，泄露了华府冒险性、不可预知性和危险性政策的真正本意，美国旨在用核威胁挟持欧洲伙伴。^①里根总统时期的美国仍然坚持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并且鲁莽地要求界定其利益范围以进行扩张。^②

在讲述彻底腐朽的美国的故事时，苏联被描述为道德高尚、热爱和平、大公无私和友好的。苏联捍卫国际法理想和团结国际社会，而美国只是表现出与其自私狭隘的国家利益相符合的行为，这种国家利益通常只限于大企业和世界资本主义。苏联报纸愤慨地反驳了苏联促成军备竞赛及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准备行之有据的说法。“苏联军事威胁”的说法极为荒谬，《消息报》争辩道，苏联是热爱和平的国家，是抵抗美国扩张主义唯一可靠的堡垒。^③愤世嫉俗的近现代观察者们在这里也许会很认真地想想奥威尔的官方宣传语言，但是很少有可能找到除了苏联报纸所述之外的其他原因了。

心照不宣的意识形态信仰宣称时代站在苏联体制这边。苏联在对抗帝国主义阵营斗争中的最终胜利是大势所趋，是符合历史客观法则的。世界社会的绝大多数支持维护和平。《共青团真理报》宽慰地叙述道，“热爱和平的国家的声音，尤其是苏联的，在联合国大会中非常有力。”^④《消息报》也同样安慰其读者说，西欧绝大多数民族反对部署潘兴导弹并且倾向于抵抗美国扩张主义。^⑤总体的力量对比最终将向苏联阵营倾斜。换句话说，这些语言中没有流露出对世界社会主义道义正当的最终胜利的一丝怀疑。

1994：善意、怀疑和自我反思

1994年，俄罗斯政治和传媒环境明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不再存在，报纸也不再以苏共的指示和命令为纲了。本文研究的两份报纸在这个阶段都是独立、自由和市场化的，是多元化政治声音的平台。

1994年初对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的新闻报道非常积极。《消息报》赞美了克林顿的国会致辞，称演讲是“精心构思、热情洋溢的”，总统被比喻成“经

① Grigor'yants A., “Al'yans, sotryasaemyi raspryami”, *Izvestiya*, 1984, 14 January.

② Ibid.

③ Kononov, P., “Ekho v fiordakh”, *Izvestiya*, 1984, 16 January.

④ *Komsomolskaya Pravda*, “Ostoyat ‘zhizn’ na zemle!”, 1984, 10 January.

⑤ Grigor'yants, A., “Al'yans, sotryasaemyi raspryami”, *Izvestiya*, 1984, 14 January.

验丰富的运动员”，发挥出了他的最大能力。^①此外，克林顿获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巅峰式的民众支持率”，甚至把里根等备受人们尊敬的总统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这个纪念性的对里根的重新评价最能代表俄罗斯对美国印象的基本的导向性改变。《消息报》指出，克林顿的致辞反映了有着令人惊叹的增长数据的经济成功和缩小了的社会分裂。^②克林顿对国会不吝赞美之词，即使国会再三企图阻挠他的政策。听众非常喜欢克林顿的演讲，总统演讲被底下的掌声打断超过 63 次。在这篇文章中，克林顿表现得像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

另外，1984 年时对美国的妄想明显减少。即使在对北约的特别报道中，美国被描绘成普通盟友，而不再是无处不在的傀儡的主人。1994 年也是全方位报道的一年。一方面，提供了关于美俄双边合作项目的正面报道，比如在外太空的合作项目和联合军事演习；另一方面，也写到了一些摩擦事件，例如关于察觉到的美国对俄罗斯政治的干涉，对美国取代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经济援助的恐惧，美国和北约在波斯尼亚战争中采取进攻策略而俄罗斯表现得谨慎克制等等。

此外，两份报纸表现出对国家自身几乎全神贯注的关注。事实上，国际新闻只有在反映俄罗斯国内外政治现状时才有些新闻价值。这是对于那年以波斯尼亚战争为典型的一系列事件而言的。报道关注俄罗斯的外交行动，关注这些行动如何影响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声誉以及对俄罗斯国内政治有何暗示。关注重点是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而非巴尔干半岛上演的戏剧性事件，也绝非是苏联时期所宣称的人类的命运。

在萨拉热窝之围的处理上，俄罗斯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功。外交部副部长维塔利·丘尔金 (Vitalii Churkin) 成功促使各方达成协议。在拉多万·卡拉季奇 (Radovan Karadzic) 的政治领导下，波斯尼亚国内的塞尔维亚武装力量从其在萨拉热窝的据点撤退。美国和北约的最后通牒是塞尔维亚人在 10 天内解除重武器装备，否则北约飞机将开始对塞尔维亚人据点开始空袭。最后通牒似乎只加强了塞尔维亚人的不妥协立场，直到丘尔金成功说服塞尔维亚领导人撤退。俄罗斯媒体欢欣鼓舞，尤其是因为丘尔金的成功被认为是俄罗斯重返世界政治舞台的象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外交退居二线：“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关于巴尔干民族的未来的问题无法解决”，《共青团真理报》欢呼道。^③文章提到克林顿总统就这次成功的外交向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表示祝贺，这也体现了“国际社会一致认同，即便是勉强的，俄罗斯带着自尊重返国

① Nadein Vladimir, “Kogda ekonomika protsvetaet kongress aplodiruet stoya”, *Izvestiya*, 1994, 27 January.

② Ibid.

③ Moshechkov Sergei, “Razvyazhet li ‘ruka Moskvyy’ balkanskii uzel?”, *Komsomolskaya Pravda*, 1994, 22 February.

际外交舞台”。^①

然而，几乎在丘尔金成功的同时，克林顿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会上，他揭露了中情局的一个重要官员奥尔德里奇·艾姆斯（Aldridge Ames）是俄罗斯联邦的间谍。与艾姆斯一同受雇于中情局的他的妻子也受到了牵连。几篇俄罗斯报道称克林顿总统亲自告诉媒体此事而不是按照惯例和低调原则由中情局官员出面处理并非巧合。这些报道称新闻发布会的时间选择也不出人意料。据称揭发此事是为了分散对俄罗斯在巴尔干外交荣誉的注意力而策划的。^②根据这种逻辑，俄罗斯应该被简单地告知要有自知之明，特别是它还正在接受美国的信贷援助。《共青团真理报》用讽刺的言语描述克林顿总统的新闻发布会：“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介入此事。当他提到狡猾和忘恩负义的俄罗斯人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是如此的惊恐啊！”^③

报道指出美国当局在艾姆斯事件上极为虚伪，因为“俄罗斯在华盛顿做的任何事情都是美国已在莫斯科做过的”。^④换句话说，即使对待美国的态度与10年前摩尼教的形象相比已经有了差别，但是怀疑仍然挥之不去。在诸如《共青团真理报》等俄罗斯媒体的报道中可以时不时地察觉到对于过去的怀念：“想当年，任何西方大国煽动鼓吹俄罗斯间谍事件，莫斯科必秉持以牙还牙的原则予以回应。你拘留我也拘留，你驱逐我也驱逐。即使是在戈尔巴乔夫统治前期也是如此。但是自那时起，政治意愿衰弱了……如果俄罗斯希望表现出强硬立场，它将不得不曝光两个在莫斯科的间谍。”^⑤

2004：自信、务实和隐痛

2004年，《消息报》已经成了具备实事求是报道风格及老练分析能力的成熟报纸，大部分文章都符合官方政策。报纸以大量篇幅报道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特别是在一年一度美国总统向全国发表演讲之时。这场战争被描绘成处于取胜无望的状况中。对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广泛搜索徒劳无功，美国领导的对费卢杰的决定性袭击也是如此。然而，这些报道都选用了相对中立的词汇进行描述，而且报纸也没有显著地批评美国的行为。

① Ibid.

② Shal'nev, Aleksandr, "Otchego shumit Vashington?", *Izvestiya*, 1994, 25 February.

③ Vasil'ev Aleksandr, "Shpion iz TsRU – razvedchik KGB?", *Komsomolskaya Pravda*, 1994, 2 March.

④ Vasil'ev Aleksandr, "Eims igral v krestiki, poluchaya za eto summu c pyat'yu nulyami?", *Komsomolskaya Pravda*, 1994, 25 February; Nadein, Vladimir (1994b): A "rest agentov KGB v Amerike", *Izvestiya*, 24 February.

⑤ Vasil'ev, Aleksandr, "Eims igral v krestiki, poluchaya za eto summu c pyat'yu nulyami?", *Komsomolskaya Pravda*, 1994, 25 February.

《共青团真理报》在 2004 年已成为了一份倾向于报道名人、性、占星术、不明飞行物之类话题的平民报纸。其政治性报道，如果有的话，有着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然而，两份报纸的共同趋势是如今明显地有着对于俄罗斯恢复其国际角色的自信，而 1994 年时是不确定和大量反省。最能表现这点的是在这一年对于美国总统选举最后一站的系列报道。在这些报道中阐述的美国形象和俄罗斯默认的自身形象明显地相互影响。

《消息报》和《共青团真理报》从俄罗斯的角度坦率地分析了两位总统候选人小布什（George W. Bush）和他的民主党对手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优势和劣势。《共青团真理报》驻华盛顿记者讨论了选举结果的前景：如果小布什获胜的话，俄罗斯将会从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良好私交中获益。但是，报纸也指出了小布什所代表的帝国主义事业迟早会与复苏的俄罗斯的外交政策雄心冲突。^①另一方面，克里获胜意味着俄罗斯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来自美国的对车臣战争中人权和民主问题的指责。^②但是获胜的克里也许能修复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所称的旧欧洲因为伊拉克战争的争论而受损的关系，俄罗斯也会因为与德法的友好关系而获益。总的来说，报纸明显倾向于时任总统的小布什。报道说，特别是由于两国总统互信务实的关系，俄美关系基本上发展稳定。两国在国际领域，主要是在全球反恐战争中，有着一些共同利益。文章略带感激地指出，在车臣武装人员在别斯兰学校劫持并血腥屠杀人质后，小布什是第一个向普京表示慰问的外国领导人。^③其他实用性因素包括布什与美国石油产业的联系，小布什会支持石油在国际市场上持续高价，这必然对俄罗斯有利。^④国际上公认的诋毁小布什总统任期的倾向间或在俄罗斯蔓延，说明了俄罗斯对美国的看法有着不能释怀的矛盾情绪。至于布什的连任会对俄罗斯有何影响的问题，《共青团真理报》一篇匿名文章提醒到：“即使是雄辩和 3 亿美元的竞选成本，都无法让美国人民相信克里能比美国历史上最差的总统之一的布什做得更好。我们现在可以预见在反恐战争伪装下的持续扩张了。”^⑤

俄罗斯报纸也没有忽视美国官方代表对俄罗斯国内政治发展趋势的批评。2004 年 1 月，时任国务卿的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访问俄罗斯并会见俄外长伊戈尔·伊万诺夫（Igor Ivanov），同时与总统普京进行了非正式对话。文章提到美国几次表达了对俄罗斯政治不民主趋势的不满。鲍威尔否认了美国对俄罗斯国内事务的

① Umerenkov, Evgenii, “Kerri Busha ne slashche”, *Komsomolskaya Pravda*, 2004, 3 November.

② Yusin, Maksim, “Bush doma-2”, *Izvestiya*, 2004, 4 November.

③ Kabannikov, Andrei & Maksim Chizhikov “Chto Rossii zdat’ot Busha?”, *Komsomolskaya Pravda*, 2004, 5 November.

④ Ibid.

⑤ *Komsomolskaya Pravda*, “Dzhordzh eshche poBushuet”, 2004, 4 November.

任何干涉，但是承认讨论了民主化和新闻自由。《共青团真理报》并不相信鲍威尔所说，并刻薄地补充道，如果这次会面很友好，那为什么美国没有马上决定同意自1996年就开始规划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联盟。^①

鲍威尔在莫斯科的会晤中真正涉及的棘手问题是俄罗斯在格鲁吉亚的军事存在。^②鲍威尔暗示，美国也许会为俄罗斯迅速撤离买单。这显然触到了俄罗斯媒体的痛处，引起了对俄罗斯大国权利受到侵犯的各种回应。“下一步美国会让我们离开哪里？”《共青团真理报》的一个专题版面问道。^③几位名流给出了选项，中亚、所有后苏联区域、文化领域、国际运动场都被愤慨地列入其中。

通过新闻报道来判断，俄美关系变得越来越模棱两可。“他们是我们的盟友，竞争者或者甚至是真正的敌人？”《共青团真理报》一位评论员在总结俄罗斯面临的困境时问道。^④显然，自信心日增的俄罗斯不需再忍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吩咐，即使对方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另一方面，俄罗斯也不能冒险公开对峙，因为它还需要美国在经济方面的支持。对于“9·11”和反恐战争后美国在中亚政治军事地位的上升，《共青团真理报》的评论员评说道：“如果用冷战逻辑推断，那么我们应该全力反抗，维持我们在可能的任何地方的存在。但是在公开的冲突中我们注定失败，因为美国经济实力雄厚。但是有一件事仍是确定的：俄罗斯必须意识到自身的巨大价值，美国也必须认识到它需要俄罗斯的程度并且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意识到其利益所在。”^⑤

2009：希望、怀疑——重返苏联？

通过这段时期数量相对较少的文章样本来判断，这两家报纸对美国的看法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即使《共青团真理报》的报道风格更为极端。这两份报纸都对奥巴马总统本人和其所代表的现象有着明显的好奇心。他的开罗演说被誉为是文学杰作，然而其寓意是谨慎的，而且字里行间蕴藏着怀疑。两家报纸的评论员都觉得其有言行不一的危险，一些评论员还注意到虽然演讲言辞优雅，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

① Shevtsov Oleg, “Demokratiya v Rossii bespokoit Vashington”, *Komsomolskaya Pravda*, 2004, 27 January.

② Grigor’eva, Yekaterina, “Putin i Pauell obsudili ‘upravlyaemuyu demokratiyu’”, *Izvestiya*, 2004, 27 January.

③ *Komsomolskaya Pravda*, “Otkuda oni nas eshche poprosyat?”, 2004, 27 January.

④ Anisimov Evgenii, “Gazovye interesy Rossii i Ameriki: Voенno-bazovye”, *Komsomolskaya Pravda*, 2004, 27 January.

⑤ Ibid.

“这篇演说包含了全部仪式咒语来影响穆斯林世界”，《共青团真理报》提到。^①《消息报》也指出，“他承诺承诺再承诺”。^②

同时，奥巴马对待穆斯林世界政策的不清晰也得到了强调，而导致今日美国和穆斯林世界紧张关系的政治策略则始于克林顿时期。几百万难民、制造战争的塔利班和基地人员都是美国政策所造成的，《共青团真理报》对克林顿给予了负面评价。^③特别是考虑到奥巴马获胜后很多克林顿的助手重返华盛顿的权力核心圈子，这也是奥巴马无法轻易摆脱的政治遗产。同时，也有说法称奥巴马在开罗所讲的其实是新瓶装旧酒。与包括伊朗在内的穆斯林世界加强对话的必要性的话题早已被提出，特别是被前任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这么说来，开罗演说可以被认为是向俄罗斯外交路线的全面靠近，但是其首倡者被认为是普京而不是奥巴马。^④从这里也能得出关于俄罗斯国内政治情形的一些结论：被称赞为具有远见的是普京，而非其继任者梅德韦杰夫。总之，2009年样本传达的印象是俄罗斯重新获得了对于继续扮演大国角色的自信。这种角色认同将会继续得到加强，直到赢得普遍承认，而不是像2004年时在有关美国的报道中那么经常和明确地被忽略掉。

奥巴马所代表的新意，通过新社会媒体直接传达给了全体选民并得到了适当的承认，但又带着几分谨慎。《消息报》老练的观察员意识到了奥巴马及其团队使用社会媒体所带来的优势，但是也暗示了奥巴马政府对YouTube等施加的控制挑战了言论自由。^⑤当在YouTube搜索其前任小布什的视频时，出现的都是嘲弄的片段，但是搜索奥巴马时得到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对于他的描述都是有利的，不利的视频根本没有被放出来。《消息报》是这么评价的，奥巴马“征服了网络”。^⑥

最后，对奥巴马时期新特征的相对谨慎和怀疑也在两份报纸对于打苍蝇事件的新闻报道中反映出来。在一场电视直播中，美国总统通过猛击成功战胜了一只在其介绍美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对策时烦扰他的苍蝇。两家报纸都半开玩笑的提出了总统出人意料的行为到底流露出了他怎样的内在自我的问题。为什么他不能更好地关注他面前的正事？是不是在其可靠的外表下隐藏着暴力人格？^⑦

比照两家报纸在审查制度下的内容，2009年的《共青团真理报》在一个方面表

① Baranov Andrei, “Obama – musulmanam: ‘davaite zhit’ družhno!”, *Komsomolskaya Pravda*, 2009, 5 June.

② Melor Sturua, “Kairskaya uvertyura Baraka Obamy”, *Izvestiya*, 2009, 9 June.

③ Andrei Baranov, “Obama – musulmanam: ‘davaite zhit’ družhno!”, *Komsomolskaya Pravda*, 2009, 5 June.

④ “SShA poshli po sledam Rossii”, *Izvestiya*, 2009, 8 June.

⑤ Melor Sturua, “Kak Barak Obama podchinil sebe internet?”, 2009, 16 June.

⑥ Ibid.

⑦ Yekaterina Zabrodina, “Obama pod mukhoi”, *Izvestiya*, 2009, 18 June; Krasnikov Nikita, “Prezident SShA gotovit ekonomicheskii proryv”, *Komsomolskaya Pravda*, 2009, 17 June.

现突出。如今的它以一种追求轰动效应的方式报道美国。影响最深远的例子是它所刊登的几篇文章称猪流感和禽流感事实上都是五角大楼实验室的发明，抗流感药物达菲是美国国防部和大企业合作研制的，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是整个网络的幕后策划者等等。报纸指出，流行病所导致的恐慌和忧虑，就像“9·11事件”，符合美国控制国际社会和世界舆论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①在这些方面，报纸的报道实际上与1984年时的报道传统相似。

结 论

虽然美国在俄罗斯公众讨论中被诋毁为道德腐朽、衰退并拥有强烈的权力欲强的，但作为毫无争议的超级大国，美国继续成为俄罗斯评论员们衡量自己国家的标准。无论是在1984年、1994年、2004年还是在2009年。对美国的评论表现出深层的矛盾心理：对其展示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尊敬和羡慕，还有对感觉到的道义缺陷、理想浅薄和公开的扩张主义的批评和鄙视。本文中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俄罗斯评论员们在表达对他者美国的矛盾的意见的同时，也暗示了他们对俄罗斯应该在国际领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的看法。根据这些看法，当涉及到文化资产的时候，俄罗斯表现得更好，但是在世界政治的现实层面却表现得更差。嫉妒和憎恶似乎成了公众讨论美国的基础。

至于反映的美国形象的变化，本文发现最为积极的形象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而在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的例子中表现出来的美国主题形象是主要的国际对手，美国不断受到批评，有时甚至被藐视。报道表现出了这段时期俄罗斯称霸全球雄心在成长；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抱负都被俄罗斯糟糕的经济状况所限制。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大国地位完全没有受到怀疑；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最后胜利是笃定之事。在2004年，就跟2009年一样，俄罗斯以一种务实和去意识形态的方式重回世界舞台，即使美国在大多数时间被认为是俄罗斯实现抱负的敌人和阻碍。然而，这也激起了对美国意图占据道德高地对抗作为大国的俄罗斯和企图批评俄国内民主缺陷的愤慨。

对于在这些年中作为美国缩影的人物，两份报纸的报道中都有着清晰的模式。里根被一致地用非常情绪化的词汇谴责为权力欲强烈、虚伪、宗教和意识形态盲目，邪恶到了几乎疯狂的地步。考虑到时间段，显而易见克林顿得到的待遇会好一些。

^① Evgenii Chernykh, “Svinnogo grippa net! My ego pridumali, gospodin prezident!”, *Komsomolskaya Pravda*, 2009, 11 June; Chernykh, Evgenii, “Amerika pugaet nas grippom, chtoby podchinit’mir?”, *Komsomolskaya Pravda*, 2009, 18 June.

他是一位善意的富有天赋和魅力的领导人，一般被认为是有效和合作的，但是过度爱好修辞和戏剧，例证就是其在埃姆斯间谍事件中的表现。虽然小布什受到全球的政治评论员们无情的对待，但是俄罗斯报纸对其持同情立场。虽然被贴上了危险的扩张主义倾向的标签，但是小布什被描绘成务实的、与普京私人关系友好、致力于美俄有着共同利益的反恐战争。评论还略带感激地提到小布什在俄罗斯人权记录和车臣问题上的批判声似乎不那么强硬。现在评说奥巴马还太早，而且相关的文章样本数量相对较少。虽然俄罗斯报纸着迷于奥巴马现象的光环，但是主要印象仍是对于“新”的实质内容的怀疑，同时也展示出了一种趋势：摒弃奥巴马政策中的创新精神，转而宣称普京是首创这种精神的政治家和最初的思想者。这似乎是希望看到俄罗斯重回中心舞台的需要，而以美国为镜是为了确认这是政治现实而非痴心妄想。

(胡彦 译)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image of the US has developed in two major Russian daily newspapers, *Izvestiya* and *Komsomolskaya Pravda*, in a time period comprised of a total 20 weeks' of study in the years of 1984, 1994, 2004 and 2009. For Russia this time span was dramatic: from seemingly stable superpower in the 1980s, over the chaos afte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90s, to the partial comeback to great power statu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While telling the story how the image of the US has evolved, the article also describes how Russian self-images have developed. The image projected of the US was Manichean in the 1980s, whereas the most benevolent images were found in the 1990s. The cases from 2004 and 2009 reflect an assertive Russia that is back on the world stage. The US is here again often criticized, but also like before comprises the scale against which Russia itself is measured.

【Key Words】 Russia, Soviet Union, United States, images, self-images, national identity, newspapers.

【Аннотация】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исследуется, как разрабатывался образ США в двух основны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ежедневных газетах «Известия» и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во временном интервале, в общей сложности состоящем из всего 20 недель изучения в 1984, 1994, 2004 и 2009 годах. Для России этот промежуток времени был драматичным: переход из, казалось бы, стабильной супердержавы в 1980-х годах, через хаос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1990-х годах, до частичного

возвращения к статусу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ы в начале 21 века. Рассказывая историю о том, как формировался образ США, в статье также описывается, как разрабатывалась самооценка России. Изображение, проецируемое из США, было Манихейским в 1980-х годах,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самые доброжелательны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были обнаружены в 1990-е годы. Ситуация в 2004 и 2009 годах отражает напористую Россию, которая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на мировую арену. США в это время снова часто подвергаются критике, но так же, как и раньше,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из себя некий образ, против которого измеряется сама же Росс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ША, образы, самооценка,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газеты

(责任编辑 常喆)

俄罗斯经济与外交

金融危机后的俄罗斯

斯蒂芬·赫德兰*

【内容提要】 普京治下的经济复苏，改善了俄罗斯的财政状况，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没有使俄罗斯经济实现成功转型。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本质：普京八年的俄罗斯经济只是“恢复性增长”，而非以投资和创新所驱动的可持续性增长，对能源仍然高度依赖。虽然危机之后俄经济有所恢复，但与能源价格上涨密切相关，其现代化进程任重道远。2012年之后的俄罗斯仍然将是一个缺少竞争力且严重依赖能源资源出口的国家。

【关键词】 金融危机 能源依赖 财政政策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F112.7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0)06-0071-(18)

全球金融危机深刻地暴露了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本质以及它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真实地位。乍看之下，俄罗斯经济的表现似乎并不差。例如，无可否认，俄罗斯远比其它大多数 20 国集团成员国更好地挨过了金融危机的冲击，^①经济正在反弹。季度统计表明，2009 年第三季度经济已经开始增长。但是，进一步的思考显示，不能轻易地认为，如果没有严重的财政危机，俄罗斯的实体经济部门也将同样处于良好的状态。

下文将关注俄罗斯经济对碳氢化合物的严重依赖，厘清其在近期和远期对全球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显而易见的好处是，过去几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不断攀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使俄罗斯大发横财。尽管俄罗斯政府通过审慎管理这些财产，为经济软着陆提供了巨大的回旋余地，但由于产业结构严重扭曲，创新缺少内

* 斯蒂芬·赫德兰 (Stefan Hedlund)，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欧亚研究所，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① 到 2008 年年底，俄罗斯的债务大约不超过 GDP 的 71%，相比之下，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债务平均达到 300%，西班牙达到 350%，英国达到 380%。Moscow Times, March 16, 2010.

生动力，寻租偏好普遍存在^①，从长远看，依然要付出代价。

在美国次级债务危机爆发前和银行贷款冻结前的数年里，上述系统问题表现得不很明显，该领域中的大多数专家几乎也未察觉。普京总统的威权主义政策再度生效，使专家们陶醉在一片乐观主义情绪当中。他们卖力地编织着各种对俄罗斯经济的想象：更大程度的多元化、更深刻地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更多地依靠消费者的需求而不是依靠开采资源的收入来驱动经济。

这些宏伟计划的核心内容就是把俄罗斯描绘成快速发展的金砖四国之一。所谓“金砖四国”是高盛（Goldman Sachs）的分析家Jim O’Neill于2001年创造的一个名称，认为到2050年，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实力的总和将使当前世界上最富国家的经济黯然无光。^②

2009年6月16日，金砖四国的领导人在俄罗斯城市叶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召开了第一届峰会，会议强调了四国集团的重要性：占全球GDP的15%和人口的40%，并希望四国联合行动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③但事实表明，东道国不再有资格充当这一杰出团体的成员了。^④

我们注意到，在危机中，俄罗斯仅仅在财政方面表现不错，而中国和印度则维持了坚实的增长，2009年GDP分别增长了8.7%和6.1%，巴西尚能稳住阵脚，仅仅下降了0.2%，而俄罗斯则下降7.9%。其他国家实体经济部门的显著增长凸显了俄罗斯的下滑。后者表现为出口的剧烈收缩、净资本外流的大量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巨幅下降和人力资本的持续萎缩。也许最关键的问题是，如此审慎地积累起来的金融储备一旦耗尽，俄罗斯将面临第二轮严重的财政失衡，由此必然导致公共开支的大幅削减和主权外债的增加。而这些状况很有可能于2010年发生。

下文将对这些观察的细节进行阐述。如果将媒体的宣传同严峻的现实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媒体对普京总统两届任期内俄罗斯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报道是空洞的。这意味着，在面临诸如美国次级债务危机等外界冲击时，俄罗斯非常脆弱。

下文将阐明为什么经济复苏没有使俄罗斯经济成功转型。文章将讨论2008年9

① Clifford G Gaddy/Barry W. Ickes, *Russia's Addic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source Dependenc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forthcoming, 2009.

② 参见：<http://www2.goldmansachs.com/ideas/brics/building-better-doc.pdf>，该文章介绍了最早的概念；<http://www2.goldmansachs.com/ideas/brics/index.html>，不断更新有关争论的内容。

③ 参见 <http://www.fmprc.gov.cn/eng/yfgk/t568489.htm>.

④ 俄罗斯专家 Dmitry Trenin 得出结论说，“莫斯科应该忘掉削弱美国全球霸权的想法，而应当关注如何使俄罗斯保有在‘世界头等强国联盟’中的地位。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候选国家正在进入这个联盟，而俄罗斯却在退出”，Dmitry Trenin, “Cost of the Matter,” *Kommersant*, 2010, May 14. 有关更多背景请参见：Julian M Cooper, “Of BRICS and Brains: Comparing Russia with China, India and Other Populous Emerging Economies”,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6, vol. 47, no. 3.

月金融危机的影响，评价当前正在发生的复苏，尤其是 2012 年总统选举的预备期将如何使得财政政策变得复杂化，这次选举会产生什么后果，意味着什么。

一、普京治下的复苏

当普京进入克里姆林宫接掌政权时，俄罗斯经济的前景的确非常暗淡。1998 年 8 月的金融崩溃消灭了 400 亿美元的财政短期债券(GKO)，此后将由市场承担所有的主权债务拖欠。遭受了巨大损失的外国投资者对俄罗斯当局照顾国内业者的做法感到愤怒和沮丧。1999 年，很多人认为俄罗斯简直完蛋了。^①但是，有两个重要的进程在背地里启动了，它们共同导致了一场彻底的转变。

第一个进程是纯技术意义上的，不难为人所预料。金融崩溃起因于俄罗斯中央银行放宽卢布波动范围的决定。从 1995 年开始，俄罗斯中央银行就奉行了一种“爬行”政策，该政策旨在控制通胀，有使卢布逐渐贬值的倾向。由于这项政策鼓励进口，限制非能源部门的出口，许多观察家认为这将会导致“荷兰病”，另外一些人同意这种说法，强调俄罗斯将受到“资源诅咒”。^②

对本文的主旨来说，重要的是随着政府债务螺旋上升并脱离控制，以及金融市场处于一种冻结状态，汇率的压力上升到使俄罗斯中央银行被迫屈服的程度。1998 年 8 月 17 日，俄罗斯中央银行决定放宽货币波动幅度，实际上允许了卢布汇率的下行。此后，卢布跳水了，兑美元汇率由 6.2: 1 跌至 20.65: 1。^③

对所有相关事态来说，这种发展本质上看是健康的，但由于政府决定暂停短期政府债务，这件事就被放到了一边。尽管一开始只是个简单的手续，但对有关条款的讨价还价却迫使投资者们接受了一个差距甚远的解决方案。虽然“拖欠”一词在技术上并不正确，但对于那些损失了数十亿财产的人来说，就不是一个词的问题。

卢布的垮台只是一种伪装，被肮脏的内部人交易所掩盖，后者与债务拖欠有关，起因于叶利钦时代的深度萧条。^④ 尽管俄罗斯制造业遭遇到需求萎缩和政府撤销补

① 1999 年春，《经济学家》杂志戏谑地谈到，多年来俄罗斯渴望加入七国集团这个最富有的工业化国家的俱乐部，现在却快要加入不那么富有魅力的 P7 国家俱乐部了，这些国家从 IMF 取得贷款却无力偿还债务，是“贫穷的受战争折磨的地方，有些根本就不能称其为国家。”这些被遗弃的国家是苏丹、利比亚、刚果和索马里。《The Economist》，1999，February 6，p. 21.

② 反对“资源诅咒”的例子参见：Michael Alexeev, Robert Conrad, “The Elusive Curse of Oil,”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2009, vol.91, no.3. 再参见：Rudiger Ahrend, “Can Russia Break the ‘Resource Curse’?”,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5, vol.46, no.8.

③ *The Central Bank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nual Report, 1998*, at <http://www.cbr.ru/eng/publ/God/Chptr3e.pdf>, p.73.

④ Stefan Hedlund, *Russia's “Market” Economy: A Bad Case of Predatory Capitalism*, London: UCL Press, 1999.

贴的双重影响，各种各样的机制安排通过大量的破产妨碍了调整，为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开辟了道路，结果是“虚拟经济”的出现，使得实际上已经破产的企业继续占有着劳动力和资本资源。^①

当货币突然贬值时，危机前几乎渗透了国内市场的进口消费品受到了直接的影响，进口量暴跌。按照民间的说法，莫斯科 80—90%的消费品零售业务掌握在外国公司手里。由于俄罗斯的制造商手中拥有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它们能够对市场的变化作出反应，迅速地增加了产量。在这种进口替代的基础上，俄罗斯的经济开始复兴了。到碳氢化合物价格开始回升时，俄罗斯的国内需求进一步受到间接的刺激，GDP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了四分之一。^②

如果认为油价的上升对实体部门最初的复苏没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么它对金融部门的影响就很大了，它将俄罗斯经济从瘫痪无望变得闪亮迷人。伴随着油价的攀升，股票市场也反弹了。飞来的横财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联邦预算赤字记录发生了改变，延续多年并常常是数额庞大的赤字变成了连续 8 年的稳定的盈余；二是联邦储备的建立和主权外债几乎在同一时间完全彻底的消失。这些数字是异常惊人的。

能源价格上升的主要后果在于它急剧地改变了俄罗斯的贸易平衡。石油产量的增长超过了 50%，从叶利钦时代的平均每天 600 万桶增长到普京时代的平均每天 950 万桶，^③ 出现了大规模的贸易盈余，这反过来又导致同样大规模的石油美元的流入。从 1999 年到 2008 年的十年中，俄罗斯经常项目下积累的盈余总数达到了 5874 亿美元，^④ 中央银行持有的国际储备也因此 在 2008 年 8 月达到了 5966 亿美元的最高峰。只有中国和日本超过了这一数字。

通过特别出口税和能源公司的利润税，政府得到了资金流入的很大一部分，^⑤ 并明智地用这笔飞来之财偿还了以前的外债。到 1998 年年底，政府债务最高时已经达到 1389 亿美元，占 1998 年 GDP 的 68%。而到 2008 年年底，政府债务减少到 294 亿

① “虚拟经济”概念的最早表述参见: Gaddy, Clifford G., Barry W. Ickes, “Russia’s Virtual Economy”, *Foreign Affairs*, 1998, September/October. 有关争论的最新概述参见: http://www.brookings.edu/articles/2008/02_virtual_economy_gaddy.aspx.

② 乌拉尔原油是俄罗斯最主要的出口混合油，其价格于 1998 年 12 月跌至底价，每桶 8.7 美元，两年后，仍低于 30 美元。2007 年开始回升，2008 年 7 月达到峰值，每桶 142.5 美元，此后价格再度下跌 75%，到 2008 年每桶已不到 34.3 美元。参见: <http://tonto.eia.doe.gov/dnav/pet/hist/LeafHandler.ashx?n=PET&s=WEPCURALS&f=W>。在油价上升产生实际影响之前，实体部门的复苏就开始了。与往年同期相比，1999 年第三和第四季度分别上涨 11.4% 和 12.0%，到 2000 第四季度，增长率跌至 8.2%，2001 年第一季度跌至 4.7%。参见: <http://www.cbr.ru/eng/archive/>.

③ Clifford G Gaddy / Barry W. Ickes, “Russia’s Declining Oil Production: Managing Price Risk and Rent Addiction”,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9, vol.50, no.1.

④ 详细细节参见: http://www.cbr.ru/eng/statistics/credit_statistics/.

⑤ Michael Alexeev/Robert Conrad, “The Russian Oil Tax Regim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9, vol.50, no.1.

美元，不足GDP的 2%。后者中的一半是欧洲债券，是作为 1997 年秋天伦敦俱乐部债务重组交易的一部分发行的。^①

另一部分资金仿照挪威的成功例子转变成了石油基金。该基金设立于 2004 年 1 月，最初被称作一种稳定基金，作为联邦预算的一部分用来缓冲未来石油收入的波动。2006 年 2 月，该基金中的 1250 亿美元变成了储备基金，320 亿美元成了国家财富基金。^② 前者于 2008 年 9 月达到 1426 亿美元的峰值，而后者在同一时间也有 319 亿美元之多，而且在该年度余下的时间内继续攀升。

除了以备后用的功能之外，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油价事实上崩盘之时，这些基金也被用来缓解卢布的压力。通过以外国证券的形式投资石油美元，俄罗斯政府成功地避免了外来资本大量进入国内经济。

大多数居民都能察觉出石油繁荣带来的显著改善。20 世纪 90 年代，政府偿清了工资欠款和未付的养老金。由于实际收入增长了两倍，民众对普京总统的支持率达到了让大多数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羡慕的程度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进一步的思考表明，除了审慎地管理飞来的金融所得之外，没有迹象表明到普京离职时俄罗斯政府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转型，也没有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和金融的稳定。相反，全球商品市场大繁荣所打开的机会之窗基本上被浪费了。除了普京第一任期最初几年通过的重要税收和土地改革法令之外，在推进必要的制度变革方面几乎一无所成。

这种现实与前文所谈到的情景，即俄罗斯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的轨道、正快速实现现代化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我们延长分析的时间段，从苏联的崩溃而不是普京掌权开始考察，这种对比就会更加清晰。我们会得到这样一幅图景：俄罗斯经济首先遇到严重的萧条，GDP下降了 40%左右，随后进入了反弹期，到 2007 年底GDP恢复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水平。^③ 如果看到普京时代明显的成功只是弥补了叶利钦时代的自由落体式下降，人们就会承认“休克疗法”的设计师和管理者盖达尔（Yegor Gaidar）所谓的“恢复性增长”是多么的合乎逻辑。^④

① 关于俄罗斯外债细节，参见：http://www.cbr.ru/eng/statistics/credit_statistics/。注意到外债和美元的关系非常重要。GDP对汇率的浮动非常敏感，由于 1998 年卢布的贬值，1999 年债务占GDP的份额已达到 97%。参见：EBRD *Transition Reports*, at <http://www.ebrd.com/pubs/index.htm>。

② 关于规则的细节，参见：<http://www1.minfin.ru/ru/stabfund/>。See also Tabata, Shinichiro, “The Russian Stabilization Fund and Its Successor: Implications for Inflation”,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7, vol.48, no.6.

③ 根据EBRD提供的数据，到 1998 年底，GDP下降了 43.7%，到 2006 年底仍低于 1989 年 5.5 个百分点。数据来自：<http://www.ebrd.com/country/sector/econo/stats/sei.xls>。

④ Yegor Gaidar, “Recovery Growth as a Stage of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 *Studies and Analysis*, 2005, no.292, Warsaw: Center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同以投资和创新所驱动的可持续性增长相比，恢复性增长的成功之处，只是在于把苏联垮台时就已经过时了的生产能力重新捡了回来。

普京时期经济政策的真正挑战在于，20世纪90年代的固定资产投资跌落到了只能保本的水平，其原因与国家放松控制时没有相关法规阻止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所导致的掠夺性策略有关。^①经济决策的时间范围极大地缩短了，固定资本投资也名副其实地垮掉了，^②这反过来又导致了股本的迅速折旧（aging）。从1990年到1998年，俄罗斯股本每年的平均折旧几乎增长了一倍。^③

即使在普京时代固定资本投资获得了实质性增长，我们依然要问，这是否足以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解决过去十年遗留下来的问题。叶利钦时代的下跌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当普京卸任时GDP实际上只是恢复到了叶利钦之前的水平，远没有达到股本刚开始折旧时的水平。一项国际对比可以使这一点一目了然。

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固定资本投资达到了GDP的40%，这个数字与该国的繁荣景象相符。欧元区达到21%，美国为19%，而俄罗斯则不超过18%。^④与中国、美国和欧盟相比，俄罗斯的投资需求非常巨大，这种状况是非常令人忧虑的。

由于对权力的垄断，俄罗斯固定资本投资中绝大多数不可交易的商品，在俄罗斯的出售价格超过了世界市场的价格。如果按照世界市场的价格计算，俄罗斯固定资本投资将仅占其GDP的9%，这对于股本的更新和认真的重组来说是远远不够的。^⑤

俄罗斯的经历与日本和西欧战后重建的历史经历正好相反。雅克·萨皮尔（Jacques Sapir）认为，成功的重建需要“大于20%甚至接近25%”的投资力度。^⑥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除了促进旧损的基础设施和生产设施建设之外，还着重强调技术进步和培养尖端的人力资本。“日本制造”就是这方面成功的例子，成了高质量的标签。

同日本相比，俄罗斯差距巨大且令人沮丧，不但其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一直低迷，甚至人力资本也在不断地受到削弱，其研发质量和高等教育水平简直就是灾难性的。

要打破这种僵局，不仅需要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这对内对外都是一个大问题，

① Marshall Goldman, *The Piratization of Russia: Russian Reform Goes Awry*, London: Routledge, 2003.

② 参见 EBRD, *Transition Report Update*, London: EBRD, 1998, p.63.

③ Gavrilentov Evgeny, “Savings, Capital Fligh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ussi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AASS 2000 Annual Convention, Denver, CO, 2000, November 9-10, p. 12, Table 3.

④ OECD, *Economic Surve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006*, Paris: OECD, 2006, pp. 26-27.

⑤ Clifford Gaddy, “The Russian Economy in the Year 2006”, *Post-Soviet Affairs*, 2006, vol.23, no.1.

⑥ Sapir, Jacques, “Russia’s Economic Rebound: Less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Post-Soviet Affairs*, 2002, vol.18, no.1.

更重要的是需要有一种支持资源提取和资金获得的经济结构。由于人际关系的稠密网络渗透了整个等级体制，这个体制不能产生对人力资本资源的需求，无法产生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曾经谈到过的“产权密集型”生产，即依赖政府提供第三方信用的企业制度。^①

我们有理由探讨在这方面实现变革的前景，但是，让我们首先来简短地观察一下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的影响

俄罗斯政府对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最初反应与它对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反应出奇地相似。那时俄罗斯坚信经济非常健康，足以抵抗住太平洋盆地各国货币崩溃所带来的外部冲击。直到 1998 年 5 月，俄罗斯金融市场才开始认识到，仅仅翻炒短期主权债务而对债务不提供任何预算服务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是个终究要破的泡沫。此时若要采取纠错行动已为时太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到 8 月份金融就彻底垮台了。

2008 年，俄罗斯政府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宣布这是个美国的危机，不会对俄罗斯产生影响。2008 年 12 月，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克列帕奇（Andrei Klepach）因警告经济可能将进入衰退而受到普京的批评，普京坚持认为经济增长将持续到 2009 年。^② 在 1 月份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财政部部长库德林（Aleksi Kudrin）仍然坚称俄罗斯是个“稳定之岛”。^③

危机初期的这些言论可能的确反映出人们的信心，即俄罗斯经济不再受到原料价格的捆绑，能够毫无损失地度过风暴。当然也许这只是一个姿态。但无论如何，真实的情况却是影响非常严重。

2008 年，乌拉尔原油价格从一月份每桶 142.5 美元的最高价跌倒 12 月份的每桶不超过 34.3 美元，对金融业和实体经济部门都产生了严重影响。^④ 危机也引发了巨额资本的外流，它们离开俄罗斯去寻找安全的投资场所，这更加重了损失。2007 年俄罗斯资本净流入有 830 亿美元，而 2008 年则净流出 1299 亿美元。仅第四季度资本的流出总量就达到 1305 亿美元，由此可见危机影响之深。^⑤ 结果，GDP 的增长于

① Olson Mancur,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p.186.

② *Moscow Times*, 2009, April 24.

③ *St. Petersburg Times*, 2009, April 17.

④ *Moscow Times*, 2009, April 30.

⑤ <http://in.reuters.com/article/asiaCompanyAndMarkets/idINLD44860120090113>.

2008年11月转为负数，而2009年上半年，俄罗斯出现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GDP也下跌了两位数。^①

将1998年和2008年的危机相比可以看出，前者对大多数人口影响较重，而后者起初只是国家金融精英们的麻烦。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各行各业的人们正在得到工作，购买公寓，组建家庭，并在银行里存钱。金融崩溃改变了这一切：银行倒闭了，存款蒸发了，人们失业了。10年之后，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大多数人口都没有了股票，储蓄以现金形式存在。对他们来说，最初的危机只不过是媒体的标题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毕竟需要一段时间人们的消极反映才能表现出来。

最早感觉到影响的是俄罗斯臭名昭著而又神通广大的寡头们。在危机的最初阶段，银行借贷的冻结和莫斯科股票交易所的崩盘（2008年5月至10月间暴跌了80%^②）从两方面袭来，俄罗斯25个最富有者总共损失了2300亿美元。^③结果，俄罗斯富豪在《福布斯》的排行榜上的人数由2008年的87名跌落至2009年的不超过32名。^④

从短期看，拯救富豪可能显得更加紧迫。许多人收到了增收保证金的紧急通知，这可能迫使他们放弃大部分手中的证券。然而，克里姆林宫却愿意并能够施以援手了，它先是宣布了一个500亿美元的救援计划，希望为到期债务提供融资帮助。很快人们发现，最大的受益者是国内最富有者的公司，以及为这些公司提供贷款的外资银行。

俄罗斯铝业公司（Oleg Deripaska's RusAl）就是其中的一员，它接受了45亿美元贷款，偿还了许多银行的辛迪加联合贷款，这些银行有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苏格兰皇家银行、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阿尔法集团（Mikhail Fridman's Alfa Group），获得了20亿美元来偿还德意志银行的贷款。^⑤然而，由于很快认识到对本国国际储备将会存在很大的需求，政府改变了贷款方式。信贷限额很快被冻结了，只有118亿美元真正发放了出去。^⑥

提供金融支持的更一般的做法是通过中央银行的干预来确保卢布的逐步贬值。

① 运用逐年统计的方法，Q1期间GDP跌了9.8%，Q2期间10.9%，Q3期间8.9%，Q4期间则减缓至2.6%。

② RTS指数于5月19日达到最高值2498，市场资金总额达到2213亿美元，到10月24日，RTS指数跌到549.4，市场资金总额仅仅达到496亿美元，<http://www.rts.ru/en/index/stat/dailyhistory.html?code=RTSI>。

③ *Moscow Times*, 2008, October 13.

④ 过去几年的排序参见：http://www.forbes.com/2010/03/10/worlds-richest-peo-ple-slim-gates-buffett-billionaires-2010_land.html?boxes=listschannellatest。

⑤ <http://www.cdi.org/russia/johnson/2009-50-30.cfm>。

⑥ <http://www.worldaffairsboard.com/nato-russian-resurgence/50116-last-days-oligarchs.html>。

毫无疑问，2008年第四季度动用1000亿美元的目的是保护大公司。这种做法的确生效了。从10月3日到12月19日，当油价下跌64%时，卢布兑美元仅损失了6%。^①

然而，寡头们的财政困境实在严重。2009年1月，一群金属界的大佬们提出了一项过去无法想象的议案，这项议案实际上推翻了1995年备受争议的“贷款换股票”体制，而寡头们正是这个体制的产物。在一次会议上，他们向梅德韦杰夫总统提议，将包括一些俄罗斯最大的矿业和工厂在内的资产合并成国家控制的企业联合体，而作为补偿，由政府支付它们的债务。^②

尽管这一提案无果而终，但却赤裸裸地暴露出俄罗斯经济结构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外来冲击时是多么的脆弱不堪。若非2008年的金融危机，克里姆林宫就可以支配巨额的财政金融储备，那么德里帕斯卡（Oleg Deripaska）和弗里德曼（Mikhail Friedman）等人建造的大厦也就仅仅是坍塌而已，1998年金融崩溃前采用的内部人援救措施就有可能生效。

然而，正如后来的结果所揭示的那样，2009年的衰退与油价的急剧反弹相伴，也带来了股票市场的复苏，表明它独立于实体经济，后者在这一年实际上翻了一番。^③到2010年，这些寡头们，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将重返历史舞台。^④克里姆林宫为其喜爱的人提供的特殊帮助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故事。^⑤

三、梅德韦杰夫治下的复苏

开始于2009年下半年、并于2010年初积攒了一定动力的经济增长，可以被看作是另一次复苏。其他“金砖”国家（BRIC），如印度尤其是中国，在危机中增长强劲。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俄罗斯预计到2012年GDP也不会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作为2009年标志的高油价当然有助于缓和危机的财政影响，给予政府更多的空间实现软着陆，但同时这也表明石油价格的波动与俄罗斯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多么密切的关系。

在我们开始着手观察复苏如何展开，考虑其对2012年总统大选前后形势的内涵

① Clifford G Gaddy/Barry W. Ickes, “Russia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10, vol.51, no.3, p.301.

② http://www.nytimes.com/2009/03/08/business/08shift.html?_r=1&pagewanted=print.

③ RTS指数由637上升到1445, <http://www.rts.ru/en/index/stat/dailyhistory.html?code=RTSI>.

④ 根据福布斯的数据，2010年俄罗斯十亿万富翁的数量由2009年的32名上升为62名，其财产共同价值也翻了一番，由1420亿美元上升到2970亿美元, <http://www.france24.com/en/20100416-russian-billionaires-double-2010-rich-list>. 关于完整列表参见: http://www.forbes.com/lists/2010/10/billionaires-2010_The-Worlds-Billionaires_Rank.html.

⑤ 参见: <http://www.rferl.org/articleprintview/1495217.html>.

之前，也许有必要暂时离题简要讨论一下对石油的依赖。

尽管天然气大量充斥媒体的标题，常常与管线争端有关，但有两个原因使石油更有吸引力。一项简单的事实是石油比天然气带来更多的出口收入。另一个更根本的重要理由是，油价的波动会产生即时的影响，而天然气的出口价格是由长期合同决定的，其产生影响往往比石油价格滞后 6 至 9 个月。因此，天然气的情况与石油有些不同。

（一）对石油的依赖

克里姆林宫目前对石油的依赖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如果回顾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的经济发展，我们就会看到油价波动对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深刻影响。1973 年爆发的能源危机带来油价飙升，为所有的石油出口国带来了滚滚红利。就苏联来说，有关部门估计，每年得自石油天然气的总收入从 1973 年的 100 亿美元上升到了 1981 年的 4000 多亿美元，这带来了自鸣得意的乐观情绪。^①

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油价已经稳步下跌。结果石油天然气税收跌至 3000 多亿美元，而到他离职时这个数字又减少了一半，经济遭受到沉重的打击。^② 盖达尔在他的著作里将苏联帝国的崩溃归因于能源价格的下跌和对能源工业综合体管理的不善。^③ 1999 年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油价开始大幅攀升，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税收增加了 6 倍多，在 2008 年达到 6000 亿美元的峰值。^④

尽管人们毫不怀疑油价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财政政策 and 对外债的管理，但这与俄罗斯非能源经济部门之间的关联性却是众说纷纭。上文曾经提到，要求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依赖的强大呼声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为了理解这一现象，我们应当注意到，官方所持的经济迅速现代化、服务部门充满活力的看法，是建立在能源工业综合体扭曲的统计数字之上的。

世界银行在其 2004 年 2 月的《俄罗斯经济报告》中，对俄罗斯的官方数据感到非常惊讶：俄官方数据一方面宣称能源不足俄罗斯 GDP 的 9%，而根据推测得出的服务部门却占到 GDP 的 60%；另一方面，俄官方数据还宣称石油天然气出口占俄罗斯 GDP 的比重不少于 20%。^⑤ 简单的答案就是由于避税和逃税，俄罗斯石油公司使用一种精心策划的价格转移方法将得自核心业务的收入转移到贸易公司，在许多案例

① 关于石油天然气领域中地租的概念，参阅 Gaddy, Clifford G., Barry W. Ickes, “Resource Rents and the Russian Economy”,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y*, 2005, vol.46, no.8. The numbers given are in 2009 dollars, taken from Gaddy and Ickes, 2010, op. cit., p. 283, Figure 1.

② Gaddy and Ickes, 2010, op. cit., p. 283, Figure 1.

③ Yegor Gaidar, *Collapse of an Empire: Lessons for Modern Russia*,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7.

④ Gaddy and Ickes, 2010, op. cit., p. 283, Figure 1.

⑤ World Bank, *Russian Economic Report*, 2004, no.9, at: www.worldbank.org.ru.

中后者的业务非常模糊，使得收税极为困难，从而严重歪曲了俄罗斯GDP的统计。

为了着手矫正这些失误的统计，分析家注意到，在英国和荷兰，石油天然气的贸易和运输的盈利空间（margins）为零，而在俄罗斯前者为 35%，后者为 63%。如果把这些虚假的盈利空间还原至其原有的起源之处，那么能源在这个国家的GDP中的地位立刻就膨胀至 25%。^① 而且，这还没有考虑很多能源在国内的销售价格低于国际市场的水准。炼油行业作用的进一步扩张必须被看作是个严重的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清楚地说明了俄罗斯经济发展与油价波动的联系是多么的直接。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莫斯科股票交易所的RTS指数，该指数在过去 10 年中与石油价格关联甚密。另一个依赖石油的证据可以通过测算俄罗斯前 100 个非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年销售收入和油价变动的关系得出。家庭消费和零售业的起起落落也表现出这种症状。^②

这些观察表明，尽管近年来对多元化和降低石油依赖谈论很多，但俄罗斯经济仍然是能源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的人质。在下文中，我们将探讨石油依赖带来的主要影响。一个是短期的，涉及到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出于对潜在的社会动荡的担心，对用削减开支的办法恢复财政平衡施加严厉的限制。另一个是长期的，涉及俄罗斯经济确保参与全球一体化和保持竞争力的前景，这是一个挑战，使迫切急需的现代化和持续低水平的固定资产投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者都将在 2012 年总统选举的预备阶段中有所表现。

（二）对社会动荡的恐惧

尽管起初俄罗斯民众并没有感觉到危机的影响，但后来的迹象表明，政府对社会动荡的前景非常担心。2009 年 1 月，最低工资上调了 88%以上，从每月 2330 元卢布增加到了 4300 卢布。^③

很难确定这种担心达到了什么程度。2009 年爆发了一些事件，最著名的是 6 月份皮卡雷沃（Pikalyovo）小镇事件。面对动荡的切实危险，普京亲临现场，承诺要体恤冤情。此外，他还公开严惩亿万富翁德里帕斯卡，此人被比作“蟑螂”，责令他在当地的水泥厂开工并支付正常的工资。^④ 在网站YouTube上可以看到这一公开事件

① 世界银行分析家没有注意的是他们关于俄罗斯投入产出的工作是以日本学者的成果为基础的。参见 Masaki Kuboniwa, “Hollowing Out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Enlargement of Trade Sector in Russia’s Marketization,” 向 AAASSS 年会递交的论文 Pittsburgh, PA, November 2002, pp.21-24. Kuboniwa, Masaki, Shinichiro Tabata, Nataliya Ustinova, “How Large is the Oil and Gas Sector of Russia? A Research Report”,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5, vol.46, no.1.

② 关于图标和讨论参见 Gaddy and Ickes, 2010, op. cit., pp.284-87.

③ <http://www.premier.gov.ru/eng/events/news/2544/>.

④ http://www.sptimes.ru/index.php?action_id=2&story_id=29296.

的一段视频。^①

2010年1月底，在西部的飞地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发生了第一起严重事件。自12月份发生了5000名抗议者的聚集事件后，1月份大约12000名愤怒的抗议者走上了街头。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高呼“我们受够了”！群众要求普京立即辞职。^② 一个互联网的征集签名活动也支持这一运动。^③ 尽管有谣言传闻，说加里宁格勒事件在克里姆林宫内引起了反响，目标直指那些“允许”事态发生的有关人士，但必须认识到这只是一件特殊事件罢了。

一个重要的推动力与金融救助一揽子计划有关。差不多所有银行都活下来了，从这个意义上看还是很成功的。就像在其它国家一样，俄罗斯也将国内汽车制造商加以保护。为此，政府对进口轿车施加了严厉的关税。^④ 加里宁格勒和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这样的飞地经济严重依赖旧车的进口，上述政策加重了不满情绪。这些案例结果被看作是非常特殊的事例。

来自下层的不满到底有多么严重？真正的考验到来了。3月20日被称作“愤怒日”，全国50多个城市爆发了示威事件。虽然确实有数千人涌上街头，但这与当局所担心的以及组织者所希望达到的数万人之众仍有不小的差距。^⑤ 毋庸置疑，的确存在艰难困苦，例如饥饿困扰着穷人和失业者。即使不满汇成的不断高涨的海啸最后归于沉寂，即使我们随后不再对政权稳定所受到的威胁感到恐惧，财政政策的影响仍然会存在。

在2010年预算的准备过程中，政府显然将局势看得十分严峻，决心确保社会开支史无前例的增长。2010年的联邦预算计划开支9.9万亿卢布，与2009年相仿，计划预留赤字2.9万亿卢布，或者GDP的6.8%。鉴于2009年储备基金缩水近半，从1371亿美元降到605亿美元，2010年将是俄罗斯被迫返回国际债务市场的一年。

4月份，总数达55亿美元的欧洲债券成功地进入市场。鉴于联邦预算对于借款已经设定了178亿美元的限额，发行非常的温和，而总数达250亿美元的交易量已经是超额认购了。^⑥ 由于整个2009年乌拉尔原油价格几乎翻了一倍，由每桶41.9美元上升到73.7美元，而储备基金仍然保有超过该年度赤字半数以上的基金，这些

①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rRHM-oSHlw>.

② *Moscow Times*, 2010, February 1.

③ <http://www.putinavotstavku.ru/>.

④ 对汽车制造业的支持创造了200亿美元的一揽子支持计划，包括价值115亿卢布的“石油换旧车”计划。<http://www.businessweek.com/news/2010-03-05/russian-cash-for-clunkers-may-founder-on-corruption-red-tape.html>.

⑤ *Moscow Times*, 2010, March 22.

⑥ <http://www.in.com/news/business/update-2russia-sells-55-bln-eurobond-on-25-bln-demand-723cde7fae814a4b6bca91c28f828ddf067b63ca-0-true.html>.

赤字是建立在每桶 58 美元基础上的，因而很明显最初转向主权借款仅是一种选择而非出于必须。财政部长库德林也表示今年不再增加主权借款。^①

展望 2010 年，形势却根本不同了。届时储备基金将耗尽，政府将完全依赖借款或削减开支。削减开支情况很复杂，这不仅是因为削减社会开支在政治上很敏感，尤其是到了总统选举的预备期，政府大多不愿意这样做，还因为在石油出口带来巨额利润的年代，俄罗斯政府的联邦开支扩大了四倍，这使得政府在新一轮的金融危机面前十分脆弱。

尽管财政部长库德林警告赤字的扩大正在增加政府开销，但普京仍然显示了坚定的决心兑现其诺言，2010 年 70% 的预算开支将投入到他曾经公布的社会项目中。他不仅在许诺过的养老金项目上增加了总数为 4.4 万亿卢布的预算，占了 GDP 的 10%，4 月份，他又进一步增加了政府的开支，宣布在未来的两年中将医疗保健开支提高到 160 亿美元。这项开销将通过增加工资税中医疗保险税的比重，即由 3.1% 上升到 5.1% 来解决。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项动议对经济复苏构成威胁。库德林表示“很失望”，希望重新考虑这个方案。^②

普京认识到存在这个问题，但他争辩说，大量的社会开支对于防止出现希腊那样的动荡是必要的。可是从长远来看，他同意有必要削减开支。至此我们将离开财政层面，转回到俄罗斯经济所迫切需要的现代化问题上去。

（三）现代化

在强大的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中，曾经集中了俄罗斯巨大的智力资源。但是，令人震惊的是，当前的俄罗斯在全球高技术市场上仅占 0.25% 左右的份额，^③ 而 2007 年俄罗斯获得的专利数量只有邻国芬兰的四分之一。^④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库珀（Julian Cooper）赫然宣布，“很明显，俄罗斯的处境极其虚弱，尤其是在诸如电子、计算机、电信和医药等高科技领域尤其如此。”^⑤

历届俄罗斯政府是如何使得该国过去的高超技术随着其有形的基础设施而败坏下去的呢？也许在所有显示这一过程的指标中，技术创新是最令人沮丧的。这同金砖四国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经济中不断增加的技术复杂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① <http://en.rian.ru/business/20100422/158706236.html>.

② <http://www.sptimes.ru/story/31273>.

③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04004,00.html#ixzz0ms4mAddZ>.

④ Pekka Sutela, “Economic Growth Remains Surprisingly High”,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2008, no.38, p.5.

⑤ 这个列表还可以更长些。在民用航空领域，俄罗斯落后于巴西，在汽车制造业，又落后于土耳其、巴西和印度。俄罗斯仍然具有竞争力的部门在于能源密集型产业、核反应堆和宽轨车厢以及未经加工的原材料业，前者以国内能源低价为基础，后者则要拜苏联所赐。Cooper, Julian M., “Can Russia Compete in the Global Economy?”,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6, vol.47, no4.

印度发展为全球IT产业的发动机房,中国也正在从低成本消费品的制造者大踏步走上挺进全球高技术市场的道路,而俄罗斯却越来越依赖原材料出口,越来越无力在高技术和知识密集的经济中维持其存在。最近世界银行专家的一个论文集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悲观的估计。^①

扭转俄罗斯经济航船的方向不但需要用令人炫目的数十亿投资来衡量,而且即使这些投资的确能够到位,政府也仍然要处理制度缺陷方面过多的问题,如贫乏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几何级数增长的腐败,以及令人汗颜的高等教育和研究能力。

毋庸置疑,俄罗斯政府已经接收到了这个信息。在一篇发表于2009年9月的被广泛引用的题为“前进,俄罗斯!”的文章里,梅德韦杰夫总统直面挑战:“是否一个以原材料为基础的原始经济和瘟疫般流行的腐败将伴随着我们走向未来?”为了阐明他的现代化计划,他谈到了“对原材料令人羞耻的依赖”,谈到了“在俄罗斯生产的制成品竞争力极低,是件令人烦恼的事情”,并认为需要扑灭“贿赂、偷盗、智力和精神上的懒散以及酗酒等问题”。^②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一项创立俄罗斯版硅谷的计划出台了。这艘俄罗斯高技术领域中的“旗舰”座落于莫斯科地区的斯科尔科沃(Skolkovo)镇,尽管这一计划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但若指望它成为基础广泛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推动力量,对其潜能还是要谨慎看待的。

许多感到悲观的很基本的理由来自如下事实:若想成功实现雄心勃勃的计划,将俄罗斯转变成一个现代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家,需要大量增加固定资本投资的水平。由于政府显然并不想承担这个责任,于是我们或者使用外国直接投资,或者俄罗斯公司投资,但两者都无法产生很大的信心。

就外国直接投资(FDI)而言,我们不仅要注意那些规模相对小,但波动幅度大的资本流动,也必须考虑“借贷套利”等,即资本流动的巨大份额是由离开和返回俄罗斯的资本构成的,仅仅在一些外国账户上短暂停留,这样做的原因或是逃税,或是洗钱和其它十足的犯罪行为。如果排除这些冒牌的资本流动,那么资本流动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额就会减少。^③这样做的重要意义在于,“真正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应当包括严肃的现代化过程所需的技术和管理技能。

① Raj M Desai, Itzhak Goldberg (eds.), *Can Russia Compet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2008.

② http://eng.kremlin.ru/speeches/2009/09/10/1534_type104017_221527.shtml.

③ 请注意,根据“绕道资金”的规模,塞浦路斯快要成为俄罗斯经济最重要的外国投资者了。主要属于政治性质的事件也会使市场受牵连。据报道,2007年上半年,购买了尤先科财产的 Rosneft 和 Gazprom 分别获得了 251 亿和 58 亿美元。Tabata, Shinichiro, “The Influence of High Oil Prices on the Russian Economy: A Comparison with Saudi Arabia”,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9, vol.50, no.1, p.90, fn.29, 2007 年大部分流入资本也可以由 Gazprom Netherlands 投资购买壳牌在萨哈林的财产解释。

为了放松一下，我们转向俄罗斯公司投资的问题。也许我们会注意到，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公司债务正以实际上超过主权债务跌落的速度上升，这意味着 2008 年俄罗斯的债务实际上比 1999 年多。^① 按照我们所知道的俄罗斯银行破产程序，如果外资银行选择拖欠公司债务几乎没有什么风险，而俄罗斯公司却必须面对严厉支付明细，那么任何形式的扩张性投资计划都没有什么回旋空间。

然而，严肃地推行现代化遇到的最重要的障碍是当前备受欢迎的“威权主义现代化”呼声。在这种口号的背后我们也许会看到一个现实，即谋求变革的力量很可能是同一制度的密友，他们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在普京打击叶利钦时代寡头势力的时候悄悄地得到了权势。我们即将看到的可能不是一个向着现代全球一体化经济转型的俄罗斯，而是一个同样深受腐败影响的、由同样一伙能源利益集团操控的依赖碳氢化合物价格的经济模式。^②

下文我们将讨论即将到来的 2012 年总统选举问题。正如上文所述，由于对削减社会开支的阻挠，控制预算赤字对于总统大选的准备期会很重要。展望 2012 年以后的情景，我们不禁也会问道，领导权的变化能否真正对俄罗斯未来的发展路径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总统第一任期内，梅德韦杰夫将严厉打击腐败和推进现代化作为自己的使命，这些能成为再次参选前获得公众关注的理由吗？

四、普京、梅德韦杰夫以及后来者

除了俄罗斯经济对碳氢化合物和原材料出口的严重依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之外，任何对俄罗斯经济未来前景的讨论必须考虑 2012 年梅德韦杰夫第一个总统任期届满时的政治接续问题。虽然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一搭一档”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好得多，但这只不过是个过渡阶段。到 2012 年，俄罗斯将面临一次真正重要的选举，这可能会决定未来的发展路径。

这并不意味着未来将由俄罗斯的选民们来决定。俄罗斯的权力政治仍然深深扎根于斯大林的经典表述：重要的不是人民如何投票，而是如何计算这些选票。2008 年 3 月的“选举”把梅德韦杰夫带进了克里姆林宫，其最为引人注目的特征是没有任何一张海报宣布究竟是谁在竞选。

① 1999 年底，俄罗斯外债总额达到 1782 亿美元，而到 2009 年底则增加到 4697 亿美元。在国家干预的 10 年间里，政府总债务由 1332 亿美元减少到 300 亿美元，少于 GDP 的 2%。同时，银行和公司的共同债务由 292 亿美元增加到 4250 亿美元。

② 最近的一件事情增加了俄罗斯的麻烦。美国发现了以低价大量提取页岩天然气的技术。这使得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大量出口由美国转向欧洲，而在欧洲，Gazprom 也面临着市场和价格的萎缩。如果波兰成功地开采了它的资源储备，就会由一个主要消费国变成欧盟内的净出口国。

梅德韦杰夫总统的问题在于，尽管他在民意测验中的确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普京指定其为继任者才是其合法性的唯一真正的来源。当他的任期度过一半时，莫斯科就充斥着各种噤噤喳喳的小道消息，揣测着他是否最终会走出前者的阴影，在阳光下证明自己的地位。这些谣言来自对两人分歧加大的推测，更来自双方人马日渐增长的斗争，都希望自己的老板能成为唯一的赢家。

在某些问题上，梅德韦杰夫的人马在投机中收获喜人，如攻击了内务部这个普京一方重要的权力部门，但双方的斗争是有严格的底线的，即双方不可一决雌雄，甚至也不能为竞选总统而互相攻击。两个阵营都清楚，这个过程很容易升级并脱离控制，而一旦如此则事关重大。这样问题就变成了普京将如何看待自己的前途。目前存在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他决定重返克里姆林宫。除非梅德韦杰夫阵营在近期内成功地找到充分的理由让他弃权，否则普京获胜就毫无悬念。而且，由于新宪法修正案将总统任期从 4 年延长到了 6 年，这意味着普京在 2024 年之前将会一直呆在克里姆林宫。到那时，普京也许会成为俄罗斯真正的沙皇，而且是终身沙皇。

这将是普京全部合法性的彻底失败。普京曾拒绝参与任何使其留在克里姆林宫的策划，拒绝担任非法的第三任期总统，因为他已经将个人的威望与支持宪法联系在了一起。如果他决定走回头路，即便是合法的，那也将清晰地表明，他已经无法确保这样一个政治体制，既能让他安全抽身，又不会将其亲手缔造的大厦置于危险之下。

第二种可能性是他仍然坐在总理的位子上，让梅德韦杰夫赢得第二个总统任期，这可能会长达 6 年之久。由于普京的“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牢固地控制着俄罗斯议会，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理由认为会出现对其政府首脑地位的威胁。

可能出现的问题在于，第二个任期的梅德韦杰夫将靠自己成为总统，依靠自己的才能而不是普京的任命赢得大选。这种合法性的根本转变必然会打破权势的平衡和两大阵营间的有效权力分配。由于梅德韦杰夫阵营的人将开始蚕食对手的地盘，普京作为大老板的权力将会削弱，最终使他暴露在严厉的攻击之下。

第三种可能性是普京决定退出历史舞台。由于他在就任总统时曾公开并颇为令人信服地感慨“象船奴一样地工作”，因此，为自己阵营成员赢得更长的时间来形成竞争或表达不满也不是个可行的办法。这样，以政治元老的身份退休，享受积累获得的果实就是非常重要的了。

对这种可能性不能太当真。理由是俄罗斯没有“政治元老”(senior statesmanship)的传统。戈尔巴乔夫是个非常的特例，因为国家是在他手上垮掉的，而当叶利钦离开克里姆林宫时戈尔巴乔夫已经病重，不再被视为任何威胁。“梅普组合”的首要逻辑

辑在于，普京丝毫不惧怕其继任者。根据叶利钦向普京移交权力时形成的防止迫害的模式，普京也谨慎地确保后继者会同样尊重这一模式。

与叶利钦相比，普京仍是个年轻人。他不但有理由关心自己的名誉和运气，而且也关心自己的安全，因为他可能会被看作是一个威胁。没有理由指望他会采取一项行动，把自己暴露在因权力和影响力消失而产生的危险面前。很有可能大选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由梅德韦杰夫继续担任总统，普京在幕后得到一个有实权的新职位，比如担任联邦委员会的主席。这仍有待观察，也许从长远来看，这对俄罗斯并非特别重要。

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权势和制度惯性，在观察“梅普组合”中两人间的差异时我们需要审慎对待。

当叶利钦 1996 年竞选连任时，他的失败将意味着共产党重新掌权，经济政策也很有可能出现巨大的反转。普京接任叶利钦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阵营内的安排，而普京再把权力交付给梅德韦杰夫则更是如此。2012 年他们两人不论谁竞选总统，我们都应当把这件事看作是正常的。

对 2012 年以后俄罗斯经济的展望需要假定绝大多数基本变量都保持不变。我们将会看到一个仍然拒绝接受责任的政府，它在执行合同和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不能成为不偏不倚的第三方，而保护合同和知识产权恰恰是建设市场经济的基础。根据上文所述，由于需要固定资产投资，需要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我们将会看到一个仍然缺少竞争力且严重依赖商品出口的国家经济。

所有这一切都与如下图景高度契合，即这个国家的能源综合体正在投下赌注，布下棋局，通过建设能源超级大国谋求俄罗斯的再度强大。能否出现真正的超级大国有赖于其定义和人们的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仍将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人质，所有相关方面对价格变动都十分脆弱，在能源和与能源相关的部门之外，无力推进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全球化。与金砖四国其他成员相比，这个前景并不乐观，至少对俄罗斯的绝大多数人口来说不乐观。在有关自己国家发展的问题上，俄罗斯的普罗大众们再一次没有了说话的机会。

（王铁军 译）

【Abstract】 The economic recovery under Putin improved both the fiscal situation and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in Russia, but it did not help Russian economy to achieve a successful transition.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as exposed the nature of Russia's economic situation: Russia's economy under Putin is only kind of "recovery growth"

highly dependent on resources, rather than sustainable growth driven by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Although Russian economy has recovered after the crisis mainly because of rising energy prices but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for its modernization. Russia after 2012 will still be a country lacking competitiveness and greatly dependent on energy resources exports.

【Key Words】 Financial Crisis, Resource Dependence, Fiscal Policy, Modernizat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экономики при Путине улучшило как финансов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в стране, так и повысило уровень жизни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но это не помогло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 провести успешный переход. Мировой финансовый кризис выявил характе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при Пути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из себя лишь своего рода «восстановительный рост», сильно зависящий от ресурсов, а не устойчивый рост, обусловленный притоком инвестиций и инновациями. Хотя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восстанавливается после кризиса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за счёт роста цен на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и, однако ей предстоит ещё долгий путь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После 2012 г.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будет страной с недостатком конкурент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и страной, сильно зависимой от экспорта энергоресурсов.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ризис,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от ресурсов, фиск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责任编辑 肖辉忠)

前行中的困顿：京都时代与后京都时代的俄罗斯气候环境外交*

孙超**

【内容提要】2010年底的坎昆会议见证了气候谈判的紧张程度，各国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艰难地达成了两项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推动气候谈判进程继续向前。京都议定书的第一阶段即将结束，未来的环境合作如何进行，仍旧是一个变数。作为气候环境领域的一个参与者，俄罗斯的作用不可低估。但是，俄罗斯的气候环境外交却显示出矛盾的特色，这不仅表现在签署京都议定书的立场上前后变化较大，而且表现在俄罗斯政府对温室气体减排的态度上。从京都时代和后京都时代的转型过程看，俄罗斯气候环境外交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断裂与延续”，即断裂的立场和连续的利益战略，国内国际的分离与一致，单边与多边的断裂与全球领导的一致性。这些因素长期影响着俄罗斯气候环境外交的思维，并呈现出前行中困顿的状态。

【关键词】气候变化 俄罗斯 环境外交 断裂 连续

【中图分类号】D83/87.0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0)06-0089-(14)

导 言

随着极端天气的不断发生、气象灾难的频繁出现，世界各国普遍感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压力。气候变化成为各国必须考虑的全球问题。为了应对这种气候变化，早在1992年，各国政府就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12月12日，各国制定了更加细化并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承诺——《京都议定书》，确立了“共同但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前景研究”（项目编号：08BGJ003）的阶段性成果。

** 孙超，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有区别”的减排原则，规定了发达国家在 2008 年到 2012 年必须完成的减排的目标，同时确立了实现减排的三大机制，即：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机制。随着 2012 年的临近，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协议将很快到期。各国必须在《京都议定书》到期之前作出下一步的减排安排，而 2012 年也被视为“后京都时代”的起点。

自京都时代以来，气候变暖造成的自然变化，各国应对所带来的国内政治社会生态的变化，以及国际关系从双边走向多边领域的趋势越来越强，后京都时代的特征开始显现雏形。饱受叶利钦时期转型阵痛的俄罗斯在普京两任总统任期内实现了经济上的快速复苏，满以为可以成为金融危机风暴中“平静港湾”的俄罗斯最终未能独善其身，再次陷入经济发展的低潮。哥本哈根会议也在此刻遭遇到挫折，希望之都并没有出现一个给人带来希望的协议。2010 年 11 月 29 日到 12 月 11 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6 次缔约方会议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人们期待经历过夏季热浪和莫斯科大火的“北极熊”能够发挥实质性作用。不出所料，在 12 月 2 日，俄罗斯官员表示希望可以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继续使用该国在第一承诺期尚未用完的“排放权”。^①这就意味着俄罗斯并不打算像日本一样不承诺在《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达成任何减排目标。但是随着会议的进行，俄罗斯代表在会上并没有发挥“实质性作用”，相反却在 12 月 10 日的会议上表示“履行《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既不科学、经济，在政治上也没有价值”。^②俄罗斯代表团并没有在此次会议上发挥出预期的作用，其态度呈现出前后矛盾的特点。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事实上，这与俄罗斯的气候环境外交的特质息息相关。

因此，认识俄罗斯的气候环境外交对认识俄罗斯的环境外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俄罗斯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这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得出俄罗斯气候环境外交呈现出“断裂与延续”特征的结论。

一、气候变化下的“国家安全”：俄罗斯的理解

关于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气候有没有变化？其次，气候变化了，它能够影响到国家安全吗？最后一点是，如果它真的影响到了国家安全，那么它的影响程度如何？对这三个问题的认识是各国

① 赵建华：“坎昆会议：俄罗斯要求延续未使用的‘排放权’”，http://news.xinhuanet.com/2010-12/03/c_12845225.htm。

② Suzanne Goldenberg, “Cancú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Russia will not renew Kyoto protocol”, Dec10th, 2010. available at:<http://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10/dec/10/cancun-climate-change-conference-kyoto>.

开展环境外交的基础，各国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不同看法都将导致外交行动的巨大差异。

俄罗斯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是随着苏联解体和俄罗斯国家建设的进程而变化的。1991年苏联解体后不过半年，俄罗斯就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莫斯科在此刻并没有将气候变化的认识提升到战略高度，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考虑，即积极融入国际社会。随着俄罗斯的实力下滑和经济不断发生波动，叶利钦时代对“气候变化”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多边合作的一个领域。俄罗斯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是私有化发展以及更多的国外投资者寻求投资所在地对环境的要求的结果。^①因此，这种认知环境影响了俄国人自己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在京都时代，“气候怀疑主义”在俄罗斯民众甚至部分精英中都很有市场。^②即便在2005年，俄罗斯政府还并不认同当前的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的工业化活动有关，认为这需要更多的科学证明。^③在2009年11月，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一台播放了名为《历史的欺骗：全球变暖》的纪录片，阐述了一种“阴谋论”，即媒体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将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④在斯德哥尔摩会议召开之前，俄罗斯自然科学院海洋学院的教授们出版了一份报告，认为气候变化不是人为的而是自然的结果。^⑤俄罗斯民众也只有40%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与土耳其的70%形成鲜明的对比。^⑥媒体的宣传、学者的分歧以及民众的漠不关心，成为莫斯科在气候变化的议题上行动比较消极的重要因素。

将气候变化提升到国家安全高度的理念最早始于美国。^⑦早在2003年1月，美国国防部向当时的小布什政府提交了一份名为《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的秘密报告。^⑧这份报告论述了气候突变将导致能源紧张并引发新一轮的国际竞争。而在中国，2004年环保界著名人士曲格平先生在《关注中国生态安全》

① Charles Kolstad/Alexander Golub,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Policy Brief*, NO.2, July 1993.

② Anders Åslund/Sergei Guriev/Andrew Kuchins, *Russia After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0, Edward Brothers, Inc, Washington, DC, p. 136.

③ Constantin Holzer (周游): “试析影响俄罗斯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因素”, 《社会科学辑刊》, 2010年第2期, 第96页。

④ Anders Åslund/Sergei Guriev/Andrew Kuchins, *Russia After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p. 136.

⑤ Dr. Oleg Sorokhtin, “A cold spell soon to replace global warming”, 13:54 03/01/2008, available at : <http://en.rian.ru/analysis/20080103/94768732.html>.

⑥ World Bank, *Russian Economic Report* 19,23. See Anders Åslund/Sergei Guriev/Andrew Kuchins, *Russia After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p.136.

⑦ 关于美国的“关于气候变化与国际安全的研究”的精彩论述见马建英：“美国气候变化研究述评”，《美国研究》，2010年第1期，第116-130页。

⑧ Peter Schwartz and Doug Randall, “An Abrupt Climate Change Scenario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2003, available at:http://www.edf.org/documents/3566_AbruptClimateChange.pdf.

的报告中，和 2005 年解振华在《国家环境安全战略报告》中，也都提出要将气候变化与环境安全相联系。^①而直到 2007 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才开始关注气候变化，并将其与国家安全相联系。^②与中美不同的是，俄罗斯政府虽然早在 1999 年公布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中就将环境作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提了出来，但是俄罗斯所理解的“环境安全”范围非常宽泛，它主要涉及的是国内环境保护，而非战略上的考虑。^③2002 年 1 月 10 日，俄罗斯公布实施《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2003 年俄又改进了环境保护，实施环境资源的使用法规，形成了俄罗斯的环境保护执行与监察制度，但是这种预防性措施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政府已经从主观上认识到环境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威胁。^④在签订《京都议定书》的 2005 年，俄罗斯官方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总体上说，主要还是出于政治因素和外交因素的考虑签订了这份协议。^⑤在 2006 至 2009 年间，俄罗斯颁布了《关于建立一个俄罗斯的评估人类温室气体排放的标准》、《关于俄罗斯评估人类温室气体排放的标准的确认》等文件，但政府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并没有太大改变。

2009 年是俄罗斯形成独具特色的政策体系的一年，也是俄罗斯政府对气候变化的认识转变的关键一年。2009 年 5 月，俄政府发布了气候构想（Climate Doctrine），认为“气候变化是长期影响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它在国内和国际维度上都具有政策制订的优先权。”^⑥这从政治上和法律上承认了“气候变化影响国家安全”。如此一来，俄罗斯官方的立场立刻变得坚定起来。2009 年 6 月，在一次关于气候议定书的辩论会上，俄罗斯自然资源部部长尤里·特鲁特列夫（Yuri Trutnev）表

① 见曲格平：《关注中国生态安全》，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 年；解振华主编：《国家环境安全战略报告》，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 年。

② 代表性的文章有王缉思：“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国际战略研究》，2007 年第 4 期，第 2 页。张海滨：“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安全”，《国际政治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12-39 页；张海滨：“气候变化正在塑造 21 世纪国际政治”，《外交评论》，2009 年第 6 期，第 5-12 页；张海滨：“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安全”，《绿叶》，2010 年第 3 期，第 13-22 页。代表性著作张海滨：《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安全》，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 年。

③ 丛鹏：《大国安全观比较》，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 年，第 115 页。

④ Sapozhnikova/Dr Victori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Russia: The Evolution From Strict Enforcement measures and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control to new combined approaches based upon preventive strategies”, 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同时参见王前军：“转型俄罗斯的环境安全政策”，《俄罗斯研究》，2005 年第 2 期。

⑤ Barbara Buchner/Silvia Dall’Olio, “Russia: The long road to ratification, Internal Institution and Pressure Groups in the Kyoto Protocol’s Adoption Process”. *Fondazione Eni Enrico Mattei*, December 2004, Climate Change Modelling and Policy.

⑥ Climate Doctrin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kremlin.ru/eng/>, December 17, 2009, Unofficial translation.

示，高效地执行议定书中的内容对国家的经济有好处。^①他表示，未察觉到的气候变化可能造成俄罗斯GDP2—5%的下滑；到2050年，极端气候将会给俄罗斯带来600亿卢布的损失。^②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此后多次表示要重视这份文件，将其变为“活生生的文件(living document)”而不是视为脱离现实的“圣牛(sacred cow)”仅用于顶礼膜拜。^③俄罗斯领导人已经充分意识到了“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并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了这种认识，这为俄罗斯的环境外交构建了一个良好的前提。但是，这种意识是由何种因素产生的，还需要认真探讨。

俄罗斯官方的表态似乎给出了一个信号，即俄已完全领略到极端天气带来的灾难。但是，这种态度却与俄罗斯的外交行动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张力。这就让人产生疑惑：俄罗斯是否真的认识到了气候变化给俄罗斯带来的影响？虽然政府官员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学者们给出不少有力的证据：2009年冬季莫斯科气温较以往明显升高就可以说明气候变化的确发生了；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近一百年来温度上升了3摄氏度，1996年到2008年每年因为气候变化损失300—600亿卢布；如果继续下去，2041年到2060年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冰冻期将会缩短15—30天。^④世界银行表示，俄罗斯将会面临“经济和社会困境”，直接面对的就是更多的洪水、大风、热浪、森林火灾与冻土层的融化。^⑤另外，俄罗斯93%的天然气和75%的原油的开采设施建设在冻土之上，这将会给俄罗斯的经济带来不可估量的破坏性影响。^⑥这些理由可以充分解释为什么俄罗斯政府开始认真考虑气候变暖问题。

二、转型时代俄罗斯气候环境外交的分析框架

从京都时代到后京都时代，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一步一步地凸显出来，世界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进入了转型时代，不同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分歧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种特点可以用两个维度来分析，即南北维度和义

① Anna Korppoo, “The Russian debate on climate doctrine”, emerging issues on the road to Copenhagen, 5th June 2009, Briefing Paper No.33, p.3.

② Ibid.

③ Anders Åslund/Sergei Guriev/Andrew Kuchins, *Russia After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p. 126.

④ Dinara Gershinkova, “Climate policy and measure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Kyoto’ and ‘post-Kyoto’ periods”, *2010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iigata*, ppt.3-6.

⑤ See World Bank, *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 i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Washington, June, 2009), www.worldbank.org and “Russia Needs to Act Swiftly to Reduce Vulnerability to Its Changing Climate”, in *Russian Economic Report*, No.19(Washington: World Bank, June 2009), www.worldbank.org, pp.22-28.

⑥ Anders Åslund/Sergei Guriev/Andrew Kuchins, *Russia After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p. 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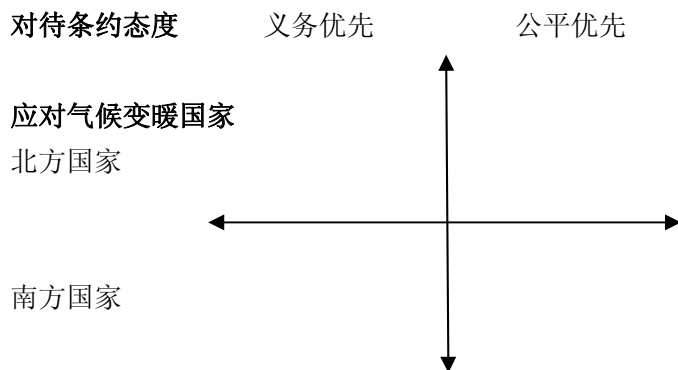
务/公平维度。^①从南北的角度来看，由于在历史上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曾经是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因此，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求发达国家主动承担气候变暖的责任，另一方面则要求它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清洁能源发展援助基金和技术设备。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是金砖四国。发达国家通常被指责为一种虚伪的“道德主义者”，正如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所说：

穷人不需要怜悯。当富人砍伐他们自己的森林，建造他们自己的污染工厂，为了寻找能源而破坏世界的时候，穷人并没有说什么。他们为他们自己的富裕付出应有的代价。现在富人说他们有权利管理穷国的经济发展并挑衅穷国说其改变贫困的这种努力是粗暴可耻的。作为殖民地，我们受到了剥削，现在作为独立的国家，我们同样被剥削。^②

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义务/公平维度，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歧最大的地方。发达国家强调“共同承担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公平”，要求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种因素被认为是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原因，正如美国总统布什在2001年所说：

我不会接受一个损害我们国家的经济和伤害工人的计划。^③

正是这一矛盾使得双方产生不信任感，才使得京都时代的天空阴沉沉的，而斯德哥尔摩会议没有达成应有的框架实质上也是两大集团并没有相互妥协的结果。根据以上的维度，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分析框架：



图一 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的分析框架

① The idea came from Penehuro Fatu Lefalle, “Beyond Science: Climate Change as a Perfect Political Dilemma”, *Political Science*, June 2008, Vol.60, NO.1,p.9.

② M. B. Mohamad, Malaysia’s closing statement to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UNCED), Rio de Janeiro, 13 June 1992,cited from Penehuro Fatu Lefalle, “Beyond Science: Climate Change as a Perfect Political Dilemma”, p.9.

③ Bush firm over Kyoto stance, from CNN, March29, 2001. http://articles.cnn.com/2001-03-29/us/schroeder.bush_1_kyoto-agreement-carbon-dioxide-emissions-climate-meeting?_s=PM:US.

用这幅图我们可以将参加京都议定书的国家放在这四个维度，并清晰判断它们的立场。但对于俄罗斯来说，其立场似乎具有非常矛盾的特色：

第一，俄罗斯的国力决定了俄难以承担与发达国家类似的减排义务。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以后，经济大幅度下滑，国家实力萎缩不少。虽然俄罗斯是 G8 成员国，但是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并不允许俄罗斯承担像欧盟一样能够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持的重要角色；同时俄罗斯本身也不能被归类为南方国家，而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艰难转型的北方大国。

第二，俄罗斯承诺减排但在处理《京都议定书》上奉行实用主义的灵活态度。2009 年，与苏联时代相比，俄罗斯的温室气体排放仅占基准线的 60%。^①40%温室气体排放操作空间给了俄罗斯的环境外交很大的伸缩性。这就难怪俄罗斯政府在确定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时多次更改。例如，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梅德韦杰夫宣称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较 1990 年减少了 20 - 25%。而在 2010 年 1 月，俄罗斯提交的报告有所倒退，将其减排量定为 15 - 25%。^② 因此，义务与公平的分歧在俄罗斯看来不再是争吵的对象，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提升国际形象和拓展大国战略的筹码。

此外，转型时代的国际气候合作呈现多样化的特点。而这些多样化的本质在于国家利益。美国学者德特勒夫·斯普林茨 (Detlef Sprinz) 和塔帕尼·瓦托伦塔 (Tapani Vaahtoranta) 提出了“以利益为基础”的分析框架。^③这个框架将国家在国际谈判中的表现分为四类，即推动者、拖后腿者、旁观者和中间者。如果一个国家受环境影响很大，付出的成本很高，那么其参与度就越高。^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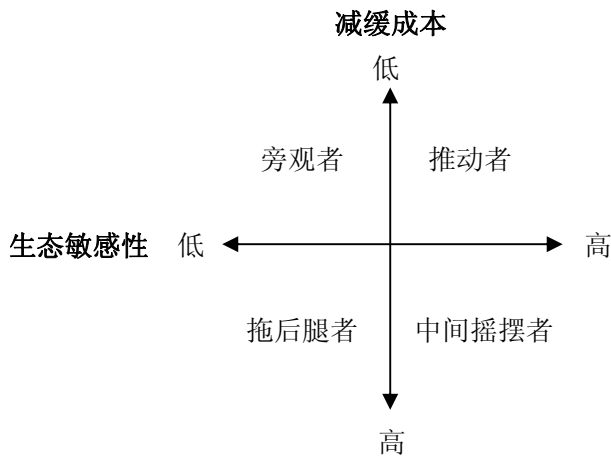
① Samuel Charap and Georgiv V. Safonv, *Climate Change and Role of Energy Efficiency*,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ww.piie.com, p.131.

② See UNFCCC, *Quantified Economy-Wide Emissions Targets for 2020 for Annex I Parties*, <http://unfccc.int>.

③ Detlef Sprinz/Tapani Vaahtoranta, “The International Based Explana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Internatonal Organization*, Winter1994, Vol. 48, NO.1, p.81.

④ Detlef Sprinz/Tapani Vaahtoranta, “The International Based Explana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p.80.

上述内容用图表示如下：



图二 对国际环境机制不同态度的国家分类^①

用这个框架分析我们发现，俄罗斯的生态敏感性比较高，俄罗斯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比较大。但是在减缓成本方面，俄罗斯对此的认知决定俄罗斯未来在环境合作中的作用。但是这种浮动性也是造成俄罗斯在国际环境问题上地位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俄罗斯既可以成为中间摇摆者，也可以成为推动者。例如在 2003 年，普京就认为，“对像俄罗斯这样一个北方国家，气候再暖和点也不可怕”，“我们会在毛衣的购买上花费更少，我们的谷物产量将会提高”。^② 普京认为，俄罗斯在减排上的努力不仅没有给俄罗斯带来收益，而且代价非常高昂，所以俄罗斯的立场摇摆不定。但是，在权衡了巨大的碳排放收入和求得欧盟同意俄罗斯加入 WTO 等利益之后，俄罗斯又认为加入京都议定书对俄罗斯是有益处的，成本相对较小。2004 年 11 月 5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使其正式成为俄罗斯的法律文本。2005 年 2 月的《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可见，没有俄罗斯的积极推动，气候协议是很难达成的。

虽然气候变化的危害性正在迅速凸现，但是世界各国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行动却仍处在转型期。京都时代和后京都时代这一区间集中了大批要求实现不同利益的

^① 关于此幅图可以参见：“Figure1: Classification of a country’s support f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ited from Detlef Sprinz & Tapani Vaahtoranta, “The International Based Explana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p.81.

^② Quoted in Maria Antonova, “World Bank Warns on Climate Change”, *MoscowTimes*, October 29, 2009.

国家。凑巧的是，俄罗斯的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以及外交变革和对气候变化的处理位于同一个转型期。正是这种双重性使俄罗斯在处理气候变化问题上呈现出许多不同于各大国的特征。也正是这种转型期特点使得俄罗斯在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时呈现出复杂多变、不易理解的特点，这些特点承继了俄罗斯对气候变化认知的变迁，承继了从京都时代到后京都时代的转型期背景，同时也承继了俄罗斯国家转型所显现出来的一系列特色。

三、断裂与延续：俄罗斯的气候环境外交的特点

俄罗斯的气候环境外交，自苏联解体以后就开始发挥作用。但是，气候环境外交是否具备其实质特征，这还是有疑问的。国内学者对于气候环境外交的作用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①就俄罗斯而言，气候环境外交的核心作用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而这种变化也展现出了俄罗斯气候环境外交的一系列的特点。正是对气候环境外交的本质作用的理解和认识不同，加上处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的外交特征，以及其对气候变化认识的独特性，在各国从京都时代走向后京都时代都紧抓本国利益的时，俄罗斯的气候环境外交展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便是很自然的了。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断裂和延续”两个层面上，并呈现出三种主要特征。

（一）立场的断裂与连续的利益战略

俄罗斯气候环境外交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务实的风格。这种务实的风格太过真实，以至于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没有一贯的“气候环境外交”战略。事实上，俄罗斯在“气候环境外交”上的立场与其认识“环境的重要性”息息相关。而这种认识并不是一种线性进步的模式，也就是说，俄罗斯对环境本身的认识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深化，走向环境保护主义。这种认识是以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和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为前提的。因此，表面立场上的前后不一致并没有改变俄罗斯的利益战略，这种深层次的利益链条并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褪色。

所以在京都时代，俄罗斯能否加入《京都议定书》这一国际机制的关键并不在

^① 关于环境外交定义，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存在两方面的理解：第一种理解是比较宽泛的理解，即将气候环境外交主要界定为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合作与交流，主要代表人物是丁金光：“中国环境外交的开端：成就与问题”，《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5月；丁金光：《国际环境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二种理解比较严格，将环境外交主要理解为利用环境保护问题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或者其他战略意图，主要代表人物为张海滨：“气候变化正在塑造21世纪的国际政治”，《外交评论》，2009年第6期；“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安全”，《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4期；《环境与国际关系：全球环境问题的理性思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安全》，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

于环境问题在俄罗斯内部有多么重要，以及事实上科学研究证明气候变暖将给俄罗斯带来多大的灾难，而在于国际社会有没有给俄罗斯足够的利益刺激。正如 2002 年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贸易副部长穆哈迈德·齐卡诺夫 (Mukhamed Tsikanov) 所抱怨的，其他国家并没有给俄罗斯足够的激励让俄罗斯加入《京都议定书》。在这之前，普京总统早已承诺俄罗斯将在 2002 年批准《京都议定书》。^①当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京都体系的成败最终依靠于俄罗斯的决定”的时候，俄罗斯的态度就会发生转变。^②西方国家认为前苏联地区俄罗斯是唯一能够起到号召作用的国家，其政治影响力可以让更多的国家批准《京都议定书》。^③而俄罗斯的政治筹码则在于以下几大维度的考量^④：

第一，经济维度：其中包含四个方面，即气候变化的成本、减排政策包括碳交易所带来的收益，与其他国家利益相比的得失核算以及共同执行机制中的经济损失。

第二，国内政治维度：提高俄罗斯的环保水平，具体落实贯彻俄国的环保法，在环保主义者和贫困人群之间实现平衡。

第三，国家形象维度：包括参与减排机制获得的大国尊重，积极参与者形象的构建以及对俄罗斯森林在吸收二氧化碳方面的巨大成就的自豪感。

第四，国际关系维度：获得欧盟在加入 WTO 问题上的支持、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等。

事实上，正是这种根本的国家利益所在，才使得俄罗斯在气候变化上灵活多变，由于其受到减排的压力影响最小，所以俄罗斯的态度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点。

（二）国际国内的分离与一致

在俄罗斯“气候环境外交”的理解视域中，环境和外交始终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中国学者喜欢将环境与外交结合起来理解，似乎外交与环境本身呈现正相关的关系。环境外交恶化了，那么环境保护方面就受到打击，反之也是一样。^⑤俄罗斯的理解维度恰恰是将二者分离开来理解的。在俄罗斯人看来，气候环境外交事实上更多地是强调“外交”层面，而“环境保护”层面则是作为国内问题来处理的。这种断裂的

① Muscle-flexing over Kyoto, EIU ViewsWire Eastern Europe, Eastern Europe, *Country Monitor* July 21st 2003, p10.

② Ibid.

③ Jared C. Carboney/ Carsten Helms /Thomas F. Rutherford, “The Case for 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e in the Absence of Cooperative Climate Policy”, February 11 2009, Running Title: The Case for 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e.

④ Anna Korppoo, “The Russian debate on climate doctrine”, p.3.

⑤ 这种思维方式主要见于将环境与国家安全结合在一起来的文章之中，见张海滨：“论中国环境外交的实践及其作用”，《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8 年第 3 期；郭秀清：“新世纪中国环境外交的历史重任”，《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 年第 4 期。

出现是俄罗斯转型时期历史变迁的反映，同时也是俄罗斯人对“气候变化”不同理解的反映。这种断裂造成两个层次的影响：第一个层次的影响是，气候环境外交并不积极。俄罗斯似乎并没有看到自己在环境外交中得天独厚的地位——当各国在碳排放量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之时，俄罗斯却可以超然独立。这种外交优势在《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签订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发挥出来，这似乎与俄罗斯关注的重心有关。虽然在批准《京都议定书》的问题上俄罗斯重新拥有这种优势地位，但是在2005—2009年，俄罗斯政府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开展“气候环境外交”的战略机遇期，而是在国内展开关于《京都议定书》的执行方面的立法。尽管在2009年，俄罗斯有所行动，但是在随之而来的哥本哈根会议上，梅德韦杰夫的没有雄心的减排计划还是反映了俄罗斯在环境外交上的消极作用。^①俄罗斯民众受到经济转型时的巨大打击，在与气候变暖的抗争中总是将“贡献（contribution）”理解为“牺牲（sacrifice）”，并害怕进一步受到伤害。这种心态也影响了俄罗斯的环境外交。^②第二个层次的影响则是俄罗斯的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缓慢。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给俄罗斯留下了严重的大气污染和放射性污染，以及高度依赖能源的军工企业和采掘业等重工业。^③俄罗斯的石油污染、大气污染和放射性污染与核废料、能源消耗等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而《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在2002年1月才出台，这本身反映了俄罗斯对环境保护的不敏感，以及与国际上要求大力保护环境的“京都时代”相脱节。

尽管，这种国际国内的分裂影响了俄罗斯的战略机遇，但事实上二者具有深刻的同根性。这就是它们都产生于俄罗斯的经济低落时代。自休克疗法以来，俄罗斯在转型中面临巨大的阻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根深蒂固，主权重塑以及军事工业体比重过大等因素影响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使俄罗斯在10年之中在气候环境外交领域无所作为。^④正是这种落后的遗产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负担，使其无力思考和处理国际社会和自身的环境问题，更难谈及气候环境外交。

（三）多边舞台上的“单边行动”——莫斯科的“领导”适应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面临着巨大的“外交”困局。俄罗斯为了获得西方的支持，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叶利钦在国际舞台上一味追随美国，一厢情愿

① Samuel Charap and Georgiv V. Safonv, *Climate Change and Role of Energy Efficiency*,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ww.piie.com, p.134.

② Samuel Charap's interview with Arkady Dvorkovich, economic adviser to the president of Russia, October 2009. See Anders Åslund/Sergei Guriev/Andrew Kuchins, *Russia After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p. 146.

③ Russia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ttp://www.eia.doe.gov/emeu/cabs/russenv.html>, 柴德坤编译：“俄罗斯的环境污染问题”，《西伯利亚研究》，2009年第六期，第82页。

④ 参见徐坡岭：“中东欧与俄罗斯经济转型十年：对比与借鉴”，《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1期，第22-29页。

要与美国建立同盟关系。^①但事实上，这种急于求成的外交政策只能带来消极后果。很快，俄国与西方的分歧渐大，俄罗斯开始放弃一味的亲西方，寻求自主的发展道路。在气候环境外交方面，俄罗斯也在摸索着前进。虽然，俄罗斯在经历了十年转型之痛后才开始真正面对世界，但是，十年间受到的西方的伤害让俄罗斯政府和民众深有感触。因此，在气候环境外交上，俄罗斯倾向于单边行动。

俄罗斯的气候环境外交的“单边行动”发生的场景却是在多边舞台之上，发生在世界各国都开始关注气候变化这个大背景之下。因此，虽然俄罗斯在全球变暖中受到的威胁很大，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俄罗斯始终愿意自己在环境保护方面采取行动。莫斯科在构建国际环境体系中总是处于消极地位。在莫斯科眼中，似乎只有南北双方对此事最关心，二者在实力较量之后，俄罗斯可以帮忙，也可以不帮忙；它既可以帮助一方，也可以帮助另一方。俄罗斯对这件事的态度影响了莫斯科作为大国的力量。在多边合作中的单边立场并不能保证俄罗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获得真正的“独立”，反而使俄罗斯的外交陷入更为困顿的局面之中。这是与俄罗斯传统外交的“大国”意识相违背的，也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

尽管俄罗斯的全球战略要求重塑莫斯科的世界领导地位，但是气候环境外交上俄罗斯的作为并不能展示出它的外交风采。这种断裂并不是一种长期的状态，是一种深层的外交困顿在“环境”层面上的反映。俄罗斯还不善于处理多边外交关系，特别是在需要全球合作的问题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俄罗斯的外交力量的逐渐成长，俄罗斯最终会逐步融入整个世界，开始适应规则，用多边思维考虑全球问题。从 2005 年到 2010 年，普京、梅德韦杰夫等在环境立法和加入气候协定方面、以及在减排温室气体的承诺方面所释放的信号，展示出俄罗斯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外交思维，适应新形势下的全球环境。^②

四、结 论

2010 年的坎昆会议上，俄罗斯再次展现了其气候环境外交中“断裂与延续”的特点。如上文所说，在谈判初期和末期，俄罗斯的立场似乎转了 180 度——从温和的支持立场突变为强硬的要挟立场。但是这种立场变化并没有让俄罗斯陷入像日本那样的尴尬之中，相反，各国领导人一致希望俄罗斯在气候环境合作中发挥大国作

① 李兴：“苏东剧变后美俄关系纵论”，《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 年第 3 期，第 61 页。

② 关于俄罗斯喜爱单边行动的讨论可见：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of America, “Russia: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to 2030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CENTRA Technology, Inc. and Scitor Corporation.关于俄罗斯全球领导的讨论可见：Bremen Russia’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search Centre for East European Studies”,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18 June 2009, NO.62.

用。作为极具潜质的领导者，俄罗斯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况且，根据世界银行所给出的数据，俄罗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所受到的打击较大，经济复苏前景并不乐观。^①所以，在这种经济状况下，俄罗斯陷入较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似乎需要《京都议定书》继续实施，在后京都时代享受碳交易所带来的经济实惠，并将自身的优势转化为与欧盟进行谈判所需的筹码；另一方面，庞大的石油工业和天然气工业体系需要越来越多的消费，以便为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充沛的资本，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俄罗斯对《京都议定书》的强制实施产生忧虑。这种尴尬的状况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在次贷危机之后的缓慢复苏、以及俄罗斯国家领导人的更新换代，更增强了俄罗斯在此问题上的变数。俄罗斯的森林大火和莫斯科的热浪也让莫斯科的领导人深思气候环境的严重性。而这种左右为难的困顿使俄罗斯在气候环境外交中难以发挥实质性的作用，担当领导角色。同时，这种困顿也会持续影响俄罗斯的气候环境外交。

【Abstract】 The Cancun Conference witnessed the strained atmosphere of the climate negotiations at the end of 2010.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reached two resolutions on climate change to continue the climate negotiation although they had their own interests in mind. The first phase of the 1997 Kyoto Protocol will end and how to carry out the further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s difficult to pin down. Russia is an important actor in this issue. But the climate diplomacy of Russia turned out to be a paradox. It can be seen the great change in the position of signing the Kyoto Protocol and the attitud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the reduction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of the time which came from the Kyoto Period to the Post-Kyoto Period, the features of climate diploma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an be summed up as “break and continuation”, that is that different positions in the different time with consistent national strategy, that interests which are different in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nation have the identical content and that unilateral actions are existing on multilateral occasions with looking for leadership in this aspect. These elements affect the idea of Russian climate diplomacy and let Russia be in a hard condition in the process of seeking leadership in this aspect.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Russia; environment diplomacy; break; continuation

^① See Zeljko Bogetic, World Bank, Russian Economic Report 19, from crisis to recovery—policies matter.

【Аннотация】 Канкун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 конце 2010 г. стала свидетелем уровня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в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по климату, все страны, заботясь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о своих собственных интересах, с трудом достигли две резолюции по вопросам изменения климата для содействия продвижению вперед процесса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о климату. Первая фаза Киотского протокола подходит к концу, а будущее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о-прежнему остаётся переменной. Роль России, как участника процесса в области климата и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не следует недооценивать. Однако климатиче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России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ми,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 колоссальных изменениях до и после подписания Киотского протокола, но 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и к выбросам парниковых газов.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от эпохи Киото к пост-Киотской эпох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климатиче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России можно обобщить в двух словах — «прерывание и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её стратегия прерывающихся позиций и непрерыв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внутри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разделение и общность, прерывания в односторонней и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ей политике и единство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лидерства. Эти факторы влияют на долгосрочную идею климатиче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России и указывают на трудности в достижении лидерства в этой сфер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изменения климата, Россия, климатиче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прерывание, продолжение

(责任编辑 常喆)

历史·文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俄官方和民间 在华出版报刊的历史考察与简要评析*

赵永华**

【内容提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皇俄国在华出版的报刊，依主办者的身份大体可以分为官办、民办两类。在官办报刊中，多数是俄文报刊，也有部分中文报纸，二者都直接或间接地为沙俄侵华的整体利益服务。同期的民办报刊，受到沙俄严格的新闻控制。沙俄在华办报活动时间不长，总量也不多，但对中国新闻业的发展，特别是在东北地区，有着较大的推动作用。沙俄的报刊结束了我国东北无报刊的历史，对东北报业后来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沙皇俄国 在华报刊 官办 民办 影响

【中图分类号】K512.46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0)06-0103-(14)

纵观近代外国人在华办报的历史，最早的是葡文，势力最大的是英文，数量最多的则是日文^①。沙皇俄国既没有像英美那样占尽先机，在报业发达的香港、上海等城市创办众多英文报刊，带动中国报业的发展；也没有像日本那样凭借军事上的力量，以数量和气势取胜，为本国对华侵略呐喊。沙俄在华办报虽晚于欧美主要国家，但是却独具特色，极大地丰富了“在华外报”^②的内容。“外人在华办报”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其中的沙俄报刊则是该课题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 感谢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对本研究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 赵永华，新闻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副教授。

① 此种观点最早见于戈公振（1890-1936）的著作《中国报学史》（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被认为是中国新闻史学的奠基之作），后人沿袭了这种说法。参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81页。

② 指近代外国人在中国出版的报刊，既包括外国人办的外文报刊，也包括外国人办的中文报刊。

一、沙俄在华出版俄文报刊的历史背景与总体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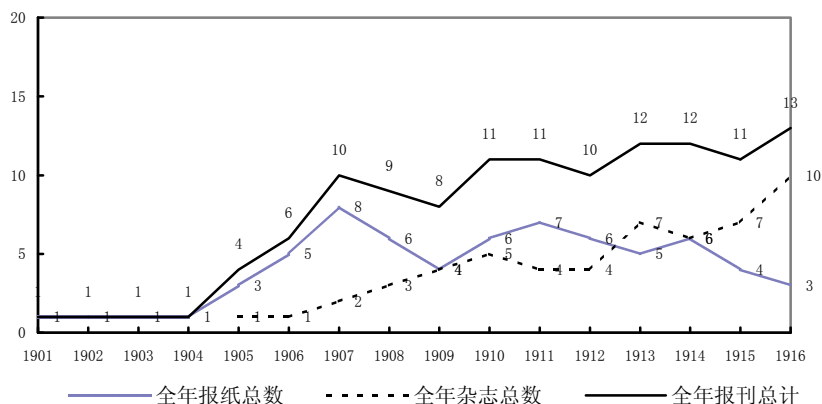
俄国人在华办报活动始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中，外文报刊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侨居在中国的外国人。尤其是在华出版的俄文报刊，因受语言的限制，其读者受众主要是俄国人。也有部分俄国人办的中文报刊，是面向中国读者的。十月革命前，在华的俄国人大多集中在哈尔滨和中东铁路沿线，少量人口居住在京津地区。在汉口和天津虽然设有俄租界（注：分别设于 1896 年和 1900 年），但是除了沙俄官方人员，普通俄国居民仍然很少。而在素有“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俄国人在当时也寥寥无几。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大批普通俄国人来到中国东北，这与中东铁路的修建直接有关。自中东铁路 1898 年开工以后，各行各业的俄国人抵达中东铁路沿线，其中有筑路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其家属，还有资本家、工厂主、商人、手工业者，以及文化娱乐行业人员、医生、律师等。至 1903 年 7 月 14 日中东铁路全线通车时，黑龙江地区的俄国人总数已达 3 万人以上^①，在铁路沿线形成了大批俄国人的聚居区。其中，俄国人最多的城市是哈尔滨^②。俄国人在中东铁路附属地积极投资办厂，从事商业活动。为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他们开办了一些学校，还办起了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培养铁路技术人员和其他专门人才。俄国人聚居区形成之后，无论是官方管理机构，还是民间社会组织以及普通的俄国人，自然产生了获知信息和传播信息的需求，报刊这种旨在沟通信息的大众媒介便应运而生。同时，报刊的舆论控制功能和思想宣传功能也在这里得到了凸显（详见下文）。

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的枢纽，是沙皇俄国侵华的据点，与俄国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有着直接的铁路联系，这一便利通道为俄文报刊从俄国国内向哈尔滨延伸提供了有利条件。哈尔滨是这一时期俄国官方和民间在我国的新闻出版中心，哈尔滨的俄文报刊状况基本上反映了沙俄在华出版俄文报刊的总体发展情况。本文利用一组关于 1901-1916 年哈尔滨俄文报刊的出版数据，结合当时的中、俄时局，来分析说明沙俄在华出版俄文报刊的变化趋势。1901-1916 年哈尔滨俄文报刊的出版情况，如下图所示：

① 李兴耕等著：《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年，第 10 页。

② 1903 年 5 月 15 日，中东铁路工程局首次在哈尔滨进行户口登记。据调查，中国人 28338 人、俄国人 15579 人、日本人 462 人，其他 200 人。参见李述笑编著：《哈尔滨历史编年（1763-1949）》，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0 年，第 19-20 页。



数据来源：Тюнин М.С. Указатель периодических и повременных изданий, выходящих в г. Харбине на русском и др.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языках по 1-е января 1927 года. Харбин, 1927.

哈尔滨有俄文报刊的时间始于1901年。从上图可以看出，1905年以后哈尔滨的俄文报刊开始增多，从1907年到1916年发展稳定，变化幅度不是太大。

1901-1902年，哈尔滨只有一份民办的俄文报纸^①，该报停刊后的1903-1904年，中东铁路管理局出版了一份俄文机关报^②。相比之下，俄国人在哈尔滨的俄文报业远远落后于俄国国内。究其原因，是哈尔滨俄文报刊的稳定读者群还没有形成，此时在哈尔滨的俄国人主要还是铁路施工人员和士兵，还不是稳定的居民。

1905-1907年是沙俄在华俄文报刊急剧发展的时期，其中既有技术方面的原因，也有时事政治方面的原因。这很符合大众传媒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新闻媒体的演进对传播技术有很大的依赖性，新闻与政治之间有很强的互动关系。1904年，中东铁路印刷所从德国购进了多台铅印机和铸字机，从此在哈尔滨开始了铅印报刊的时代。另外，哈尔滨在日俄战争中成为俄军的后方基地，俄国人数陡然增至十几万。人口的大量集中、时局的变幻动荡，加剧了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在哈尔滨出现了创办俄文报刊的小高潮。此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俄国国内1905年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在俄国历史上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俄国在中国领土上打输了日俄战争，在华势力受到重挫；在俄国国内，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内外时局的变化引起了远在中国东北的俄国人开始对发表言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纷纷创办报刊，客观上推动了在华俄文新闻业的发展。另外，日俄战争失败后，沙俄势力退到北满，原来在南满的俄文报刊随之迁往哈尔

① 该报名称是《哈尔滨每日电讯广告报》（«Харбинский Листок Ежедневных Телеграмм и Объявлений»）。

② 该报名称是《哈尔滨新闻》（«Харбинский Вестник»）。

滨。因此，从 1905 年到 1907 年，哈尔滨俄文报刊增幅较大。

1907-1916 年是沙俄在华俄文报刊的稳步发展期，每年出版的俄文报刊大约在 10 家左右。在报纸与杂志的对比关系中，1913 年以前，报纸的种类一直多于杂志，但是，报纸的寿命往往很短，创刊多，停刊也多。相比而言，杂志的状况则稳定得多。从 1913 年起，杂志的数量开始多于报纸。到 1916 年时，在哈尔滨的杂志达到 10 家，而报纸就只剩下了三家^①。在俄国新闻史的早期发展阶段，有办杂志的传统，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杂志在数量上多于报纸，在影响上大于报纸，在业务上优于报纸。俄国新闻业的这种历史传统在哈尔滨的俄文报刊中也有所体现。

1917 年以前，俄国人在华累计出版了约 40 种俄文报纸与杂志^②，这些俄文报刊除了少数几家外，一般旋起旋灭，刊行时间都不太长。沙俄在中国的办报活动起步较晚，持续的时间也相当短，前后不过 20 年左右，但其发生、发展和衰退的演化历程以及对东北新闻业的影响，有许多值得发掘和探讨之处。本文从沙俄官办和民办报刊两个角度加以具体介绍和评析。

二、沙俄在华的官办报刊

（一）官办俄文报刊

中东铁路的修建和俄国太平洋舰队旅顺基地的建成，直接促成了沙俄在华报刊的出现。自 1898 年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枢纽开始修建后，哈尔滨逐步由分散的村落变成了初具规模的国际商埠。^③中东铁路全线通车时，哈尔滨迅速发展成为俄国人在华活动的中心。此后，随着沙俄在我国东北势力的扩大和权利的巩固，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铁路沿线地区俨然成了“国中之国”。在此背景下，由沙俄官方出版的俄文报刊逐步发展起来。沙俄官方在华经营俄文报刊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加强舆论控制与疏导，二是向俄国人提供新闻信息。当时沙俄在我国东北的殖民机构是中东铁路管理局，俄文报刊的出版工作主要是由它操办的。下文具体以几家报刊的创办和变迁为例进行分析。

《新边疆报》

沙俄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份俄文报纸是 1899 年 8 月在旅顺创办的《新边疆报》（«Новый Край»），它同时也是我国东北的第一家报纸，在中国新闻史上有着重要的

① 分别是《哈尔滨新闻》（«Харбинский Вестник»）、《生活新闻报》（«Новости Жизни»）、《哈尔滨交易所商业通报》（«Торгов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Харбинской Биржи»）。

② 根据目录索引资料 Тюнин М.С. Указ. соч.统计得出。

③ Райан Н. В. Уникаль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диаспоры Маньчжурии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X века. //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за рубежом. 2002. No.2.С.77-80.

地位。《新边疆报》的创办与俄国侵华的历史密切相关。1897年，德国因山东教案强行租借胶州湾，俄国借机派太平洋舰队占领旅顺、大连。1898年，中俄签订《旅顺大连租地条约》，租期25年。沙俄军队在旅顺登陆后，把“旅大租地”擅自扩大到整个辽东半岛。1899年，沙俄政府将辽东租借地改名为“关东省”，并按西伯利亚的制度设总督实行治理，以旅顺为首府。1899年8月，《新边疆报》在旅顺创刊。俄文报名中的“край”一词的意思是“边疆区”，专指沙俄地方行政区。把报纸命名为“新边疆”暗示创办人已经把上述地区看作是沙俄领土的一部分了，该报的名称反映出沙俄企图将东北三省变为“黄色俄罗斯”的野心。《新边疆报》的主编是彼得·亚历山大·阿尔捷米耶夫(П. А. Артемьев)。此人是俄国太平洋舰队中的一名中校。《新边疆报》为周三刊，期发1200份，主要刊载总督府及各官署的命令、告示与法规等，以及报道本地与“邻国”的新闻。《新边疆报》是沙俄在华利益的积极代表者，在经费上得到了沙俄政府的大力支持，每年从沙俄陆军部和海军部领取5000卢布的办报经费。^①《新边疆报》的记者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Дмитрий Янчевецкий)^②曾对八国联军的侵略活动进行了系列报道，大力宣传俄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为俄国在战后谋得更多利益做舆论上的准备。扬契维茨基的正式职业是旅顺普希金俄华中学的教师，兼任《新边疆报》主编的助手，他将这份周三刊的定期小报扩大为六栏，使其成为远东的“俄国利益的当之无愧的表达者”。^③1900年5月22日晨，扬契维茨基在旅顺口搭乘水雷巡洋舰赶到大沽，次日从俄国舰队旗舰上发出了第一篇通讯。他是第一个到达事发现场的外国记者。直到7月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占领天津并开始向北京外围防线突进时，才约有30名外国记者来到天津。^④在战争后期，扬契维茨基还报道过李鸿章、八国联军将领的联席会议以及中东铁路的修建等重要人物和事件。^⑤《新边疆报》作为一家媒体机构，还履行着文化传播的职能。日俄战争爆发前夕，在旅顺和大连的俄国军人和普通俄国人总共约6万。^⑥为长期在此居留，

① 《新边疆报》的创刊时间、地点、主办人、报纸内容与期发量等，均据黑龙江省档案馆藏《阿历克塞耶夫上奏书》。转引自黑龙江日报社新闻志编辑室编著：《东北新闻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②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扬契维茨基是第一位来华从事涉华报道的俄国新闻记者。

③ 扬契维茨基：《八国联军目击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1页。《八国联军目击记》一书的原名是《在停滞的中国的城墙下》(«У стен недвижимого Китая»), 1903年由阿尔捷米耶夫在旅顺—圣彼得堡出版。俄文全书618页，印刷精美，印有100幅肖像、260幅照片、7幅画。参见赵永华：《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史(1898-1956)》，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2页插图。

④ 张功臣：《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61-62页。

⑤ 同上，第64页。

⑥ Пайчадзе С.А. 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 в странах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5. С. 88.

他们投入了很大力量来改善当地的市政基础设施，创办企业、学校、医疗机构，组织体育俱乐部、文化教育小组、红十字会等，^①使旅顺的俄国文化氛围逐渐形成。《新边疆报》对俄国人的各种社会需求与文化创举进行了及时的报道，为发展当地的俄罗斯文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新边疆报》在旅顺还以同样的名称创办了在中国的第一家俄文书店和图书馆，开启了在华俄人报社“报馆、书店、图书馆”三位一体的经营模式，这种模式在后来俄侨创办的众多俄文报刊中得到了普遍应用。^②《新边疆报》还有自己的印刷厂，承印各种图书，仅在 1903 年一年内就出版了 7 种，^③这个数字在 20 世纪初已经不算少了。《新边疆报》印刷厂印制的图书甚至在圣彼得堡的书店也有销售。《新边疆报》在旅顺持续发行到 1904 年底。日俄战争打响后，《新边疆报》陷入困境。1904 年 10 月初，日军第二次攻打旅顺时，有一发炮弹摧毁了《新边疆报》的印刷厂，该报被迫停刊。1905 年，日俄战争结束，战败的俄国把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新边疆报》于 1905 年 11 月迁到哈尔滨出版，改为日报。1912 年 10 月，《新边疆报》终刊。^④

《哈尔滨新闻》

沙俄在哈尔滨出版的第一家官方报纸是《哈尔滨新闻》（«Харбинский Вестник»）。该报社会影响力大，刊行十余年。1903 年中东铁路竣工前夕，中东铁路管理局于 6 月 23 日创办了这份俄文报纸，第一任主编是中东铁路管理局商务处的主任拉扎列夫（К. П. Лазарев）。《哈尔滨新闻》初期主要刊登政府法令、东省铁路管理局的各种文件和时事新闻。《哈尔滨新闻》是一份纯官方报纸，办报方向保守。就其内容而言，最有趣味性和可读性的是商业栏目和官方通告，对政治题材和社会问题的剖析力度较弱。它以官方出版物特有的观点看待问题，体现着政府的意志。1905 年 11 月 27 日，中东铁路的俄国工人火烧管理局大楼，该报编辑部一同被烧。经中东铁路管理局批准，《哈尔滨新闻》脱离商务处，成为中东铁路管理局在哈尔滨的正式机关报，^⑤变成了沙俄推行远东扩张政策的重要舆论工具。1917 年 12 月上旬，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按照列宁的电令成立临时军事委员会，开始夺权。他们控制了

① Пайчадзе С.А. 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 в странах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5 .С. 88.

② 近代俄罗斯人在华办报活动持续 50 余年，报刊数量多达 500 余家。总地来看，俄人在华报刊可以分为三类：沙俄报刊、苏联报刊、俄侨报刊，其中俄侨报刊占绝大多数。十月革命后，约有 25 万俄国人逃亡到中国，侨居在哈尔滨、上海、天津等城市，他们创办了大量俄文报刊。此时，来自俄国的职业新闻工作者是办报的主体，他们更懂得办报的规律，注重报业的经营。一些成功的报刊所采用的即是“报馆、书店、图书馆”三位一体的经营模式，具有代表性的是拥有哈尔滨《霞光报》、《上海柴拉报》、天津《俄文霞报》和几家杂志社的连比奇《柴拉》报系。参见《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史（1898-1956）》。

③ Пайчадзе С.А. Указ. соч. С. 89.

④ Тюнин М.С. Указ. соч. С. 13.

⑤ Тюнин М.С. Указ. соч. С. 17.

《哈尔滨新闻》，更名为《铁路员工报》（«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ик»）继续出版。12月底，起义俄军在东北地方当局和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Д. Л. Хорват, 1859—1937）的合力镇压下，被押送出境。霍尔瓦特重新掌控了《铁路员工报》，并于1918年1月1日更名为《满洲新闻》（«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ии»）再度出版。这家报纸顽固地反对布尔什维克，成为在哈尔滨以霍尔瓦特为首的白俄分子的机关报。霍尔瓦特建立的白俄政权^①的文告，多由该报公布，该报极力呼吁国际列强出兵干涉苏维埃俄国。1920年3月，东省铁路全线大罢工，中国开始收回铁路主权。3月11日，《满洲新闻》停刊。

其他一些报刊

俄国边防部队外阿穆尔独立军区司令部于1905年1月创办《外阿穆尔人休闲》（«Досуги Заамурца»）杂志，以普通军官和士兵为读者对象。该杂志是每周一期的画刊，1912年4月终刊。1906年，俄国满洲部队后方司令部创办《军事生活报》（«Военная Жизнь»），发行不久即停刊。1908年，在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的策划下，哈尔滨的俄国人不顾中国人民和清政府的强烈反对，成立了哈尔滨市自治公议会，控制了哈尔滨市的市政管理、商业贸易、城市建设、文教卫生等各项行政权力。同年10月22日，自治公议会创办《哈尔滨市公议会公报》（«Известия Харби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刊行至1922年，随自治公议会的取消而停刊。^②

（二）官办中文报刊

从19世纪下半叶起，随着清政府的衰落，沙俄不断侵略中国。沙俄的侵华目标很实际，主要是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中国的大片领土和通商贸易权。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俄逐渐意识到精神文化侵略的重要性，遂创办中文报刊以期影响中国社会舆论。

开始的时候，俄国兴办中文报刊主要是适应对日舆论斗争的需要。为了争夺在东北的利益，日俄之间的战争迟早要爆发。当时新闻界关注的焦点就是这场战争到底何时在何地爆发。为了封锁消息，日俄双方都采用了“禁约新闻”的办法，在官方宣布之前严禁新闻媒体自由传播。特别是沙俄方面，东三省的电信局都在它的控制之下，实行着极其严格的电报检查。^③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际，沙俄政府首先利用“华俄道胜银行”的资金，在北

① 1918年7月9日，霍尔瓦特在格罗捷阔沃（Гродеково）宣布成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临时摄政王，后与海参崴政权合并。参见石方：《哈尔滨俄侨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4页。

② 《哈尔滨俄侨史》，第168—170页。

③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7页。

京创办了中文《燕都报》，以与日本的《顺天时报》对抗。未几，因处境困难而停刊。同年，沙俄在东北军事重镇旅顺出版了中文《关东报》，在东北政治中心奉天出版了中文《盛京报》。^①《关东报》和《盛京报》的出版时间都很短，日俄战争后，随着俄国势力退出南满而终刊。

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把哈尔滨作为侵华活动和向远东扩张的据点。中东铁路管理局于1906年3月14日在哈尔滨创办了中文《远东报》，作为经略远东的宣传阵地。《远东报》每日对开8版，不久增至三大张12版，版面编排仿效上海的《申报》与《时报》，要闻版也首载清廷“上谕”，除了报头三字的俄文译名（ЮАНЬ-ДУНЬ-БАО）和俄历年月日外，俨然是一家国人报纸。中文《远东报》为中东铁路管理局所办，实质上是俄国官方的政府机关报，受到中东铁路的大力资助。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公司每年拨款17万卢布给该报，^②在如此丰厚的资助下《远东报》无须为报社的财务问题分神，一心专注于报纸的编务。

《远东报》的社长是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史弼臣（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Спицын）^③。他还主编过《盛京报》，后来成为有名的俄国中国学家。他发表在俄国国内报刊上的关于远东问题的言论，曾引起斯托雷平（Пё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的注意，召他回俄国面谈远东问题，并要他研究制订满洲经济纲领。^④史弼臣受到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的赏识，主持《远东报》报务，既管理报馆的经营，又亲自采写新闻。《远东报》成为沙俄在东北的一个主要喉舌，史弼臣功不可没。

《远东报》以重金聘任华人为主笔，首任主笔是顾植。继任主笔连梦青撰写批评清政府和地方官员的文章，发表在《远东报》上，引起中国读者的不满。1910-1911年，哈尔滨的爱国报纸《东陲公报》在揭露俄国的侵华活动时，与《远东报》展开了激烈的论战。^⑤连梦青充当沙俄打手，参与扼杀国人报纸《东陲公报》，从而遭到一片唾骂。1920年3月，中国开始收回中东铁路主权，1921年3月1日，《远东报》奉命停刊。

《燕都报》（北京）、《关东报》（旅顺）、《盛京报》（沈阳）、《远东报》（哈尔滨）是沙皇俄国的御用舆论工具，为其侵略活动辩护。它们创办的目的是为了更直接地

①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13页。

② 同上。

③ 1898年，俄国创办海参崴俄国东方学院，专门培养通晓中、日、满、蒙文字的人才，史弼臣是该学院的高才生，专攻中国—满洲专业。他毕业后来到中国东北，成为中东铁路管理局的顾问。

④ Амир Хисамутдинов, Общество русских ориенталистов в Харбине// Восток. 1999. №3. С. 105.

⑤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813页。

在中国人民当中进行欺骗性和麻醉性的宣传，以消灭中国人民的爱国心和革命性。^①

三、在华民办报刊

民办俄文报刊不同于沙俄官方媒体，它们不是俄国政府的传声筒，不以国家利益为准则，只服务于个人或某团体的利益，反映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在 20 世纪初，俄国国内实行着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这种新闻控制在沙俄殖民统治下的中东铁路沿线地区，尤其是哈尔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民营报刊危害到沙皇统治秩序时，就要受到逮捕、罚款、查封等制裁。大多数在华出版的民营俄文报刊寿命都不长。从 1905 年到 1914 年，俄国人在哈尔滨总共创办了 20 种日报^②，它们大多数只出版了几期就停刊了。也有一些民办报刊采取灵活的策略，避免涉及政治问题，或者寻求政治庇护，其生存的时间相对较长。随着俄国国内局势的变化以及沙俄在华势力的衰退，其对在华民办报刊的检查与影响也逐渐减弱，也使得一些民间报刊得以维持生存。

罗文斯基(П. В. Ровенский)于 1901 年 8 月 14 日创办俄文日报《哈尔滨每日电讯广告报》(«Харбинский Листок Ежедневных Телеграмм и Объявлений»), 它同时也是黑龙江省的第一家报纸。罗文斯基曾是俄国西伯利亚地区的著名报人，思想比较激进，后来成为俄国社会革命党在哈尔滨地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哈尔滨每日电讯广告报》没有雄厚的资金基础，影响不大。加上言论激进，发行不久即受到沙皇势力的密切关注，最终于 1902 年 5 月 23 日被沙俄当局查封。1905 年俄国革命运动高涨之时，罗文斯基的《哈尔滨每日电讯广告报》于当年 5 月复刊，政治言论较前更加活跃、鲜明。该报因批判沙皇，于同年 11 月 28 日(俄历)再度被勒令停刊。12 月 17 日，该报更名为《满洲报》(«Маньчжурия»)重新出版，但仅出版了 5 期就被查封。1906 年 2 月，该报再次更名为《青年俄罗斯报》(«Молодая Россия»)继续出版。同年 4 月，被彻底取缔，罗文斯基被捕，以“侵害国家罪”受审，判处数年苦役。^③

罗文斯基曾经尝试开办一家图书贸易公司，以便宣传社会革命党的思想。罗文斯基被捕后，书店由其姐罗莎·罗文斯卡娅(Роза Ровенская)掌管。1907 年 2 月，俄国社会革命党在哈尔滨成立了支部组织。罗文斯基的原住处和书店成为该党的秘密据点。1907 年底和 1908 年初，该支部先后出版了《革命思想报》(«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Мысль»)和《黎明报》(«Рассвет»)。

两报皆以中下层俄国居民和铁路工人为对象，

①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39 页。

② Великая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империя: к десятилетнему юбилею. Харбин, 1942. С. 346.

③ Тюнин М.С. Указ. соч. С. 19.

经常刊登有关俄国国内工人运动的消息，发表理论文章鼓动工农推翻沙皇统治。1908年6月，俄国社会革命党在哈尔滨的组织被破坏，罗莎·罗文斯卡娅遭逮捕，被判处三年监禁。

为响应俄国国内的革命形势，哈尔滨的俄国工人于1905年11月掀起了反对沙皇宣言^①的罢工，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工人团，创办俄文《新生活》（«Новая Жизнь»）周报。罢工工人5次火烧中东铁路管理局大楼，设在楼内的《哈尔滨新闻》亦被烧。罢工被镇压后，《新生活》周报很快消失。

虽然沙俄官方机构对民办俄文报刊实行严厉的新闻控制，但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不涉及政治问题，这些报刊就能够比较平静地发展。1908年12月19日创刊的《远东铁路生活》周刊（«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ая Жизнь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就是一例。《远东铁路生活》第一期副标题上标明“无党派周刊”，从第二期开始“无党派”的字样被取消。但是，它仍然还是一家没有明显党派倾向的杂志，调子谨慎。该杂志内容丰富，经常刊载一些篇幅不长的小文章，谈论经济问题、铁路客货运输问题，以及世界各国的与铁路行业相关的消息，此外还设专栏报道哈尔滨当地的生活和事件，刊载历史题材的文章，以及大量的广告、小品文、幽默故事等。该杂志还常讨论文学问题，设有专栏《给读者的建议》，并刊登各个图书馆的藏书情况和铁路工人的阅读兴趣。^②《远东铁路生活》于1917年停刊，远离政治是该周刊能发行较长时间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哈尔滨的出版环境下，寻求官方庇护则是民办俄文报刊的另一生存之道。1908年6月21日，由侨居哈尔滨的俄国中国学家发起成立了哈尔滨俄国东方学家协会（Общество русских ориенталистов）。当时有会员66人，他们大多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和海参崴东方学院。^③为了获得经济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庇护，该协会会员的名单中几乎囊括了俄国在华的所有军政要员和各界头面人物。该协会曾先后聘俄国驻北京公使科罗斯托维茨（Иван Яковлевич Коростовец, 1862-1933）和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为名誉主席。^④俄国东方学家协会出版会刊《亚细亚时报》（«Вестник Азии»，又译作《亚洲通报》）^⑤，主编是多布罗洛夫斯基（И. А.

① 指1905年10月17日（俄历）公布的《十月十七日宣言》。

② Усов Н. А. К истории журнала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ая жизнь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ая жизнь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913. No.7. С. 1-6.

③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Русская печать в Китае// Мир библиографии. 2002. No.4.С.21.

④ 《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第364页。

⑤ 与此同时，俄国东方学家协会在汉口俄租界设立有分会，由索福克洛夫（Г. А. Софоклов）主持，有会员十人。1909年出版了小型周报《扬子江·中国报刊评论》（«Долина Ян-цзы. Обзор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прессы»），主要译介中国报刊上的内容，该报一年后停刊。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俄苏中国学手册》（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08页。

Доброловский)^①。《亚细亚时报》是学术类期刊，以研究东方为目的，大量刊载有关中国的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各个方面。^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东方学家协会的一部分成员参加了军队，还有一些人放弃了东方学研究，《亚细亚时报》随之每况愈下。^③

最终，沙俄官方对民办俄文报刊的新闻控制随着沙俄侵华势力的衰落而减弱。1907年创刊的俄文《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ь»）（1914年以后改名为《生活新闻报》（«Новости Жизни»）是1917年以前在华办报规模最大的私营俄文报纸，由于消息灵通，经营有方，技术条件上乘，主张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受到读者欢迎。该报立场中间偏右，常抨击俄国政府。俄国二月革命后，《生活新闻报》极力支持铁路工人和士兵的宣传活动，降低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威信。面对这样一份反叛的报纸，乱局之下中东路方面已无力应对。^④

1917年沙皇统治被推翻后，沙俄官方在华出版的报刊相继停办，有些民办报刊却生存下来，日后成为“在华俄侨”办报活动的一部分。

四、沙俄在华办报对中国新闻业的影响

中国的近代报刊最初是一种舶来品，是近代以来中国从西方引入的众多文明事物之一。西方国家早在17世纪初就有了报刊。在随后的两百年间，这种大众传播媒介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全球扩张逐渐从欧洲信息高地扩散到世界各地。中国是报刊传入较晚的国家，直到19世纪初才有了近代化报刊的出现。中国新闻史上的众多“第一”都与外人、外报有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他们揭开了中国新闻史的序幕，并贯穿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始终。“外人在华办报”现象直到1949年以后才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综观外人在华办报现象，总的来说，这是近代中国百年屈辱在新闻业中的反映，是由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这些国家在华的势力范围往往就是他们集中办报的地方。沙皇俄国的在华报刊多半在东北出版，就因为这里是沙俄的传统势力范围。在特定的历史情景下，报纸的第一功能——信息

① 多布罗洛夫斯基曾在海参崴东方学院学习汉语和满语，大学毕业后来到了哈尔滨，与史弼臣一起从事在华中文报刊的出版工作，曾任中文《远东报》的副主编。他在中国人当中的知名度很高。参见 Хисамутдинов А.А.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и Южной Америке.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Изд.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ун.-т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00. С. 60.

② 林军：“帝俄在哈尔滨的东方学家协会”，《北方文物》，1987年第1期。

③ 《亚细亚时报》1928年终刊。参见 Скачков П. 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 С. 280-281.

④ 该报在1929年被中国地方当局查封。

传播让位给了它的政治功能，客观性减弱，而功利性增强。近代西方国家在华的报刊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充当了殖民者的舆论工具，维护着本国的国家利益。可以说，沙皇俄国官方的在华办报活动充满了殖民色彩，最初来华办报的俄国人不是形单影只的穿着长袍的传教士^①，而是带着枪炮蜂拥而至的俄国兵。

沙皇俄国与我国毗邻，比英美等国更早地开始了对华侵略。但是，由于俄国新闻业相较西欧国家起步略晚^②，水平稍逊，因而没有较早地在华办报^③。直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新闻业已经逐渐地与欧美国家比肩了^④。正是在这个阶段，俄国报业跟随着沙俄侵华的步伐，把触角伸向中国，开始在华办报了，并且占据了东北新闻史上的若干“第一”。

沙俄在华办报的历史肇始于 1898 年，1917 年以前累计出版中、俄文报刊 40 余家。是他们打破了东北地区多数人“不知报纸为何物”的封闭状态，成为近代东北新闻业的嚆矢，客观上推动了东北新闻业的发展。俄文《新边疆报》是近代东北第一报；《哈尔滨每日电讯广告报》是黑龙江的第一张近代化报纸；1904 年，沙俄在旅顺创办的中文《关东报》、在沈阳创办的中文《盛京报》，则是东北地区出版得最早的一批中文报纸。而中国人自己在东北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报纸《东三省公报》的创刊时间是在 1905 年底，晚于上述各报。

沙俄在华报刊对落后的东北新闻业具有推动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是有意识的，也不是直接施加的，而是一种间接的推动。哈尔滨以至黑龙江省国人自办的中文报刊乃是为抵制沙俄报刊而诞生的。沙俄在东北开展办报活动之前，国人在关内的近代化报刊已存在了多年^⑤，但是东北报人却一直缺少办报的动力。正是沙俄报刊的兴起，迫使他们起而创办报刊，与之抗衡，俄文报刊从反方向对国人办报起了催生的作用。

在沙俄报刊数量最多的城市哈尔滨，国人开始办中文报纸的动机就是“拒俄”。

① 中国近代新闻业起源于英国传教士的办报宣教活动。实际上，俄国传教士的到来比他们要早一百多年。但是，俄国传教士无意在中国布道，早期也没有开展任何办报活动。俄国传教士对古老东方的文化情有独钟，他们着眼于历史文化研究，促进中俄文化交流。

② 1703 年彼得大帝下令在莫斯科创办《新闻报》，这是俄国的第一张报纸，彼得大帝本人曾参与报纸的编辑工作，这是俄国报业的开端，比 1609 年在德国诞生的世界上最早的每周定期报刊大约晚了一个世纪。

③ 先后在中国办报的国家有葡、英、美、法、德、日、俄等国。

④ 参见 Варецкий Б. И. Шелест страниц, как шелест знамён. Пресса России в трё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жимах. М., 2001; Махонина С. 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М., 2002.

⑤ 国人自办报刊兴起于 19 世纪 70 年代，第一次办报高潮出现在维新变法时期。

①1907年，国人在哈尔滨创办了第一家中文报纸《东方晓报》，其办报目的就是为了抵制沙俄报纸的宣传。《东方晓报》的创办者是奚廷黻，在哈尔滨他因目睹沙俄报纸侵犯我国主权与内政而忧心忡忡，曾上书官署说：“报纸为开通民智、启发新机之方针。欧西文明之报馆林立，哈尔滨为吉江两省之中心点，近来俄文报馆已有三处，而铁路公司又特设远东华文报馆，独我中国报馆阙如，亦无筹及于此者。彼之报纸每与我政治权限隐相干涉手段，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则我自不可以人之耳目为我之耳目，自当速设报馆以期抵制”。^②《东方晓报》出版后，便时常与《远东报》进行笔战。但是，稚嫩的国人报刊往往敌不过拥有雄厚实力和坚强后盾的沙俄报刊。以《远东报》为代表的沙俄报刊曾一度垄断了哈尔滨的新闻业，使国人的办报活动举步维艰，屡遭排挤和破坏，在《远东报》的干扰下，哈尔滨国人报纸《东方晓报》、《滨江日报》、《东陲公报》等纷纷停刊或遭查封。^③

在中国新闻史上，早期外报是在洋枪洋炮的伴随下进入中国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外报也带来了西方的文明，在中、外文化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这种舶来品催生了中国近代报业，把西方文化观念引入到半封建的中国，同时开启了外国读者窥视东方的窗口。沙俄在华报刊把俄国人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社会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传递给中国人，同时，也通过版面把中国的文化传播给普通的俄国读者，在中、俄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Abstract】 In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Tsarist Russia's periodicals in China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including official and private ones according to the identities of organizers. Among official periodicals, the majority is of Russian and some are of Chinese, both of which directly or indirectly served the overall interest of Russia's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Meanwhile, private newspapers of the same period were strictly controlled by Tsarist Russia. Tsarist Russia's activities in journals in China did not last long and the total sum of journals is not so much as well, but it had greatly promoted the

① 1899年沙俄强租旅大（见前文）。1900年，义和团运动波及东北，沙俄在东北的利益受到威胁。沙俄集结了10万的总兵力，向我国东北发动了全面进攻，仅用4个月的时间就基本控制了东北全境。事后，沙俄违约拒不撤军。1903年，全国各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参见“沙俄‘远征中国’秘密档案曝光”，《青年参考》，2000年11月23日。俄罗斯《政权》（«Власть»）杂志援引俄罗斯档案馆珍藏的一系列秘密档案，披露了此次战争的一些内幕。

② 据黑龙江省档案馆藏：黑龙江巡抚程德全1907年8月3日“关于派销东方晓报的札”，转引自《东北新闻史》，第67页。

③ 《东北新闻史》，第66-75页。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in China, especially in Northeast China. Tsarist Russia's periodicals have ended the history of Northeast China without newspapers, which has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Northeast China's journalism.

【Key Words】 Tsarist Russia, Journals in China, Official, Private, Influence

【Аннотация】 Периодические издания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19-го — начала 20-го века в Китае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организатора можно разделить на две категор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и частные. В веде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изданий находилось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русских газет и журналов, а также некотор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газеты, все они прямо или косвенно служили общим интересам вторжения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й. А частные издания того же периода находились под строгим контролем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Публикацион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е была не долгой, количество изданий также было не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м, но, тем не менее, это сыграло важную роль в содействии развити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в Китае, особенно на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е страны. С появлением русской прессы было покончено с историей «без прессы» на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е Китая, что оказало огром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последующее развитие прессы в данном районе страны.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Царская Россия, периодические издания в Кита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частный, влияние

(责任编辑 肖辉忠)

1958年苏联从罗马尼亚撤军始末

夏纪媛*

【内容提要】1944年苏军进入罗马尼亚后，对其战后初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1955年罗马尼亚首次要求苏联撤军，结果遭到赫鲁晓夫的强硬拒绝。经过不懈努力，1958年苏联终于同意罗方要求。苏联之所以同意撤军，主要是出于和平攻势的需要，也考虑到罗马尼亚处在一个不容易受西方国家攻击的地理位置，同时也是对罗马尼亚忠诚的“奖赏”。苏军的撤出为罗马尼亚以后独立自主政策的实施大开了方便之门。

【关键词】罗马尼亚 苏联 撤军

【中图分类号】K512.56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0)06-0117-(11)

冷战时期，苏联和东欧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控制与反控制。苏联的控制稍有松动，东欧国家就开始谋求“独立自主”。但是，这种“独立自主”一旦越过苏联所能容忍的底线，苏联就会采取各种办法阻止，甚至不惜出兵镇压。因此，绝大多数国家的“独立自主”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唯一例外的是罗马尼亚在这种困境中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成功地使苏军撤离罗马尼亚。1944年苏军追剿德军时进入罗马尼亚，1947年苏罗两国签订的和平条约使苏联在罗马尼亚的驻军合法化。然而，在1958年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苏联宣布从罗马尼亚撤军。在冷战和强化对东欧国家进行控制的背景下，苏军缘何会自行撤出罗马尼亚？本文拟根据近十年来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新解密的历史档案，对此作初步探讨。

* 夏纪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苏军占领罗马尼亚及其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马尼亚于1940年11月加入了法西斯轴心国。1944年8月，苏军在雅西—基希讷乌对法西斯发动了强大攻势，开始向罗马尼亚腹地挺进。在这种形势下，罗马尼亚王室联合罗共等政治力量于23日举行反法西斯武装起义，宣布退出轴心国，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罗马尼亚学者认为，罗马尼亚的参战沉重地打击了法西斯德国在东南欧的防御体系。“如果不是罗马尼亚停战，西方军队在法国的损失就会更大，英国和荷兰平民中由于飞弹而遭到的损失也会更重。”^①但是，苏联仍把罗马尼亚当作战败国看待，在8—9月间将罗马尼亚的绝大部分领土都占领了。9月12日，罗马尼亚同苏联签订停战协议。这个协议规定，如果军事形势需要，罗马尼亚政府要确保苏联及其他盟国军队在罗领土任何地方的自由行动。对此，罗马尼亚方面一直有不同看法。在协定签署前，罗方代表帕特勒什卡努曾要求苏联撤军，遭到苏联拒绝。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在向华盛顿发回的报告中说：“罗马尼亚代表们试图在停战协定中加进一个特殊保证条款，即与德停战后盟国军队撤出罗马尼亚，但莫洛托夫拒绝考虑这一提议，理由是现在时机不成熟。”^②1945年6月，罗马尼亚政府又向盟国管制委员会提议要求苏军撤出罗马尼亚，结果再次遭到拒绝。同年9月，莫洛托夫对来访的罗马尼亚代表团说，在罗马尼亚建立共产党政府前，苏军不会撤出罗马尼亚。^③

1947年2月10日，反法西斯盟国在巴黎对德国的欧洲盟国意、罗、保、匈、芬五国分别签订了和平条约。对罗和约中的第二十一条关于“撤退盟军”的条款规定：盟国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苏联武装部队在内，应在和约生效后九十天内撤出罗马尼亚。但是，为维持驻奥地利苏军的供给，苏联有权继续把军队留在罗马尼亚。^④该条款使苏军在罗马尼亚境内的驻扎固定化、法律化。不过，这只是苏联为自己在罗驻军找借口，因为从罗马尼亚的温盖尼县到维也纳的交通线全长1350公里，而从苏联西部利沃夫到维也纳的交通线只有630公里，比从罗马尼亚到奥地利方便得多。

① [罗]吉塔·约耐斯库：《共产主义在罗马尼亚》，北京编译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98页。

② Paul Niculescu-Mizil, *O istorie trăită : memorii*. Volumul I, București: Editura Enciclopedică, 2002, pp. 102-103. (尼库列斯库·米齐尔：《亲历历史》第一卷，布加勒斯特：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第102-103页。)

③ [罗]格·布扎图等：《共产主义在罗马尼亚的进攻》，第1卷，第29页。转引自康春林：“论二战后罗马尼亚政局的嬗变——从帕特拉什卡努问题说起”，《世界历史》2001年第4期，第44页。

④ [罗]吉塔·约耐斯库：《共产主义在罗马尼亚》，第145页。

苏军的占领对罗马尼亚战后初期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其一，苏军经常干涉罗马尼亚内政，无视当地法律、法规，严重损害了罗马尼亚的主权和利益。在苏军的监管下，罗马尼亚改组了军队，苏联人占据要职。苏联还控制了罗马尼亚的国防部、安全部及总参谋部等核心部门。1952年11月，罗马尼亚军事学院有105名苏联派驻的永久顾问和17名临时顾问。^①此外，苏军的违法乱纪行为给罗马尼亚人民的财产、尊严和生命带来极大危害。“不像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与俄国几乎没有任何文化与历史联结，而且还对苏联发动过战争。因此，苏联的占领对罗马尼亚民众来说尤为痛苦，况且红军本身也不遵纪守法。”^②其二，从经济方面看，苏军的驻扎对罗马尼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罗马尼亚要以价值3亿美元的物资来偿付苏联由于军事行动和占领而遭到的损失，还要负担苏联占领军的费用并给予他们使用各种工业、运输企业和劳务的权利。^③为此，1946年罗马尼亚支付给了苏联16.2亿列伊（罗马尼亚货币单位，当时，1列伊等于0.3288美元）。^④不仅如此，苏军进入罗马尼亚境内后，把他们缴获的所有东西运回了苏联。罗马尼亚国家自由党主席曾对美国驻布加勒斯特代表说：“德国人抢走了鸡蛋而把母鸡留给我们，而苏联把母鸡抢走并让我们把鸡蛋也给他们。”^⑤苏军的掠夺使罗马尼亚从1945年开始面临严重的贫困和饥荒。与1944年第一季度相比，1945年第一季度的食物消费总量急剧下降，其中面粉消费量下降了33.1%，糖消费量下降了50.9%，食用油消费量下降了86.2%，罗马尼亚还需要大约20—30万吨小麦和大约30—40万吨玉米才能抵补国内供应的不足。^⑥消费品的严重供不应求导致非法交易盛行，致使罗马尼亚市场极其混乱。财政困难不断加大，投机倒把日益猖獗，劳动阶级失去了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能力，政府被迫发行新货币，罗马尼亚国家银行每月发行大约700亿—800亿列伊货币。由此受到通货膨胀的威胁。^⑦罗马尼亚领导人乔治乌·德治、扬·毛雷尔认为，苏联军队在罗马尼亚驻扎和罗马尼亚必须按照军事停战协定及和平条约规定的条款履行对苏联的义务，是造成罗马尼亚经济困难局面的主要原因。^⑧

① Soviet occupation of Roman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Soviet_occupation_of_Romania#Comparison_with_Soviet_occupation_of_other_Eastern_Bloc_countries.

② David R. Stone, “The 1945 Ethridge Mission to Bulgaria and Roman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Balkans”,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Vol. 17, no. 1, March 2006, pp. 93-112.

③ [罗]吉塔·约耐斯库：《共产主义在罗马尼亚》，第104页。

④ Constantin Hlihor, Ioan Scurtu, *the Red Army in Romania*, Iași: Portland: Center for Romanian Studies, 2000, p. 129.

⑤ *ibid*, p. 107.

⑥ *Ibid*, pp.120-121.

⑦ 参见“维辛斯基就罗国内经济状况等问题与瓦西柳·勒什卡努的谈话记录”，№09594，沈志华主编：《苏联档案历史选编》，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3卷。

⑧ 参见“苏萨伊科夫关于罗党内矛盾给苏斯洛夫的报告”，№09335，沈志华主编：《苏联档案历史选编》，第23卷。

二、罗马尼亚与苏联关于撤军问题的交涉

虽然意识到苏军占领对罗马尼亚的独立自主十分不利，但是，罗马尼亚领导人深知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不能鲁莽行事，必须寻找合适的机会。1955年发生的几件事给罗马尼亚领导人提供了要求苏联撤军的机会。

首先，1955年4月，苏、美、英、法四国签订对奥和约。根据和约，苏联保证最晚于1955年12月31日从占领区撤军。苏军从奥地利撤出，苏联在罗马尼亚、匈牙利驻扎军队就失去了法律依据。对奥和约签订后，以乔治乌·德治为首的罗马尼亚工人党高层领导开始考虑与苏联协商撤军问题。他说：“同志们，难道对罗马尼亚来说这不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时候吗？我们可以要求苏联撤军，按照规定，苏联应该撤军。”^①美国驻布加勒斯特的外交官员发回的报告说：“罗马尼亚民众焦急地期盼着奥地利和约能导致苏军撤出罗马尼亚。”^②4月25日，罗马尼亚前外长加芬库(Gafencu)写信请求英国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苏联遵守1947年的和平条约。^③“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以德治为首的罗马尼亚领导层开始认真考虑通过何种途径可以使苏联从罗马尼亚撤军。”^④

其次，苏南关系的改善。1955年5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这是自1948年苏南关系破裂以来，两国政府首脑第一次会谈。6月2日，两国发表了《贝尔格莱德宣言》，这标志苏南两国关系恢复了正常化。从地理位置看，罗马尼亚北部和东北与苏联为邻，南接保加利亚，西南和西北分别与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接壤，东南临黑海。这些国家中，苏联最担心的就是南斯拉夫。苏南改善关系后，苏联在罗马尼亚驻军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此外，“苏南关系的改善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方面打击了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另一方面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维护主权、结合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树立了一个榜样，同时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新型、平等的国家关系奠定了基础。”^⑤这大大增强了罗马尼亚要求独立自主的信心。

再次，国际局势的缓和。1955年7月18—23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在

① Excerpt from an interview with Gheorghe Apostol by Ioan Scurtu and Virginia Calin on 20 October 1994 concerning the withdrawal of Soviet troops from Romania, in Constantin Hlihor, Ioan Scurtu, *The Red Army in Romania*, pp. 250-252.

② Sergiu Verona, *Military occupation and diplomacy: Soviet troops in Romania, 1944-1958*,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71.

③ *ibid.*

④ Constantin Hlihor, Ioan Scurtu, *The Red Army in Romania*, p. 173.

⑤ 黄凤志主编：《当代国际关系》，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7页。

日内瓦举行波茨坦会议以来的第一次大国首脑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德国、欧洲安全、裁军和促进东西方之间的接触等问题。四国首脑同意通过联合国裁军委员会拟订一项各方满意的裁军制度，并一致同意就会议议题在同年 10 月的外长会议上继续谈判。此次会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早期紧张的两极对峙中，为团结一致对付外来威胁，苏联对东欧各国的控制极为严密，不允许各国有一丝毫的偏离，否则就要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国际局势缓和后，苏联对这些国家的控制有所松动。这样，罗马尼亚领导人就敢于提出撤军要求。

最后，国内地位的巩固也是促使德治等人敢于要求苏联撤军的一个因素。1952 年，德治发动了对“莫斯科派”主要人物波克、卢卡和乔治斯库的清洗，开除党员 20 万人，占党员总数的近四分之一。在这次急剧清洗的同时，德治还改组了党的领导机构，政治局委员从 13 人减少到 9 人，书记处书记从 7 人减少到 5 人。这样，党的新领导比以前团结得紧密。1955 年 12 月 10 日，罗马尼亚重新加入联合国，扩大了国际活动的范围，提高了自身的威望，从而有利于在对苏关系中争得更多自主权。

虽然形势有利，但向赫鲁晓夫建议撤军在当时还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举动，所以，德治要事先征得工人党政治局的同意与支持。于是，1955 年 8 月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苏联撤军问题，决定由曾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受过训的埃米尔·波德纳拉希向赫鲁晓夫提出，后者趁赫鲁晓夫 8 月 21—26 日访问罗马尼亚的机会正式向其提出了撤军问题。赫鲁晓夫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据在场的格奥尔基·阿波斯托尔回忆，赫鲁晓夫听后大吃一惊，脸色都变了，称在场的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为反苏的民族主义分子：“以前你们在苏联的保护下感觉良好，现在想把我们踢出去了。”^①赫鲁晓夫拒绝了罗方的要求并愤怒地离开了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领导人只好暂时搁置撤军的提议。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进一步坚定了罗马尼亚领导层要求苏联撤军的决心。1956 年 10 月匈牙利事件爆发后，布加勒斯特、克鲁日、雅西、蒂米什瓦拉等地的大学生在 27 日纷纷举行秘密集会。其中，蒂米什瓦拉还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示威中经常提到的要求之一就是取消中小学和大学中的俄语课，再就是一些政治上的不满，如苏联在罗马尼亚的驻军、罗马尼亚在外交和外贸方面对苏联的从属、苏联对罗马尼亚铀和石油等重要矿产的掠夺。有学者认为，苏联在罗马尼亚的驻军是导致蒂米什瓦拉发生示威游行的一个重要原因。蒂米什瓦拉驻有苏军 9657 人，他们占用了当地最好的建筑物，其中包括建于 1733 年的著名的巴洛克宫，这与学生简陋的宿

^① Excerpt from an interview with Gheorghe Apostol by Ioan Scurtu and Virginia Calin on 20 October 1994 concerning the withdrawal of Soviet troops from Romania, in Constantin Hlihor, Ioan Scurtu, *The Red Army in Romania*, pp.250-252.

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①

波匈事件发生后，在中国领导人的建议与劝说下，苏联政府于 10 月 30 日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宣言承认在过去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有过错误，还宣布打算从东欧召回一些专家、顾问，并同意与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商讨驻军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德治认为是个好机会。第二天，罗马尼亚工人党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苏联撤军问题。德治要求参加下一次华约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向苏联提议撤军，理由是鉴于国内局势的发展，罗马尼亚认为苏军不需要继续留在罗马尼亚境内了，苏军的撤出还可以缓解罗马尼亚国内民众的反苏情绪。同时，德治还要求与苏联协商撤走专家的问题，只留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即可。^②

11 月 23 日到 12 月 3 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基伏·斯托伊卡率团访苏。虽然双方会谈的主要内容是经济问题，但也涉及到驻军问题。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称，“由于目前西欧还存在着侵略性的军事集团，西德正在军国主义化，北约国家还在社会主义国家附近保持着大量军队和基地而又拒绝裁减军备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苏联军队根据华沙条约暂时驻扎在罗马尼亚境内是适宜的。根据苏联政府 10 月 30 日的宣言，苏联政府和罗马尼亚政府将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彼此协商以及同华沙条约其他缔约国协商苏联军队继续驻扎在罗马尼亚境内是否有必要的问题。”^③根据这项声明，苏军仍留在罗马尼亚，苏军是否撤离需要华约成员国一致同意。

这一结果无疑使德治很失望。也许是为了缓和德治的不满，苏共中央 1957 年 1 月初致信罗共中央，称罗马尼亚已经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不再需要苏联专家了。苏共中央提议不再继续向罗马尼亚派驻专家顾问，减少目前仍留在罗马尼亚工作的专家人数。^④4 月上旬，两国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商讨驻罗苏军的法律地位问题。会谈结束后，双方签订了一项关于苏军暂时驻扎在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的法律地位的协定。它规定：苏军临时驻扎在罗境内对主权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不会干涉罗国内事务。苏军在罗马尼亚的特权地位结束，不能为所欲为。^⑤苏军进驻罗马尼亚十三年后，终于有了约束其行为的法律规范，这也算是罗马尼亚在撤

① Johanna Granville, “We Have Wines of All Kinds: Red, White, and Green: Romanian Reactions to the Hungarian Uprising in 1956”,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Volume 54, Number 2, 2008, p. 206.

② Document No. 60: Minutes of the 59th Romanian Politburo Meeting, October 31, 1956, In Csaba Bekes,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 history in documents*,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③ 《人民日报》，1956 年 12 月 5 日，第 1 版。

④ Constantin Hlihor, Ioan Scurtu, *The Red Army in Romania*, p. 256.

⑤ Mihai Retegan, *In the shadow of Prague spring*, Iași: Portland: Center for Romania studies, 2000, p. 27.

军问题上取得的进展。

为了寻求广泛的支持，迫使苏联同意撤军，从1958年3月底开始，以斯托伊卡为代表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出访了印度、缅甸、中国等国。访问期间，罗马尼亚要求各国在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出“撤退外国驻军”等问题。^①访问中国时，斯托伊卡高度赞扬了中国决定在1958年年底以前完全撤出朝鲜这一主动措施，认为这对于缓和远东和世界紧张局势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在4月8日发表的中罗联合声明中，双方明确重申：“在欧洲和亚洲的军事集团应当取消，代之以集体安全体系；在别国领土上建立的军事基地应当取消，在别国领土上驻扎的军队应当撤出。”^②

亚洲之行后，罗马尼亚代表团在回国途中经过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了简短会晤。令他们吃惊的是，赫鲁晓夫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当众宣布“鉴于罗马尼亚的请求，（驻罗）苏军将返回苏联”。^③赫鲁晓夫为什么同意从罗马尼亚撤军？由于目前还找不到罗马尼亚方面或苏联方面有关该问题的档案材料，学术界对此问题也没有确切的回答。有学者认为，罗马尼亚境内的苏联驻军问题之所以能获得令罗马尼亚满意的解决，与中国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这说明，“布加勒斯特早已开始巧妙地利用苏联要尽量缩小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影响的愿望，来达到罗马尼亚本国的目的”^④。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中国与苏联是否就此问题有过交涉。

1958年4月17日，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给德洽写了一封“关于协商从罗马尼亚领土撤军”的信。信中提到，目前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爱好和平的政策使国际局势的缓和成为可能。现在罗马尼亚拥有了可靠的武装力量，可以及时应对帝国主义的挑战，保卫社会主义的胜利果实，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利益，因此，苏军没有必要再留在罗马尼亚了。另外，西方利用苏军仍然驻扎在罗马尼亚的事实，进行反苏宣传和诋毁罗马尼亚。苏联希望罗马尼亚尽快就此作出答复。23日，德洽回信给赫鲁晓夫，称赞苏联撤军，称罗方也认为苏军在罗马尼亚的驻扎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利益，只是现在局势发生了变化，苏军不需要再留在罗马尼亚了。为了让赫鲁晓夫放心，不再改变主意，德洽还向赫鲁晓夫保证：“罗

① 《国家副主席朱德、人大委员长刘少奇会见罗马尼亚代表团谈话记录》，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 204-00061-03，第7页。

② 《中国和罗马尼亚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及中方草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 204-00061-04，第7-8页。

③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Emil Bodnaras and Harry G. Barnes, US Ambassador to Romania*, i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Romania in the Cold War*.

④ 罗宾·雷明顿著：《华沙条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66页；Stephen Fischer-Galati, *the New Rumania: From People's Democracy to Socialist Republic*, the MIT Press, 1967, pp. 70-71.

马尼亚的武装力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忠实履行社会主义阵营的职责。”^①5月2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华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元帅作了“关于再次裁减华沙条约缔约国武装部队和从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领土撤退苏联军队”的报告。政治协商委员会赞同苏联政府在最近期间内撤出驻扎在罗马尼亚领土上的苏军的建议，并深信各国人民将把这一决定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坚定不移的和平政策的新证明。^②8月15日，罗马尼亚宣布苏军全部撤出。

三、苏联为什么会从罗马尼亚撤军

经过罗马尼亚方面的多次交涉，苏军终于撤出罗马尼亚。在对东欧其他国家加强控制的同时，苏联为何对罗马尼亚的控制似乎有所放松？其中缘由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分析。

首先，撤军可以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大规模扩充军备，加剧了两大阵营的对抗。赫鲁晓夫执政后感到这种紧张局势的危险性，提出了一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和主张。1953年5月30日，苏联向土耳其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声明放弃苏联对土耳其亚美尼亚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汉两地的领土要求。7月20日，苏联与以色列恢复了外交关系。1955年5月签订对奥和约，从奥地利撤军。1955年7月在日内瓦召开四国首脑会议，国际紧张局势开始缓和。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了“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外交政策。但是，接下来发生的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干预又使它的国际形象大大受损。为了修补受损的国际形象，赫鲁晓夫发起了一系列宣传攻势，倡议和平与裁军。比如，主要体现苏共二十大精神的1957年11月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发表的《莫斯科宣言》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争取和平，防止战争。1958年1月8日，《真理报》还宣布苏联政府决定裁军30万。苏联的行动是要表明，“如果不是由于存在着所谓威胁社会主义国家的完整与和平的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的危险，赫鲁晓夫所作的从欧洲国家撤军的诺言本来是可以实现的。”^③对此，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过，“（撤军）展现了伙伴之间的平等关系，是我们针对那些在别国领土上驻扎军队的国家的绝好宣传材料。当时我们正好提出一个撤出所有外国驻军的口号。这个口号至今还非常有力量，为落实这个口号，还必须得进行斗争。如果一

① ANIC, Fund CC of the RCP, File 9U/1956-1958, *Letter from the First Secretary of the CC of the RWP (Gheorghe Gheorghiu-Dej) in Favor of Proposal to Withdraw Soviet Troops from Romania*.

② 《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第1版。

③ [罗]吉塔·约耐斯库著：《共产主义在罗马尼亚》，第311页。

个政治家口口声声说缓和国际局势大有好处，可是他自己国家的军队却驻扎在别国的领土上，怎么进行斗争呢？这位政治家的名声可就威信扫地了，他的宣传再也没有人相信了。根据这些考虑，我认为将我军撤出罗马尼亚是有好处的。”^①可见，利用从罗马尼亚撤军来维护形象，摆脱波匈事件造成的外交被动局面，成了苏联的最佳选择。

其次，撤军对苏联的军事实力影响不大。从地缘政治看，罗马尼亚是最令苏联放心的国家。罗马尼亚四邻都是“友好国家”，与北约国家不接壤。与东欧其他国家相比，罗马尼亚处于一种不容易受西方国家攻击的地理位置，所以，撤军对苏联来说没有任何危险。若出现任何紧急情况，苏联驻扎在比萨拉比亚和乌克兰的军队都可以很快开进罗马尼亚。英国外交部的分析说：“苏联从罗马尼亚撤军对局势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如果局势需要，他们可以迅速开进罗马尼亚和匈牙利。”^②美国当时也有类似的看法：“如果出现紧急情况，苏军会迅速越过普鲁特河。”^③此外，匈牙利事件后，苏联增加了在匈牙利的驻军，从罗马尼亚撤军不会从整体上降低苏联在此地区的军事力量。这样，华约与北约的军事平衡没有改变，驻扎在东欧的苏联军队总体上并没有减少。赫鲁晓夫也是这么认为的：“如果我们将军队从罗马尼亚撤出，把他们部署在摩尔达维亚或伊兹梅尔州，一旦罗马尼亚遭到敌人的攻击，实际上影响并不大。两个地方距离不远，如果需要援助罗马尼亚，这点距离要不了多少时间。我们有强大的空军，有装载导弹的飞机和舰艇，有近程导弹和相当不错的海军武器。”^④赫鲁晓夫与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磋商后，马利诺夫斯基也同意赫鲁晓夫的看法。他在会上证实说，撤出军队并不会削弱苏联的军事实力。此外，苏联还能减轻一些物质上的负担，因为在国外供养军队的费用比在国内高一倍。^⑤

再次，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发现以德治为首的领导层既能控制局势又忠于苏联。匈牙利事件爆发后，罗马尼亚的学生、铁路工人纷纷举行集会，有些地方发生了街头示威游行。为了控制局势，罗马尼亚领导层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罗马尼亚工人党政治局成立了一个总指挥部，成员包括第一副总理波德纳拉希、内政部长德勒吉奇、武装部长瑟勒让和中央委员齐奥塞斯库。他们为了维护秩序，有权采取“任何措施”。^⑥另一方面，政府对学生工人作了一些让步，

① [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三卷，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556-2557页。

② Sergiu Verona, *Military occupation and diplomacy: Soviet troops in Romania, 1944-1958*, p. 145.

③ Ibid.

④ [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三卷，第2556-2557页。

⑤ 同上。

⑥ Johanna Granville, “We Have Wines of All Kinds: Red, White, and Green: Romanian Reactions to the Hungarian Uprising in 1956”, p. 202.

同意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资，答应取消俄语课并提高学生的生活水准。罗马尼亚的局势很快就得到了控制。1956年11月18日，赫鲁晓夫在向莫斯科共青团代表讲话时指出，罗马尼亚学生中存在“不健康的情绪”，并赞扬了罗马尼亚工人党迅速而有效的行动。^①

在控制国内局势的同时，罗马尼亚领导层在政治宣传、军队调动等方面都给予苏联很大的支持与帮助。罗马尼亚在其官方公报中称苏联的行动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罗马尼亚政府附和苏联的宣传，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是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反动分子的挑唆，这与苏联的官方宣传及苏联在联合国的态度是一致的。罗马尼亚还以实际行动帮助苏联。1956年10月26日驻扎在罗马尼亚的苏军进入匈牙利，这是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最早进入该国的军队。据赫鲁晓夫回忆，德治曾主动要求向匈牙利派兵，但赫鲁晓夫没有同意。匈牙利事件爆发后不久，罗马尼亚向苏军提供了越过匈牙利边界的通道和军事基地。同时，为了给过境苏军提供协助，波德纳拉希奉命担任交通与通讯部长，负责铁路等交通要道的通畅。对此，美国驻罗马尼亚代办泰勒说：“罗马尼亚政府不仅仅是被动听从苏联的指示，而且积极与之合作。”^②此外，匈牙利事件中被拘捕的纳吉等匈牙利领导人一直囚禁在罗马尼亚，直到他们被处决。这期间，罗马尼亚领导人参与了对他们的审讯。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对德治等人的表现非常满意。毛雷尔后来说道：“事实证明我们当时采取的那种态度是很成功的。我们试图给苏联领导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让他们知道罗马尼亚人是不会做违背苏联利益的事情的。”^③

总体看来，苏联决定从罗马尼亚撤军是一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主要是苏联自身利益的考虑，同时也离不开罗马尼亚领导人为此所作的多次努力。罗马尼亚巧妙而成功地利用冷战后国际局势的变化，迫使苏联最终同意撤军。

撤军后，罗马尼亚成为华沙条约成员国中唯一不驻有外国军队的国家。成功促使苏联撤军是冷战时期罗马尼亚推行自主外交的第一次大胆尝试，为它以后实施独立自主的政策打开了大门。二战后初期，罗马尼亚像东欧其他国家一样，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与苏联采取共同立场，是苏联的忠实追随者，曾被视为“最正统的卫星国”。“1948年罗马尼亚外部历史的最明显特征是丧失其外交政策……罗马尼亚的外交政策完全效仿苏联……在外交事务中罗马尼亚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紧紧追随苏联。”^④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① [罗]吉塔·约耐斯库：《共产主义在罗马尼亚》，第154页。

② Verona Sergiu, *Military occupation and diplomacy: Soviet troops in Romania, 1944-1958*, p. 104.

③ Constantin Hlihor, Ioan Scurtu, *the Red Army in Romania*, p. 186.

④ Verona, Sergiu, *Military occupation and diplomacy: Soviet troops in Romania, 1944-1958*, p. 150.

罗马尼亚独立自主的倾向日益明显。它开始改变外交上追随者的软弱形象，根据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需要处理外交事务。比如，罗马尼亚坚决抵制赫鲁晓夫的经互会“一体化”倡议；在中苏关系恶化后，并没有同苏联站在一边；1967年不顾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反对，单独同西德建立了外交关系；1968年苏联侵捷事件中，罗马尼亚是华约成员国中唯一没有出兵的国家，而且对武装侵捷进行了谴责。通过推行积极自主的外交，罗马尼亚在国际社会获得了更多的发言权和更大的影响。

【Abstract】 Soviet troops' entering Romania in 1944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Romania's post-wa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lives. Romania's first application for the Soviet Union's withdrawal was made in 1955 which however was toughly refused by Khrushchev. Through persistent efforts, the Soviet Union finally agreed with Romania's request in 1958 mainly because of both needs for peace, Romania's geopolitical position which is hard to attack by western countries and “rewards” for Romania's loyalty as well. The Soviet's withdrawal has provided convenience for Romania's policy of independence.

【Key Words】 Romania, the Soviet Union, Withdrawal

【Аннотация】 Вступление советских войск в 1944 г. в Румынию оказало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начальный период развития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экономики и общества Румынии. В 1955 г. Румыния в первый раз подняла вопрос о выводе советских войск, и результатом этого был жёсткий отказ Хрущёва. Благодаря неустанным усилиям,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 1958 г. согласился ответить на просьбы Румынии. Главная причина, почему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огласился вывести войска, — существовала потребность мирного наступления с учетом того, что Румыния не находится в подвергаемом атакам Запада положении, и честной «наградой Румынии». Вывод советских войск открыл дверь для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последующей политик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Румын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умыния, СССР, вывод войс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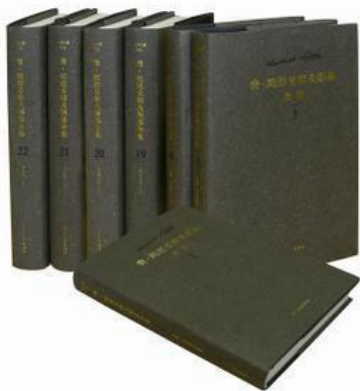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黄翔)

书评

一项泽被后人的学术工程

——写在《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出版之际

陈建华*



陈燊主编：《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全2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

由陈燊主编、刘文飞和白春仁任副主编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近日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全集》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也是国内第一部名副其实的陀氏作品的全集。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工程，《全集》无疑会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从1998年开始启动，因工作艰巨以及出版方面的问题等原因，历时十多年。该《全集》700多万字，共22卷，前16卷包含了陀氏的全部长中短篇小说，17、18卷为文论，19、20卷为《作家日记》，21、

22卷为书信。该《全集》不仅收录内容全面，而且长达6万字扼要且切合实际的总序、严谨且详尽的注释和题解（如《卡拉玛佐夫兄弟》的题解长达3万字，《白痴》的题解也有1万多字），也使《全集》的学术含量大大增加。

陈燊先生这样谈到筹划该《全集》的初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作品一般都有中译本，但从未出过全集，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他的论文、文论以及书信，尤其是《作家日记》，都只有过部分或片段的译介。各种译本又一般没有各个作品的详细题解（介绍作者的写作动机、构思、写作和修改过程，以及国内外评论界的反

* 陈建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响等)和详细的注释(固然,这两者几乎是国内过去所有外国文学作品中译本的共同缺陷),不利于我国读者、研究工作者全面而深入地研讨、探索这位思想和创作极其复杂矛盾的大作家,诚为一大憾事。作为一个俄国文学研究者,我很想填补这一空白”。^①

担任《全集》的主编后,陈燊先生深知这项任务“十分严肃而巨大”,约请二位同志共事。他说:“除绝大部分作品正文的校读工作外,各书题解涉及作品和作家思想等许多问题,而注释则涉及大量西方作家、作品、作品中的人物、典故、地名,以及与此有关的译名等大量问题。虽然各作品的译者都已作过努力,但还得逐一修改、统一或增补。任务十分复杂艰巨。我一直兢兢业业,全力以赴,不敢懈怠。近五、六年来更是终日伏案,不辞辛劳”,乃至“严重地损害了自己的健康”。^②

《全集》的译者大多为国内有丰富翻译经验、知名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和研究专家,依照《全集》卷次顺序,就有许磊然、郭家申、臧仲伦、刘逢祺、刘宗次、力冈、张捷、冯昭巧、陆肇明、白春仁、张羽、张有福、朱逸森、郑文樾等众多译者,他们在译文和题解等方面都作了很大努力。

陈燊先生在《全集》“总序”中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被扭曲了的天才”。^③“天才”、“被扭曲”,这两个词包含的内容很丰富。有人说,只有敢于跨越传统碑石,并能够发出自己生动而又独特的声音的人才是天才,那么陀氏无疑可以进入这个行列。但是,这位天才的遭遇极为坎坷,他的思想和创作充满矛盾。他与同时代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是两座比肩而立的高峰,可是在后人的评论视野中,托尔斯泰的雄姿大多在清朗的天空下为人们所景仰,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则常常云遮雾障,难见其真实的面目。

没有人能够否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大才华,但是对他的个性和他的创作的评价却众说纷纭。在他的同时代人的回忆中,陀氏的形象是飘忽不定的。褒之者推崇他为正人君子,贬之者却将他视作卑劣之徒。人们从不同角度写出了他们心目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至于他的创作,评价者的观点更是五花八门:有人从中看到了人道主义思想,有人则看到了不必要的残酷;有人称赞他在作品中对黑暗社会的激情批判,有人则谴责他对革命运动的攻击;有人欣赏他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宗教神秘主义倾向,有人则肯定他对上帝及其所创造的世界的怀疑;有人从中找到了某种强烈的个人意志,有人则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有人称他是现实主义作家,有人则断言他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凡此种种都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创作是世界文

① 陈燊主编:《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总序。

② 陈燊主编:《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总序。

③ 陈燊主编:《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总序。

学史上的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评价者不同的政治观、哲学观和文艺观以外，作家及其作品本身的独特性和内在矛盾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命运多舛：他出生清贫，长年为巨额债务所困扰；他早年就得了癫痫病，这一精神顽疾使他身心交瘁，痛苦不堪；他曾站在刑场上受过死刑的威胁，青春年华在西伯利亚的苦役和流放中度过，但晚年他却成了皇储的“精神导师”；他待人真诚、厚道，可又曾嗜赌、偏执和多疑；他渴望爱情与家庭幸福，但恋爱婚姻颇多波折（直到后来有了安娜）；他与进步的俄国文学界和思想界有着天然的联系，却又对所谓的“虚无主义”耿耿于怀；他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求索着人生的真谛，可又时时碰壁，并终生为信仰而苦恼；他的小说在激情的烈火中熔铸而成，但他又无力达到自己理想的完美，他的手臂被分开地悬在命运的十字架上……正如茨威格所说，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没有免掉过一种痛苦，也没有遗忘过一种折磨”^①；也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陀氏内心的矛盾冲突又是不可避免的，作家“对于他愿意相信的思想和感情，没有真正的信心；他愿意推翻的东西，却常常一再地激动他，而且它们看来很象是真理；因此，就他的主观方面而言，他倒是很适于做他那个时代的骚乱状态的反映者、痛苦的但是符合需要的反映者”^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矛盾并没有削弱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他的作品的光辉。作为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家，他一生执着地关注着人类的命运，热烈地捍卫着人的尊严，肯定人的价值和追求社会的和谐，尽管他的思想中充满着杂音，尽管他探索到的并非都是真理，尽管他在世时更多看到的是丑恶的现实和被扭曲的人性。这是一个具有极强的艺术创新意识的杰出的艺术家。他对人性深度的开掘和独到的小说艺术是对世界文学的重大贡献。不管人们有多少异议，作家本人从未动摇过自己的艺术探索。他在去世前不久这样说过：“虽然现时的俄国人民对我并不理解，但我会被未来的俄国人民所理解。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这并不正确，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描绘的是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③描绘“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特别是通过人物的自身感受和内心分析，无情地剖析人格分裂的主人公的病态心理，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显著的艺术特色之一。人格分裂和心理变态，是当时岌岌可危的俄国社会给人们带来的心理投影和精神悲剧。如果说托尔斯

① [奥地利]斯特凡·茨威格：《三大师》，申文林译，高中甫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② [苏]阿·卢那察尔斯基：“思想家和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见《论文学》，蒋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09页。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冯增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390页。

泰以自己的艺术探索大大拓宽了小说表现生活的幅度的话，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有力地开拓了小说表现心理的容量，特别是强化了作家对人性深度和人物变态心理的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在这一领域里舒展自如地施展着自己的艺术才华。

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方文坛的声誉日高。法国作家纪德认为，整个西欧文学中再也“没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所触及的问题更深刻的了”。当然，西方评论更注意的是他与现代主义文学的联系，如加缪干脆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存在主义小说家”。虽然不可否认这里有相当多的谬托师承的成分，但是陀氏的影响确实是广泛存在的。在他的祖国，上世纪20年代出现过一次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热潮。别尔嘉耶夫、卢那察尔斯基、巴赫金和格罗斯曼等人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其中巴赫金对陀氏的“复调”小说这一艺术形式的探讨至今为人称道。1930年代中期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排斥。直到1950年代中期以后，这位作家才在他的祖国重新获得了与其成就相应的地位。当人们自觉地拂去偏见的浮尘，用审美的目光重新审视他的鸿篇巨制时，陀氏的作品才开始完整地显示出自己的美学风貌，人们也才真切地看清了作家那傲视群峰的身姿。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中国的关系至今已有百年。中文文献中最初出现陀氏名字的是两篇译文，它们分别刊载在1907年1月出版的《民报》第11期（日本东京出版）和1918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4卷上。前文由渊实（即廖仲恺）翻译，译自烟山专太郎的《虚无党小史》，此文谈到陀氏因参与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而被捕的史实。后文由周作人翻译，译自英国人W.B.Trites的《陀思妥夫斯基小说》一文，周作人为此文所加的“译者按”拉开了中国陀氏评论的序幕。

也许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的复杂性有关，当俄国文学重要名家几乎都有作品进入中国以后，陀氏的作品才姗姗来迟。1920年5月26—29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首次刊登了乔辛煥翻译的短篇小说《贼》（即《诚实的小偷》）。“五四”时期还译出了《冷眼》（即《圣诞树和婚礼》）、《大宗教裁判官》（《卡拉马佐夫兄弟》节译）、《罪与罚》（节译）、《穷人》和《主妇》（即《女房东》）等作品。有关的评论也从“五四”时期展开。铁樵的译作《冷眼》附有“记者志”，称陀氏的作品“人道主义的色彩最鲜明；他的小说中所描写的，多是堕落的事情；心理的分析，更是他的特长”。耿济之在1921年《小说月报》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上用三千字的篇幅介绍了“道司托也夫司基”，称他是“人类心灵深处的调查员，是微细的心的解剖者”。当时较有力度的文章还有郑振铎的《陀思妥以夫斯基的百年纪念》、胡愈之的《陀斯妥以夫斯基的一生》、沈雁冰的《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思想》和鲁迅的《〈穷人〉小引》等。中国学者撰写的最早的两本俄国文学史著作（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蒋光慈和瞿秋白的《俄罗斯文学》）中，也均辟有专章介绍陀思妥耶夫

斯基。这些文章各有所长，沈雁冰的文章广征博引，视野开阔；郑振铎的文章要言不繁，在叙述中时见思想的火花；而鲁迅的文章则用语精到，常发人所未发。

20世纪30—70年代，中国出现过译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两次高潮。一次是在1930—1940年代。这一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成为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俄国古典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被越来越多地译成中文。随着译介量的增加，中国读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有关这位作家的评论文章明显增多，比较重要的有鲁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何柄棣的《杜思退益夫斯基与俄国民族性》和沈雁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鲁迅在文章中强调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的特点，指出了作家对病态心理的剖析中所蕴含的真实，并表示不能接受陀氏的“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①这些评述即使在今天读来还是很有光彩的。第二次译介高潮出现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台湾。这期间出版的陀氏作品的译本达23种，包括了这位作家的大部分重要作品，其中有《附魔者》（即《群魔》）的第一种全译本和新译出的《作家日记》等。这20多种译作中旧译多从大陆引入，新译则多从英文本或日文本转译。

中国真正大规模地翻译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始于“文革”之后。1980至1990年代，台湾地区的译介仍在继续，而大陆则开始重新认识陀氏，他的作品的译介总量大大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分别推出了两套系统介绍这位作家的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这两套文集均包括了他的重要作品。此外，新出的单行本译本数量也不少。译作基本上都根据俄文原版译出，水准大有提高。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也日益为中国学界所重视，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1980年代，中国出现了多本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如刁绍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82）、刘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论稿》（1986）、李春林的《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986）等。这些著作各有特色，但也存在或比较简单或观点上留有旧迹的问题。1986年在上海召开的国内第一次全国陀氏学术讨论会，专家们拿出了不少有新意的成果，推动了我国陀氏研究热潮的到来。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在1980年代被译成中文，巴赫金的理论加深了中国学者对陀氏小说艺术的认识。中国的研究开始向更为精深的领域拓展。1990年代，陀氏研究取得了一些有分量的成果。如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1997）、季星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戏剧化》（1999）、何怀宏的《道德·上帝与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1999）、李春林的《复调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作》（1999）等著作。何云波的著作从陀氏的文化心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卷，第412页。

理构成、陀氏与宗教、陀氏与城市、陀氏笔下的家庭等范式中的文化隐喻内涵、陀氏与“西方”、陀氏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与陀氏、陀氏与俄罗斯民族精神等方面切入，较为成功地完成了作者对陀氏的探究和对俄罗斯文化精神的寻访。

新世纪十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进一步深化。国内学界介绍了不少俄罗斯和西方的相关成果，理论和传记译著就有十多种，如近年出版的别尔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2008）和索洛维约夫等人的评论集《精神领袖》（2009）等。在全部的俄国作家中，这十年间中国学界最为关注且成果最多的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期间出版了赵桂莲的《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2002）、王志耕的《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2003）、彭克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2006）、冷满冰的《宗教与革命语境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2007）、田全金的《言与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2009）等7部专著，其学术含量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前两种著作分别探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研究方法有新的突破。彭克巽的著作是作者长期研究的结晶，材料扎实，论述深刻，对作家小说艺术的分析和陀氏研究史的回顾都颇为精到和全面。田全金的专著从译介、主题和宗教哲学入手展开研究，视野开阔，其中在陀氏创作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方面尤见功力。有些不是专题论述陀氏的专著，也值得重视，如耿海英的《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2009）将陀氏研究作为其重要部分。这十年间还有相关的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近200篇，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

当然，国内现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译本中仍存在误译等现象，有学者从译介学的角度对此进行过分析，译本的质量仍有提高的空间。研究成绩很大，但仍存在部分成果内容较空泛，有创见的理性分析偏少等问题。有学者认为，从艺术结构和诗学等方面阐明陀氏的本真状况，从中国文化视角审察陀氏，以及陀氏的创作与宗教哲学的关系等研究领域，都尚待继续深化和开拓。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出版将我国陀氏译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如陈燊先生所言，《全集》的出版“是外国文学学科建设中的一项颇有意义的学术工程”，希望它“对我国方兴未艾的陀学能发挥其应有的重大作用”。这样的重大作用将会得到显现，它的价值难以估量。祝贺《全集》出版，所有参与翻译和编辑的专家理应得到人们的感谢和敬意。

（责任编辑 常喆）

俄罗斯大事记

(2010年9-10月)

9月

- 1日 俄罗斯副总理伊戈尔·谢钦 (Igor Sechin) 表示俄将支持英国石油公司 (BP) 将其股份出售给俄罗斯公司。
俄罗斯政府部分解除了对粮食出口的禁令, 以履行国际合同和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俄总统梅德韦杰夫 (Dmitri Medvedev) 表示, 食品价格没有上涨的理由, 并通知地方领导人监督食品价格。
- 2日 俄罗斯政府批准给予吉尔吉斯斯坦 1000 万美元的援助, 并呼吁欧安组织 (OSCE) 国家不要对吉施加政治压力。
- 6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 (Vladimir Putin) 证实俄将参与建设萨姆松—杰伊汉 (Samsun-Ceyhan) 石油管道建设, 并表示南溪 (South Stream) 管线将如北溪 (North Stream) 管线一样地迅速修建, 而纳布科项目 (Nabucco) 则不可能成功。
- 7日 俄全球化问题研究所所长杰利亚金 (Mikhail Deliagin) 宣布, 他将创建一个新政党作为统一俄罗斯党 (United Russia) 的竞争对手。
- 9日 韩国总统李明博 (Lee Myung-bak) 与俄罗斯总理普京同意合作应对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 并指出这是维持地区稳定的关键。
普京在会见俄伊斯兰穆夫提理事会 (Russian Mufties Council) 主席拉维尔·盖伊努特丁 (Ravil Gaynutdin) 时, 敦促俄穆斯林在反恐斗争中作出决定性的贡献。
- 10日 在雅罗斯拉夫尔举行的全球政策论坛 (Global Policy Forum in Yaroslavl) 上,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 “自由” 是将人融入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 14日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克列帕奇 (Andrei Klepach) 表示, 未来十年内, 原材料出口仍将是俄出口的支柱, 但这并不一定是不好的现象。
- 15日 俄拒绝出席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 (Tbilisi) 召开的欧洲委员会 (Council of Europe) 议会会议, 原因是格方拒绝给一名俄议员发放签证。
- 16日 俄反对派领导人卡西亚诺夫 (Mikhail Kasyanov)、涅姆佐夫 (Boris Nemtsov)、雷日科夫 (Vladimir Ryzhkov) 和米洛夫 (Vladimir Milov) 决定成立一个亲民主的力量联盟, 并计划于 10 月 9 日在莫斯科举行抗议。
- 17日 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 (Anatoly Serdyukov) 表示, 俄不会重返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CFE), 除非北约国家接受此前俄方所提条件。并指出, 制订

新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更符合当前现实”。

- 18 日 越南与俄罗斯两国同意在包括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成员国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参与下，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谈判。
- 21 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一旦明确计算出粮食收获面积，将不排除取消粮食出口禁令的可能。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预计，2010 年俄食品价格将上涨 7 - 8 个百分点。
- 22 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法令，根据联合国安理会 1929 号决议，禁止向伊朗出售 S—300 型防空导弹。
俄农业部宣布，今年俄罗斯粮食因气候干旱减产 30%。
- 23 日 俄表示，梅德韦杰夫总统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签署的限制与伊朗合作的法令，将不适用于布什尔（Busheh）核电站项目。
- 26 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这是其自 2008 年 5 月就任总统以来第二次访华。访华期间，他将参加能源和投资会议，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并参加上海世博会的俄罗斯日活动。
俄罗斯原子能机构负责人基里延科（Sergei Kirienko）与中核集团（China Nuclear Energy Industry Corporation）总裁孙勤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基里延科表示，俄计划增加对中国的核燃料供应。
- 28 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命令，解除卢日科夫（Yuri Luzhkov）的莫斯科市市长职务。
- 29 日 俄罗斯与日本两国军事首脑就有关地区安全和俄日之间军事合作的可能形式等问题举行会谈。

10 月

- 1 日 俄罗斯财政部长库德林（Alexei Kudrin）证实，俄美已就解决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所有问题达成一致。
- 2 日 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Alexander Grushko）表示，俄方正在认真考虑北约（NATO）提出的联合建设反导系统的构想。
- 3 日 越南副总理黄忠海结束了对俄罗斯为期一周的工作访问。这次访问旨在加快实施双方间，特别是在能源领域的合作项目。
- 5 日 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Nikolai Patrushev）呼吁，成立国际特别法庭以应对海盗问题。
在莫斯科举行的投资论坛上，俄总理普京呼吁更多的乌克兰资本对俄进行投资。

- 6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与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签署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将加强军事和能源合作。
统一俄罗斯党发起“前进，俄罗斯！”运动，以支持梅德韦杰夫总统的现代化计划。
- 7日 俄罗斯取消了与伊朗之间价值8亿美元的S—300防空导弹销售的合同，据称俄将返还伊朗之前曾交付的2亿美元定金。
- 11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任命费多托夫（Mikhail Fedotov）为总统顾问兼促进俄罗斯公民社会发展委员会（Russia’s Council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负责人，以取代于7月30日辞职的帕姆菲洛娃（Ella Pamfilova）。
- 13日 俄外长拉夫罗夫与英国外交大臣黑格（William Hague）在结束会谈后发表支持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进行对话的联合声明。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与罗马尼亚天然气运输公司（Transgaz）签署一份有关南溪管线过境罗马尼亚的可行性研究备忘录。
- 14日 来自俄罗斯51个联邦主体的代表，成立了一个新的代表农业生产者和商人的政党“事业党”（Partia Dela），希望以此来推进俄罗斯制造商的利益。
俄280山地部队开赴印度参加联合反恐演习。
- 15日 俄罗斯与委内瑞拉两国总统在莫斯科签署协议，支持由TNK—BP公司收购BP在委资产，以及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收购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在德国（Ruhr Oel GmbH）公司的股份。
俄能源部长什马特科（Sergei Shmatko）表示，俄方正在考虑乌克兰有关天然气价格计算方法的提议。
- 16日 俄外交部呼吁以色列重新审视其定居点修建计划。
- 18日 俄总理普京在第24届外商投资咨询理事会（Foreign Investment Advisory Council）上发表讲话，承诺将保证公平对待外国投资者，此外还将简化对外国专家发放工作许可证和签证的手续。
- 19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呼吁与俄罗斯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以寻求共同发展和应对全球挑战。
- 20日 Gazprom 总裁米勒（Miller）表示，没有必要在近期开发西伯利亚科维（Kovykta）气田。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正在举行的有关德涅斯特（Dniestr）地区问题的谈判有利于摩尔多瓦重建稳定有效的政府。
俄向波兰提交卡钦斯基（Lech Kaczynski）总统专机坠毁事故的调查报告。

- 21 日 莫斯科市杜马选举前联邦政府副总理、政府办公厅主任索比亚宁（Sergei Sobyenin）为该市市长。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命令，任命沃洛金（Vyacheslav Volodin）为联邦政府副总理兼政府办公厅主任，接替离开联邦政府的索比亚宁。
- 25 日 俄副总检察长表示，北高加索地区叛乱分子使用的武器大多数来自军队武器库。
- 26 日 俄停止向法国购买直升机航母的谈判，并决定进行国际招标。
- 27 日 俄罗斯能源部长表示，俄对乌克兰输送天然气的价格谈判应在两国能源公司之间，而不是两国政治领导人之间进行。
- 29 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希望增加国有企业的透明度。
俄美特勤机构首次联手在阿富汗开展行动，在靠近阿与巴基斯坦边界地区摧毁了四座毒品工厂。
- 31 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河内与越南方面签署了一项价值 56 亿美元的核电站建设协议。
俄官员对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Hamid Karzai）严厉批评俄美两国联手摧毁阿境内毒品工厂的行动感到震惊。卡尔扎伊说，俄美的联合行动未经阿富汗当局批准。

（龙 腾 辑）

俄罗斯研究(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0年第6期

(总第166期)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致本刊读者与作者

《俄罗斯研究》自创刊以来,一直得到广大读者和作者的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正是由于这种关心和支持,十几年来,《俄罗斯研究》获得了坚实的进步与发展。编辑部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近年来,在世界形势发生广泛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这对我们办好刊物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本着办刊宗旨,《俄罗斯研究》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国际形势和俄罗斯问题的各方面人士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作为核心学术期刊,《俄罗斯研究》将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体现我国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和水平的重要平台之一,为推进我国的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的研究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此外,为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俄罗斯研究》还将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作为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

为了与我国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相适应,《俄罗斯研究》除了继续关注重点放在俄罗斯现状以外,还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空间,栏目设置也将更加多元。

《俄罗斯研究》热忱欢迎广大俄罗斯问题研究者、各方面学者专家继续关心和支持本刊工作,不吝赐稿。

《俄罗斯研究》热忱欢迎广大读者和作者继续对本刊提供批评意见和建议,以帮助我们不断改进工作。

(赐稿者如需了解本刊的有关规范,请登录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rus.org.cn>, 查阅“最新期刊”栏目中的“《俄罗斯研究》投稿须知”。)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 021-62233816 021-62232113

排版: 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 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电子信箱: russiastudies@163.net

网络电子版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址: www.qikan.com www.qikan.com.cn

· 公开发行 ·

定价: 10.00 元